

## 第 21 章

### 天安門悲劇：1989 年 5 月 17 日–6 月 4 日

當鄧小平開始準備調動軍隊的方案和宣佈戒嚴令時，趙紫陽等一些自由派官員也在為避免暴力鎮壓作最後一次絕望的努力。5 月 16 日會見戈巴卓夫之後，趙紫陽在晚上 10 點召開政治局常委緊急會議，再次表明了他的看法：除非黨撤銷「四二六社論」，不然不可能使問題得到和平解決。但這只得到胡啟立的支持。在政治局之外，中央顧問委員會的一批自由派的退休幹部——包括李昌、李銳、于光遠和杜潤生——也聚在一起，為發表一份把學生運動宣佈為愛國主義的聲明作最後安排。第二天一早，已經沒有退路的趙紫陽給鄧小平辦公室打電話，希望私下面見鄧小平，或許能說服鄧不動用軍隊。趙紫陽被告知可以下午來。但他去了之後才知道，他將不是與鄧小平單獨見面，其他政治局常委也都會在場。鄧小平顯然不想接受他的意見。<sup>[21-1]</sup>

#### 戒嚴令和趙紫陽離職：5 月 17–20 日

在戈巴卓夫到達北京之前，鄧小平已經在考慮如果學生不撤離廣場的應急方案。4 月 25 日，鄧小平決定發表警告學生的社論的當天，就下令解放軍進入戰備狀態。5 月初就取消了一切軍人請假外出的許可。<sup>[21-2]</sup>後來，當戈巴卓夫訪問結束、外國媒體的最重要人員也都離開後，鄧小平準備採取行動。5 月 17 日下午 4 點，鄧小平召集政治局常委（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和姚依林）和他在中央軍委的聯絡人楊尚昆，決定下一步的行動。與會者都可以表達自己的看法。趙紫陽解釋說，局勢很嚴峻，每天仍然有 30 萬到 40 萬人在示威。他認為除非撤銷嚴厲的「四二六社論」，學生們不會自願離開廣場。<sup>[21-3]</sup>

聽過其他人的意見後，鄧小平說，解決全國的問題，必須先從北京開始，因為首都的任何騷亂都會影響全國。他們必須立場堅定。例如匈牙利，國家領導人的讓步只會導致更多要求。假如中國領導人也作出讓步，中國就完了。鄧小平又說，上海的江澤民採取強硬的自上而下的措施查封了不聽指示的《世界經濟導報》（這對平息那裏的學生示威很有幫助），成功恢復了秩序。鄧小平相信，現在需要的就是這樣的鐵腕措施。但是鄧小平認為，現在北京的警察已不足以恢復秩序，需要動用軍隊。軍隊的調動要快速果斷，在行動之前部署軍隊的計劃要暫時保密。<sup>[21-4]</sup>當會上有人表示擔心，外國人可能對動用武力作出負面反應時，鄧小平回答說，行動要迅速，「西方人會忘記這件事的」。<sup>[21-5]</sup>

李鵬和姚依林馬上表示支持鄧小平的意見，儘管胡啟立也表達了一些顧慮，但只有趙紫陽明確反對。趙紫陽發言時，有人提醒他少數要服從多數。趙紫陽回答說，作為黨員他接受，但他仍要保留個人意見。<sup>[21-6]</sup>趙紫陽意識到，作為總書記，將要由他來宣佈實施戒嚴並監督它的執行。他擔心這種動用軍隊——即使是不帶武器的軍隊——的決定只會給衝突火上澆油。

會議一結束，趙紫陽就請他的助手鮑彤為他準備一份辭職信。趙紫陽知道，他無法強迫自己執行戒嚴令，而這一決定意味著他政治生涯的結束，但是他也堅信自己的決定將使他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在與家人吃晚飯時，他告訴妻子梁伯琪和女兒王雁南他打算辭職，他的決定可能使全家人受連累。之後家人打電話告訴了趙紫陽在澳門和海南的兒子，他們都理解並接受父親的決定。<sup>[21-7]</sup>

當天晚上趙紫陽尷尬地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會，在沒有鄧小平在場的情況下研究如何貫徹鄧小平實行戒嚴的決定。趙紫陽在會上宣佈，他不能執行戒嚴決定。他清楚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經結束，他說，告別的時候已經到了。

次日凌晨 5 點，趙紫陽來到天安門廣場表達了他對學生的關切。在負責監視他的李鵬的陪同下，趙紫陽拿著手提擴音器說：「我們來得太晚了……你們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全世界的人都在電視上看到了趙紫陽聲音顫抖、眼含淚水的情景。他說，他也年輕過，也參加過遊行，並不想後果會怎樣。但他勸說學生放棄絕食，愛惜身體，以便積極參加四化建設。<sup>[21-8]</sup>有些聽眾把趙紫陽的講話解釋為警告，表明他已不能再保護學生。這是趙紫陽的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5月17日被迫決裂之後，趙紫陽對計劃戒嚴的會議不再知情，他也拒絕向公眾宣佈實行戒嚴。5月19日趙紫陽致信鄧小平，再次試圖勸說他軟化「四二六社論」的立場，儘管此時他已經知道幾乎沒有成功的機會。他一直沒有收到回音。

當楊尚昆最先得知趙紫陽要遞交辭職信時，他勸趙紫陽將其收回，以免向公眾暴露領導層內部已經公開分裂——儘管對趙在廣場上出現很不滿的鄧小平覺得這種分裂已經顯而易見。趙紫陽拒絕主持宣佈戒嚴的會議，但他確實同意收回辭職信。儘管沒有辭職，但他以身體勞累為由，請了三天病假。<sup>[21-9]</sup>正是在這三天內實行了戒嚴。

5月28日趙紫陽又給鄧小平寫信，試圖就他對戈巴卓夫說的那些令鄧小平氣憤的話作出解釋。同一天他被軟禁在家中。他的助手鮑彤被捕並被送入關押高級囚犯的秦城監獄。雖然鄧小平又活了八年，但他從未回覆過趙紫陽的信，他們也再沒有見過面。

從5月24日到26日，北京的黨中央把各省的黨委書記和省長以及港澳負責人叫到北京，向他們解釋了實施戒嚴的理由，以期得到支持。<sup>[21-10]</sup>而正式處理趙紫陽的程序是在6月4日以後才開始的。趙紫陽瞭解胡耀邦在1987年承認錯誤的後果，因此他拒絕認錯，他說，他沒有做錯任何事。在軟禁期間，他享有舒適的生活條件，但直到2005年去世，能去拜訪他的人一直被嚴格限制，他本人出門時也受到嚴密監控。<sup>[21-11]</sup>

5月17日鄧小平與政治局常委見面後，戒嚴計劃迅速開始實施。第二天上午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楊尚昆宣佈了實行戒嚴的決定。當天下午中央軍委又召開工作會議，最終確定了實施戒嚴的細節：戈巴卓夫將在5月19日上午離開北京，當晚將有五萬軍人快速行動，於5月20日星期六早晨到達天安門廣場。<sup>[21-12]</sup>19日晚10點，李鵬在一個有大批高層黨政軍幹部參加的大會上講話，把調動軍隊的情況對他們作了說明。次日上午9時半李鵬宣佈戒嚴將從10點開始。<sup>[21-13]</sup>楊尚昆指示軍隊的指揮官說，士兵即使受到挑釁也不要開槍。大多數士兵甚至沒有攜帶武器。

## 戒嚴失敗：5月19–22日

鄧小平和軍隊領導人堅信軍隊很快就能到達目的地，不會發生任何意外，因此甚至沒有告知士兵假如遇到抵抗該怎麼辦，也沒有為他們提供路線圖，以便在道路被封堵時可以選擇其他路線。同時，學生們在5月19日下午獲悉運送軍人的坦克、卡車和裝甲車正在進入京郊。廣場上的學生預計軍隊將在黎明前到達，他們的心情既緊張又害怕。一些北京的學生回到了校園，但是有更多激進的學生，以及從外地來的學生（鐵道部的報告說，從5月16日下午6時到19日上午8時，共有56,000名學生乘坐火車抵達北京）仍堅持留在廣場上等待最壞的情況發生。<sup>[21-14]</sup>

不論廣場上的學生還是高層領導，都沒有預料到接下來的一幕：大批北京市民蜂擁走上街頭，徹底堵住了從東南西北各個方向進城的五萬名軍人，六條主要道路和其他幾條小路概莫能外。李鵬在5月20日的日記中簡單地寫道：「我們沒預料到會有大的抵抗。」他又記述道，各處的部隊全被擋住。有些軍人試圖通過地鐵進入天安門廣場，但地鐵入口也被封死。有些部隊想利用郊區的鐵路線，但市民躺在鐵軌上。有一支2,000人的部隊從外地乘火車到達火車站，一下車就被團團圍住動彈不得。<sup>[21-15]</sup>當時還沒有行動電話，人們用普通電話聯絡熟人，而有對講機的人守候在主要的十字路口，看到軍隊到來便發出警報，使人們能夠一擁而上將他們堵住。人們組成摩托車隊及時傳遞軍隊進城的消息。有些官員指責趙紫陽的助手鮑彤向示威學生透露了部隊前進的路線和目的地。然而，即使鮑彤是個再傑出的組織者，他也無法通報或組織街頭上洶湧的人潮。

那天夜裏皓月當空，照亮了北京城。外國記者看到人群從四面八方湧上街頭，人數有幾十萬之眾。據記者報道，整個城市都加入了示威，形成北京城裏史無前例的景觀。不僅學生得到普遍的同情，而且大多數人都反對戒嚴。<sup>[21-16]</sup>第二天凌晨4點半，被學生控制的天安門廣場上的大喇叭興高采烈地宣佈，各個方向的部隊都被堵住，無法到達廣場。廣場上的示威者歡呼雀躍。

進城的士兵大多是農村青年，與城市大學生相比沒有受過多少教育，遠不如他們見多識廣，對自己遇到的事情毫無準備。外國記者報道說，他們中間有很多人顯得手足無措。他們被告知不要對辱罵作出回應，不能造成流血。他們遵守了命令。士兵幾乎都沒有攜帶武器。學生們很快就組織起來，同被堵住的卡車上的士兵交談，試圖讓他們相信學生們在從事正義的事業——他們要爭取更多的自由，結束腐敗。有印刷機可用的圍觀者很快印出了反對戒嚴的宣傳頁到處散發。有些士兵既不瞭解情況又準備不足，顯得有些同情學生們的訴求。<sup>[21-17]</sup>

李鵬在 5 月 22 日的日記中承認，軍隊在 50 個小時裏無法移動。他還說，鄧小平擔心有可能「軍心不穩」。對於鄧來說，這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有這麼多青年人反對他們，軍隊還能維持秩序嗎？士兵是否會受到學生的影響，失去遵守紀律的決心？有些士兵看上去又累又餓。<sup>[21-18]</sup>

5 月 22 日星期一早上 7 點，部隊接到了撤退的命令。然而開始撤離時卻發生了混亂。有些市民認為軍隊只是想換一條路線進入市中心，因此繼續阻止他們移動。不過到 5 月 24 日，部隊都已撤到市郊駐紮下來。戒嚴令並沒有被正式取消，但是隨著部隊的離去，示威群眾開始慶賀勝利。<sup>[21-19]</sup>自 1949 年以來，甚至在文革期間，在北京也從來沒有這麼多人自發地示威反對黨的領導。鄧小平現在面對的是一場毛澤東有可能引以為傲的群眾運動，如果運動的矛頭不是指向他自己的共產黨的話。

## 準備武力鎮壓：5 月 22 日–6 月 3 日

5 月 20 日一過，鄧小平讓軍隊暫時撤退的同時，立刻指示楊尚昆準備坦克、裝甲運兵車、卡車和足夠的武裝部隊，以便克服一切抵抗。這時北京的最高領導人已十分擔心軍隊和高層在面對市民反抗時能否保持堅定的立場。5 月 20 日，八位在實施戒嚴時未被徵求意見的退休將軍交給鄧小平一份反對使用武力的聲明。鄧小平和楊尚昆派了兩名最高層的軍事領導人逐一拜訪這些將軍，向他們解釋實施戒嚴的原因。<sup>[21-20]</sup>

在此後幾天，李鵬努力爭取全國高層幹部的支持。在 5 月 20 日以後幾天的李鵬日記中，滿是與全國各地領導人進行電話交談的紀錄。他在電話中解釋發生的事情，希望能得到他們的贊成，並記下他們對北京領導層的決定表示擁護的聲明。<sup>[21-21]</sup>據李鵬的紀錄，到 5 月 21 日時已有 22 位省級領導表示支持戒嚴。鄧小平則一直忙於和其他高級領導人協商，以確保得到他們的支持。陳雲在這場危機中也支持鄧小平，他說，堅定立場絕不後退，這一點很重要。<sup>[21-22]</sup>鄧小平也會見了李先念、彭真等老幹部，以確保上層不發生分裂。

5 月中旬萬里正在北美訪問。由於擔心他可能支持趙紫陽，中央領導人通知他不要直接回北京，而是先去上海。5 月 26 日凌晨 3 點萬里到達上海機場，迎接他的是江澤民和丁關根。丁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他向萬里通報了形勢。第二天丁關根根據北京的指示，向萬里作了更全面的彙報。江澤民交給了萬里一些北京準備好的文件，解釋為何要讓趙紫陽下台。<sup>[21-23]</sup>雖然萬里在北美時說過一些贊成民主的話，但是回到上海後，這位一貫忠誠的中共黨員表示支持鄧小平的政策。<sup>[21-24]</sup>然後他才獲准回到北京。

## 籌備新的領導班子

甚至 5 月 20 日實行戒嚴之前，鄧小平已經忙於考慮新的領導班子，準備在恢復秩序後立刻向社會公佈。在宣佈免去趙紫陽職務之前，鄧小平先花時間重申了 1987 年召開的十三大的決定，因為他要向群眾表明趙紫陽所執行的政策仍會繼續：不但要繼續開放市場，而且要進一步擴大。外國公司正在進行的項目，甚至引起很大爭議的海南洋浦項目（由日本商社熊谷組牽頭），都要繼續。他另外還宣佈，將要花大力氣解決官場腐敗問題。<sup>[21-25]</sup>

為了重新贏得民眾支持，鄧小平需要與天安門鎮壓無關的新領導人，並在軍隊佔領天安門後向社會公佈。實行戒嚴的前一天即 5 月 19 日，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就已選定江澤民做總書記，他們打算在四中全會後立刻宣佈對他的任命。<sup>[21-26]</sup>鄧小平表揚了江澤民的果斷行動：他以巧妙的方式關閉了《世界經濟導報》而沒有引起過激反應。江澤民從 1983 年到 1985 年當過電子工業部部長，曾在 1985 年向鄧小平彙報工作。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冬季去上海度假時，江澤民作為市委書記接待他們，所以他們對江都很瞭解。他已經作為較年輕的政治局委員工作了三年，因此熟悉中央的事務。此外，他立場堅定，致力於改革，瞭解科技，有處理外交事務的經驗，這些都是鄧小平認為領導國家所需的重要品質。

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還在考慮新的政治局常委成員。天津市委書記李瑞環也是一位能幹的改革派領導人，他將進入政治局常委分管宣傳，取代與趙紫陽走得太近的胡啟立。宋平既有經驗，人緣也好，善於處理困難的組織問題，根據陳雲的建議將進入政治局。李鵬已經證明自己能夠堅定貫徹鄧小平的意願，將繼續擔任總理，姚依林仍擔任副總理。新的任命將立即宣佈，並在下一次中央全會上正式確認。<sup>[21-27]</sup>趙紫陽將離開政治局。鄧小平沒有指責趙紫陽鬧派性，但是他說，趙紫陽和胡耀邦一樣，都只與一個小圈子的人共事。<sup>[21-28]</sup>

決定了新的領導班子後，鄧小平與政治局常委兩個留任的人——李鵬和姚依林——見了面。如果說他們對把總書記這一最高職位讓給別人感到不滿，這也屬於人之常情，因此鄧小平耐心地向他們解釋說，為了維持國家的秩序，需要新的面孔。他還鼓勵他們採取切實措施打擊腐敗，向群眾表明黨的領導人在嚴肅對待這個問題。鄧小平說，江澤民等新領導人上台後的頭幾個月，需要採取一些大力的行動來證明他們致力於改革的決心。鄧小平認為江澤民不應該帶著他在上海的班子來任職，相反，他要求大家團結在江澤民周圍，形成一個堅強的領導集體。<sup>[21-29]</sup>新的領導班子一到位，鄧小平就會宣佈他徹底退休的打算。即使沒有任何頭銜，鄧仍具備一定的影響力；但江不同，他缺少革命領袖的個人威望，需要授予正式頭銜以提供領導國家的權威。

江澤民並不知曉這些有關他的未來角色的高層討論。5月31日李鵬打電話通知江澤民立刻飛到北京，但沒有解釋理由。江澤民抵京後，李鵬對他說鄧小平要見他。第二天鄧小平便通知他已被正式指定為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在北京私下拜見了另外兩位元老陳雲和李先念，並立刻開始為自己的新工作作準備。

江澤民的背景使他有足夠的資格成為下一代領導人的人選。他生於1926年，經考試入讀揚州中學和上海交通大學，後者是中國當時最好的工程類高校之一，這說明他有很高的智力。他在上學期間學過一些英語和俄語，作為交流生在蘇聯生活過兩年。他還學過一點羅馬尼亞語。江澤民13歲那年父親去世，他的叔叔——一個中共的革命烈士——成了他養父，這一變化使江澤民本人有了革命背景。他於1949年之前加入中共地下黨。1980年後在谷牧手下擔任外國投資領導小組的書記，獲得了改革開放方面的經驗。他又在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中國最大的工廠之一）當了六年黨委書記，在重工業領域有了堅實的基礎。他於1985年擔任上海市長，次年成為市委書記，1987年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共最高領導層在選拔接班人時偏愛出身中共革命者的家庭、特別是烈士家庭的人，因為他們在緊要關頭能夠靠得住，絕對忠實於黨。鄧小平需要完全忠誠於改革並理解改革的人，而江澤民正是這樣的人。鄧所需要的人也必須能果斷嫺熟地處理危機，江澤民則在處理學生示威和查封《世界經濟導報》時表現出了這種素質。鄧小平所尋找的人還必須能與各種人搞好關係，而江澤民在上海和北京都證明了他能夠同其他幹部和睦相處。在開朗的外表背後，江澤民其實是個聰明成熟的政治人才。雖然他沒有在北京黨的權力結構內部工作過，但他利用在政治局的三年熟悉了黨的領導人和中央事務，並被公認為能有效處理政治問題的人才。<sup>[21-30]</sup>

## 強硬派學生的堅持：5月20日–6月2日

5月20日軍隊在北京實行戒嚴失敗後，有越來越多的人蜂擁回到了廣場，群眾的支持和對實行戒嚴的憤怒使他們士氣高昂。雖然有些學生因疲倦或害怕回到了校園，但不斷湧入的外省學生填補了他們的位置。

5月29日晚，面對著天安門上毛澤東的畫像，豎起了一尊巨大的仿照美國自由女神製作的「民主女神」石膏像。學生們還舉行了一個簡短的儀式，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sup>[21-31]</sup>這個塑像是由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在三天內倉促完成，分拆後用腳踏三輪車運到廣場的。本來打算作為中國民主事業的永久紀念物，但在6月4日清場後被搗毀。

同時，運動的進程也開始發生變化。據鐵路官員估計，在這段時間有大約40萬學生乘火車到達或離開北京，但到5月30日離京的人要多於到達的人。<sup>[21-32]</sup>很多示威者擔心受到懲罰，希望通過談判軟化當局立場。到5月底時，學生領袖就像他們所反對的宣傳部一樣，開始限制記者接觸普通示威者，以便對群眾所能得到的消息進行控制。但是消息很難控制，因為學生本身就不團結；那些脫穎而出的學生領袖作為大膽的演說家可以做到一呼百應，卻不是能夠制定長遠的統一計劃的戰略家。學生們無法就行動達成一致。為了取得最低限度的團結，仍留在廣場的學生接受了如下誓言：「我願用我全部的生命和忠誠，誓死保衛天安門，保衛首都北京，保衛共和國。」<sup>[21-33]</sup>

## 鎮壓：6月3–4日

沒有證據表明鄧小平在決定向天安門派出武裝部隊時有任何遲疑。6月3日凌晨2點50分，他命令遲浩田「採取一切手段」恢復秩序。當時在北京的西方學者、很有眼光的墨寧（Melanie Manion）解釋了鄧小平的理由：「即使為了控制騷亂而在6月3日清空街道，也極有可能無法結束抗議運動……抗議者只會暫時撤退，然後又會積累起更大的力量……6月4日動用武力，確實立刻一勞永逸地結束了這場運動。」<sup>[21-34]</sup>據鄧小平的家人說，不管鄧小平受到多少批評，他從未懷疑自己作出的決定是正確的。<sup>[21-35]</sup>很多觀察者看到五月底廣場上的人越來越少，認為不使用暴力清空廣場也是

可能的。但鄧小平不僅擔心廣場上的學生，而且擔心國家權威的普遍弱化，他斷定為了恢復政府的權威，必須採取強硬行動。<sup>[21-36]</sup>

此時距蘇聯瓦解還有兩年，但是鄧小平在 1989 年就堅信，蘇聯和東歐領導人沒有為維護黨和國家的權力作出足夠的努力。在波蘭，1989 年 4 月 4 日的圓桌會議使團結工會取得了政治控制權，將總統一職改為由選舉方式產生，隨後便是共產黨的解散。巧合的是，波蘭定於 6 月 4 日舉行大選，而中國軍隊則在這一天佔領天安門廣場。曾在蘇聯留學的江澤民後來讚揚鄧小平行動果斷，使中國沒有像蘇聯那樣分崩離析。<sup>[21-37]</sup>

總數大約 15 萬人的部隊已經在京郊集結待命。<sup>[21-38]</sup>他們大多數是乘火車來的，但也有一些士兵是在 6 月 1 日乘十架飛機從更遙遠的成都和廣州抵達北京。為了預防需要更多的軍隊，廣州機場從 5 月 31 日開始有六天沒有售票。軍隊來自七大軍區中的五個，不過所有軍區司令員都表示贊成動用軍隊控制廣場，因此並不存在某軍區事後反對鎮壓學生的風險。無論結果好壞，他們都在一條船上。

在鎮壓過程中，軍隊的謀略家為了不使道路被封堵，早在 5 月 26 日就派出小隊士兵滲透到北京市內。保密是關鍵。有些部隊乘坐的是沒有標記的卡車，武器也被藏了起來。有些部隊為避免受到注意，穿著便裝步行或騎自行車三五成群地進城。有些士兵守在交通要道附近，戴著墨鏡，穿得像是地痞流氓。還有些人被允許穿著軍裝，但扮成外出進行常規跑步訓練的樣子。<sup>[21-39]</sup>幾天內，他們不斷以小規模分頭進城，但在 6 月 2 日即星期五，進城士兵的數量增加了。尤其是一大批士兵逐漸集結到了天安門廣場以西約四英哩的軍事博物館，這裏將成為部隊和裝備的重要集結地之一。很多受過特別良好訓練的部隊也開始通過地下通道到達天安門廣場旁邊的人民大會堂內，他們將以訓練有素的方式幫助天安門清場。還有一些穿便裝的士兵被佈置在全市一些重要地點，負責提供有關道路封鎖狀況和示威者動態的情報。

5 月 19 日軍隊第一次試圖實施戒嚴時是在夜間行動，他們錯誤地以為人們都在睡覺，沒有想到北京市民會借著月光湧上街頭。軍隊領導人第二次採取行動時選擇了 6 月 3 日夜間，按陰曆這應該是最黑的一個夜晚。這個日子還有一個好處，因為 6 月 4 日是星期日，如果秩序能在這一天得以恢復，那麼混亂就基本上被控制在週末而不是平常的工作日。

鄧小平在 6 月 3 日承認，即使天安門廣場和整個北京的秩序大體得到恢復，也需要幾個月甚至數年時間才能改變人們的想法。他並不著急，並且覺得沒有必要譴責那些參加絕食、示威或請願的人。他命令軍隊只把違法者和試圖顛覆國家的人作為目標。他告訴他們，鎮壓的理由是，為了繼續改革開放，實現國家的現代化，中國需要和平穩定的環境。

在解釋動用軍隊的理由時，鄧小平承認需要進行政治改革，但是他也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說，如果讓示威和貼大字報的現象繼續下去，就沒有精力把事情做好。他說，黨的領導人要解釋恢復秩序的決定，說服各級幹部，讓他們相信對抗議者採取行動是正確的。

<sup>[21-40]</sup>

在 6 月 3 日之前的幾天裏，學生開始覺察到軍隊調動的一些跡象，但是他們不清楚已經有多少士兵滲透進市中心。此外，大多數學生無法想像他們的抗議會導致開槍。在 6 月 3 日之前，學生有幾次投票表決是否繼續佔領廣場。大多數人都投票贊成留下，因為主張離開的人已經用腳投了票。但是在 6 月 4 日前的幾天裏，一些學生領袖害怕受到懲罰，試圖與政府談判。他們說，離開廣場的條件是保證他們不受懲罰，並且學生組織得到正式承認。<sup>[21-41]</sup>但他們沒有獲得這樣的保證。

6 月 2 日夜裏，街頭傳出了一些部隊正在開進北京的傳言。示威者及其支持者到處傳話，結果，軍隊試圖進城時有很多部隊車輛遭到堵截、推翻甚至燒毀。同時，政府官員則要求繼續推進。6 月 3 日下午喬石召開緊急會議研究清場的最後方案。楊尚昆把方案交給了鄧小平，立刻得到批准。<sup>[21-42]</sup>領導人在 6 月 2 日估計會遇到示威者一定程度的抵抗，但是他們低估了對抗的強度。據陳希同說，人們「圍困並毆打解放軍。……還有暴徒搶奪槍支彈藥和其他軍用物資。中央機關和一些重要部門遭到衝擊」。抵抗的規模和決心讓李鵬十分焦躁，他第一次使用了「反革命暴亂」的說法，這意味著要像對待敵人那樣對付抵抗者。他說：「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去鎮壓首都這場反革命暴亂。我們對付這一小撮暴亂分子不可手軟。授權解放軍戒嚴部隊、武警、公安必要時運用任何方法去對付阻撓這項任務的人。」<sup>[21-43]</sup>

6 月 3 日各集團軍司令也在北京軍區司令部開會，研究了進攻計劃的細節：將用機動車把士兵分三批運進北京，每一批部隊都從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同時行動。第一批將在下午 5 點到 6 點半之間從三環和四環出發，第二批在 7 點到 8 點之間出發，第三批在 9 點到 10 點半之間出發。早到的卡車上有些並不會配備武器，但前三批軍隊之後將有兩批武裝軍人趕到：一批將在 10 點半出發，另一批午夜後出發。<sup>[21-44]</sup>士兵要在黎明前清空廣場。

行動按計劃進行。6月3日下午6點半，廣播和電視發佈了緊急通告，為了保護生命安全，工人要堅守崗位，市民要留在家裏。中央電視台不停地播放這條通告，廣場上的大喇叭也同樣廣播。<sup>[21-45]</sup>但是通告沒有具體說明部隊就要進城。由於政府已多次發出其他警告，很多人並沒有足夠重視「保護你們的生命」這句話。

6月2日和3日，抗議的學生採用了他們自5月19日以來學會的策略。儘管有對講機的人很少，但他們很好地利用了摩托車來傳遞部隊移動的消息。數百名稱為「飛虎隊」的騎摩托車者向各個地點傳送消息，告知部隊的動向，使人們能夠及時設置路障。當路障迫使領頭的卡車停下來時，人們便一擁而上，割破輪胎或放氣，使卡車無法繼續前進。然後人們又割斷線路或拆卸零件，開始嘲弄車上的士兵，並朝他們扔磚頭石塊，有時候還攻擊坐在卡車後面的士兵。路障在一些地方很有效，不但擋住了第一批卡車，而且使後來出發的卡車也無法繞過前面不能動彈的車隊。<sup>[21-46]</sup>

最激烈的抵抗和暴力發生在6月3日夜晚到4日凌晨天安門以西四英哩的大街上，這裏離木樨地不遠，附近的高層住宅樓居住著很多退休的高幹。38軍的部隊在晚上9點半到達木樨地時，看到數千名市民聚集在這裏阻止他們前進。公車被拖到木樨地的路中央，擋住了裝甲車前行。解放軍先是放催淚瓦斯和橡膠子彈，但沒有多大效果，人們大膽地向部隊投擲石塊和雜物回應。有個軍官用擴音器命令人群散開，也沒有奏效。由於38軍軍長徐勤先以身體抱恙為由拒絕帶兵，這支從西面開過來的軍隊就像在中國內戰中向解放軍投誠的國民黨軍隊一樣，承受著需要證明自己忠誠的特殊壓力。大約10點半前後，木樨地附近的部隊開始朝空中鳴槍，投擲眩暈手榴彈，但並未造成死亡。

夜裏11點時，仍然無法前進的部隊開始直接向人群射擊，使用的是每分鐘能發射90發子彈的AK-47自動步槍。有人中彈時其他人就會將傷者搬離危險區，把他們抬上救護車或放在自行車和三輪車上，迅速送往最近的復興醫院。解放軍的卡車和裝甲車也開始全速前進，壓過任何敢於擋路的人。<sup>[21-47]</sup>即使開始使用真槍實彈、以致命武器對付同胞，部隊仍然用了大約四個小時，才走完從木樨地到天安門大約四英哩的路程。<sup>[21-48]</sup>

在天安門廣場，雖然半夜之前到達的部隊人數有限，但一些警察和便衣早在幾小時前就已經來到這裏。晚8點，燈光照亮了廣場和東長安街，到晚9點時這條大街上已幾乎空無一人。裝甲車和坦克開始載著部隊進入廣場。在數英哩之外，當軍隊從東邊向廣場開進時，一些步槍子彈擊中外國攝像師和記者們所在大樓的窗戶——軍隊這是在警告他們不要靠近視窗，因為那裏可以拍攝到廣場附近的屠殺畫面。一些穿便衣的軍官擋住外國人，告訴他們離開大街以免受傷，並警告他們不要拍攝軍事行動的照片。很多拍攝者的照相機和膠捲被沒收。<sup>[21-49]</sup>

在部隊開始進入廣場之前，廣場上仍有大約10萬名示威者。6月4日即星期日凌晨1點，軍人們開始從不同方向到達廣場。在廣場四周、長安街和人民大會堂前，士兵開始朝著向他們謾罵、扔磚頭並拒絕離開的平民開槍。抗議者沒有想到士兵會用真槍實彈對付他們，當一些被打死或打傷的抗議者被抬走時，剩下的人才變得恐慌。

到凌晨兩點時廣場上只剩下幾千人。學生領袖柴玲宣佈，想走的就走，想留的就留。臺灣流行歌手侯德健和劉曉波等幾位著名知識分子早在6月2日就來到天安門廣場，當時他們都認為這可能是學生佔領廣場的最後幾天。<sup>[21-50]</sup>侯德健用麥克風警告仍然留在廣場上的人說，武裝部隊正在向廣場推進。他說，現在聽他講話的人已經證明了自己是不怕死的，但是血已經流得夠多了，留在這裏的人應該和平撤離，不要留下任何可以被當作武器的東西。

當部隊步步逼近時，侯德健和另外三個人於3點40分左右與戒嚴部隊見面，協商和平撤離天安門廣場。經過簡短的談判之後，解放軍軍官表示同意。凌晨4點廣場燈光關閉。侯德健返回後不久就通過話筒宣佈了他們達成的協議，讓留在廣場的學生馬上離開。大約3,000人跟隨著侯德健匆匆離開了廣場。4點半軍隊和軍車向前推進，留下來的學生往西南方撤退。早上5點20分時大約只剩下200名無畏的示威者。他們被部隊強行趕走時，是黎明之前，5點40分，正如清場命令所要求的那樣，廣場上沒有剩下一個示威者。<sup>[21-51]</sup>

據一些目擊者說，廣場上有人中彈，但政府發言人否認凌晨4點半到5點半之間廣場上有任何人中彈，這是含蓄地承認了此前和此後可能有人遭到射殺。<sup>[21-52]</sup>政府也不否認廣場附近的長安街上有人遇害。很多人想弄清楚那天晚上的死亡人數，但各種估計數目出入極大。中國官方在6月4日幾天後的報告中說死了200多人，包括20名軍人和23名學生，大約2,000人受傷。<sup>[21-53]</sup>李鵬在7月2日對布蘭特·斯考克羅夫特說死了310人，其中包括一些解放軍戰士和36名學生。<sup>[21-54]</sup>遇害人之一的母親丁子霖後來試圖搜集當晚所有遇害人的姓名，截至2008年為止她總共搜集到近200個姓名。據38軍政委李志遠的報告，除了死傷的士兵外，有65輛卡車和47輛裝甲運兵車被毀，另有485輛軍車受損。<sup>[21-55]</sup>認真研究過這一事件的外國觀察家所作出的最可靠估計是，遇害的示威者大約在300人到2,600人之間，有數千人受傷。最初一些外國的報道說有上萬人死亡，但後來都承認這是嚴重的誇大。當時在北京的加拿大學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根據外國武官的估計以及來自北京所有11所大醫院的數據報告說，這些醫院中至少有478人死

亡，920 人受傷。<sup>[21-56]</sup>有些人相信死亡人數可能高於這些醫院紀錄的數位，因為一些家庭擔心傷者或家人受到長期政治迫害，或私下治療，或通過非常規渠道處理了死者的屍體。<sup>[21-57]</sup>

解放軍和警察在清場之後，花了幾天時間清掃示威期間遍地垃圾的廣場並搗毀了民主女神像。雖然與當地市民發生了少量扭打，但那晚的流血鎮壓之後，北京和天安門廣場很快就恢復了令人不安的平靜。

示威的學生領袖受到追捕：有些人被短期拘留，還有一些人被投入監獄。甚至一些著名知識分子，譬如在廣場上勸說學生撤離的戴晴，也遭到逮捕和監禁。鄧小平親自決定將趙紫陽的秘書鮑彤判刑七年，但他服刑期滿後仍然處在嚴密的監控之下。趙紫陽的另外一些部下也被監禁，一些示威者在 20 多年後仍未獲釋。通過「地下通道」提供的藏身處以及勇敢的友人的幫助，包括柴玲和吾爾開希在內的一些學生領袖，以及像嚴家其和陳一諮那樣的知識分子領袖，設法成功逃往國外。而王丹被監禁幾年後獲釋，他流亡到西方，在那裏繼續自己的學業。

## 溫室中的一代和被推遲的希望

參加 1989 年示威的學生以及較年長的知識分子，像中國歷史上的文人一樣，對國家的命運懷有一種很深的責任感。然而，這些學生是溫室中長大的一代，沒有多少校園之外的經驗。與 1940 年代後期的學生不同，他們沒有用多年時間建立奪權組織；也不同于 1980 年代初的學生，他們沒有經歷過政治運動和文革的鬥爭，也沒有經受過上山下鄉的鍛煉。他們是這一代人中最有才華的學生，但卻只接受過考試的訓練，而缺少人生歷練。他們是在中國最好的中學和大學裏備受愛護的教育改革的受益者。

此外，這些學生成長的這段歷史時期，並沒有為獨立的政治活動者提供空間，讓他們形成組織並檢驗自己的思想。示威者不是政治組織的成員，只是一群人中的一分子，領導者不斷變化，參與者鬆散結合。在運動中脫穎而出的人，不是因為他們展現了傑出的判斷力和戰略規劃能力，而是因為他們的即興辯才和敢作敢為。留在廣場上的人始終抱著一種幻想，以為國家領導人會承認他們的愛國熱情和高尚情操，與他們對話，認同他們對國家的關心是正當的，並解決他們所提出的問題。<sup>[21-58]</sup>

這些溫室中長大的一代學生就像孫中山所描述的 1920 年代的中國一樣：一盤散沙。趙紫陽的對手指責趙煥動學生，使他們把矛頭對準鄧小平；趙紫陽的擁護者則反過來指責對方激怒了學生，使趙紫陽陷入尷尬的境地。趙紫陽的支持者和對手或許都想引導示威學生，但事實上他們都無法做到。學生們踏著自己的鼓點前進。甚至學生自己的領袖也只能鼓動他們，卻不能控制他們。

「六四」之後，學生及其家人為死傷者而悲痛，也為失去了中國在不久的將來變得更開放、更文明的希望而悲痛。當學生領袖們思考「六四」之後該往何處去時，他們彼此承認自己挑戰國家領導人，期待他們放棄權力的做法太幼稚。這一代和後來的學生們，都從這次可悲的經驗中汲取了教訓：跟國家領導人直接對抗很可能引起暴力反應，付出不必要的代價。

因此，與蘇聯和東歐的抗議學生不同，中國的學生在「六四」之後不再跟共產黨對著幹了。很多學生逐漸相信，只有通過緩慢地建立基礎，通過改善更多人的經濟生活，通過加深人們對公共事務的理解，逐漸形成對民主和自由的經驗，才能取得進步。甚至很多不是黨員的學生也承認，領導人當時面臨著國家失控的危險，只有共產黨才能維持促進經濟發展所不可缺少的穩定。很多人相信，儘管有腐敗和自私的幹部，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所實施的改革開放政策——以及它所帶來的人民生活的改善——要比其他可能的選擇更可取。他們希望，接下來幾十年的穩定和經濟發展，能為自由社會形成一個更牢固的基礎。同時，絕大多數學生運動活躍分子都放棄了集體行動，專注於追求個人前程。

很多知識分子、甚至一些黨的高級幹部也認為，向無辜的人們開槍的決定是不可饒恕的，黨遲早要為這場運動翻案。儘管在決定動武中起積極作用的人仍然在世的時候，「六四」還很難平反，但政府的立場已經有所軟化。在鎮壓後的 20 年裏，很多坐牢的人都被釋放，官方對這一事件的說法也逐漸變得溫和：先是稱為「反革命暴亂」，然後改為「暴亂」，後來又成了「政治動亂」，最終變成「八九風波」。

## 天安門意象的力量

1989年6月4日的殘酷鎮壓，讓我們所有關心人類福祉的人瞠目結舌。天安門廣場的悲劇在西方掀起的抗議聲浪，遠大於亞洲過去那些規模相近的悲劇。<sup>[21-59]</sup>例如，1947年2月28日，已經接管臺灣的國民黨為了消滅任何有可能抵抗的地方領袖，由國民黨將軍陳儀殺害了上千名當地的重要人士。這一事件幾十年來一直使「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心懷怨恨，但在臺灣之外並沒有引起多大注意。南韓總統全斗煥在1980年為消滅光州的反抗勢力也進行過血腥鎮壓，屠殺的人數遠遠多於1989年的天安門，但西方電視台並沒有報道光州事件，國際社會對南韓領導人的譴責也無法與天安門悲劇後中國領導人受到的譴責相比。

美國學者趙文詞（Richard Madsen）對這些事件進行分析比較後，提出了一個問題：西方民眾為何對天安門悲劇作出如此強烈的情緒反應？他給出的回答是：這既與電視將該事件戲劇性地同步展示於觀眾眼前有關，也與學生認同西方理想有關。簡言之，趙文詞認為，北京的鎮壓觸動了人們的神經，因為它被解讀成對美國神話——即經濟的、思想的和政治的自由終將勝利——的攻擊。很多外國人以此把鄧小平視為自由的敵人，因為他鎮壓了捍衛他們信念的英勇的學生。<sup>[21-60]</sup>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儘管被野蠻行徑所傷害的人數遠遠多於「六四」事件，但當時能去中國採訪的外國媒體的數量無法與後來相比。弔詭的是，鄧小平使中國向外國媒體開放，卻使外國記者得以把他在天安門廣場的鎮壓行動向全世界報道。

在1989年春天之前，外國記者在中國的活動和與中國人的接觸都受到極大限制。幹部們迫於不允許洩露「國家機密」的壓力，很少與媒體對話，即使對話時也心存戒備。直到1989年4月以前，如果記者要會見想發佈消息的異見人士，只能秘密見面，以免給這些人帶來麻煩。

因此，對於試圖一窺幕後真相的外國記者來說，北京之春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確實，對於大多數駐京的外國記者來說，報道1989年4月15日到6月之間的學生示威，是他們職業生涯中最興奮的時刻。在這段時間裏，他們在不利的環境中以達到體力極限的強度工作，捕捉著學生對自由民主的渴望，並在本國的電視和平面媒體上報道這幕激動人心的大戲。

同時，和記者們熱衷於報道學生一樣，學生們也熱切希望自己的觀點讓更多的人知道。北京市民對學生毫不掩飾的大力支持，使記者和學生都難以想像政府會向自己的人民開槍。很多記者事後自我批評說，他們像自己所報道的學生一樣沉浸在興奮之中，以至於看不到潛在的危險，未能讓西方觀眾對後果有所準備。

到5月底時，西方的電視觀眾和報紙讀者已經完全認同為民主而戰的學生，因此他們把血腥的結局視為鎮壓「我們的」學生，學生的立場就是「我們的」立場。民主女神像尤其讓美國人感到親切，因為它顯然是對自由女神像所代表的一切的渴望。在西方觀眾看來，無畏的青年示威者是被冷酷的獨裁者射殺的。記者看到自己剛剛結識的學生被打擊和槍殺，無不感到義憤填膺，以至於情不自禁地誇大了恐怖。有人報道被殺害的示威者多達5,000人甚至10,000人。6月4日之後，有關中國已處在內戰邊緣的說法，仍然頻頻出現在西方媒體上，甚至直到6月9日鄧小平會見各大軍區領導人時仍是如此。但對於客觀的觀察者來說，局勢此時顯然已經穩定下來。<sup>[21-61]</sup>

在極力控制事態的中國領導人看來，外國媒體成為了推波助瀾的「黑手」，因為中國的酒店職員、靠近香港的南部城市的居民以及海外華人，都能夠收聽收看到這些節目。確實，很多中國人都熱切收聽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和美國有線電視（CNN）的報道。中國的專業記者羨慕那些能夠自由報道他們所見所聞的西方記者，並在自己寫報道時試圖擴大自由的尺度。

天安門事件之後，那些相信美國出於國家利益需要與中國政府合作的商人、學者和美國政府官員，很容易就會被指責為跟北京的「邪惡獨裁者」沆瀣一氣。在冷戰就要結束之際，很多敢言的美國自由派主張：我們的政策應當反映我們的價值觀，我們不應當縱容獨裁者，而是應當站在民主和人權一邊。表達西方人對這些理想的信念，還有比譴責天安門鎮壓的責任人更好的方式嗎？因此，鄧小平在「六四」後所面對的敵意，不但來自義憤填膺的中國年輕人和市民，而且來自與示威者秉持同樣價值觀的西方官員。

## 假如？

這場造成如此嚴重的人道災難並被全世界所見證的巨大悲劇，使所有關心人類福祉的人都會提出一個問題：這場大災難是否可以避免？尋找悲劇直接原因的人將其歸咎於鄧小平採用一切必要手段清空廣場的決定。批評鄧小平的人



說，假如他在 1989 年 4 月 26 日沒有以如此強硬的態度對付「動亂」，假如他更願意聽聽學生的意見，或者，假如他能夠用盡一切非暴力手段，那麼天安門清場就不會發生如此嚴重的暴力，造成生命的喪失。批評趙紫陽的人認為，假如他對學生少一些鼓勵，以更果斷的方式對待他們，假如他不那麼關心自己的「開明領導人」形象，最後的悲劇也許能夠避免。批評李鵬的人稱，假如他沒有如此頑固地拒絕與學生對話並體諒他們的關切，如此急迫地譴責他們，如此斷然地推出「四二六社論」並給學生貼上「動亂」分子的標籤，如此僵化地輕蔑學生且缺乏起碼的同情心，那麼悲劇可能就不會發生。批評陳希同和李錫銘的人則說，假如他們向鄧小平等老幹部彙報時沒有誇大事態的嚴重性和外國勢力捲入的程度，鄧小平等老幹部也許不會覺得必須作出如此強硬的反應。

批評學生領袖的人說，假如他們不那麼虛榮，不那麼自視過高，對他們造成的危險不那麼無知，悲劇可能不會發生。還有人認為，假如學生和北京市民在 5 月 20 日沒有阻擋試圖以和平方式恢復秩序的部隊，政府也許能夠避免在兩周之後開槍。批評西方人的中國人認為，假如沒有西方人對學生的抗議煽風點火，沒有外國「黑手」試圖顛覆中共和社會主義制度，示威活動絕對不會失去控制。

尋找深層原因的人將矛頭指向鄧小平和趙紫陽在 1988 年放任通貨膨脹加劇和放鬆對消費品價格控制的決定，這個決定使群眾感到憤怒和焦慮。還有人批評高層官員濫用權力和特權，恐嚇群眾，毫無必要地嚴密監控個人生活，讓自己的親友大發不義之財。有些保守派譴責市場改革走得太快，從而助長貪婪，導致了官場腐敗。還有人相信，鄧小平沒有使國家更快地走向民主，在 1986 年沒有支持胡耀邦，才是那場衝突的最終原因。鄧小平確實認為，處於最高層的幹部有責任作出決定，儘管要傾聽建設性意見，但最終必須做他們認為對國家長遠利益有幫助的事。有些人說，假如鄧小平進行更多的選舉試驗，削弱集權主義領導體制的禁錮，引入法治，懲治貪官，國家也許能夠進步得更快，從而避免來自學生的挑戰。

還有一些幹部讚賞鄧小平處理天安門示威的方式。他們認為，當 1989 年 5 月底天安門廣場的形勢開始失控時，鄧小平採取的強硬措施是中國人民得以維護國家團結的唯一選擇。很多幹部認為，在鄧小平無法用不向人群開槍的戒嚴令恢復秩序之後，他已經別無選擇，只能以他最終所採用的方式來維護國家的統一。當很多中國人把鄧小平對北京學生騷亂作出的反應與戈巴卓夫和東歐領導人對付本國動亂的做法加以對比時，他們認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今天的情況要好得多。他們堅信，中國仍然處在早期發展階段，假如領導人讓知識分子享有他們所追求的自由，中國不可能維持統一。他們也承認 1989 年悲劇的嚴重性，但是他們相信，假如鄧小平在 1989 年 6 月未能終止持續兩個月的混亂，中國有可能發生更大的悲劇。

作為學者，我們和其他關心人類生命和自由的人一樣，都很想找出這場悲劇的明確原因，然而事實是我們誰也無法斷定，假如採取另一種做法會發生什麼。畢竟，這一事件才過去 20 年，對鄧小平的決策所造成的長期影響蓋棺定論是不可能的。假如中國人民在未來歲月裏獲得了更多的自由，這條通向自由的路是否要比前蘇聯的道路少一些曲折？1989 年春天的事件是不是一個重要因素？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不知道答案。

但我們確實知道的是，在天安門事件後的 20 年裏，中國人享受著社會的相對穩定和經濟的快速增長，甚至是奇跡般的增長。小規模的抗議不計其數，領導層為發生更大抗議的可能危險而緊繃著神經，但是中國在「六四」之後的 20 年裏避免了大規模的騷亂。今天，億萬中國人的生活要比他們在 1989 年時舒適得多。與中國歷史上任何時期相比，他們都得到了更多的國際信息和觀念。教育水平和人均壽命也在繼續迅速提高。由於諸如此類的原因，中國人對民族成就的自豪感遠超上個世紀。

我們也知道，中國人對更多的個人自由和更能代表他們的政府仍然懷著深切的渴望。官場腐敗引起的民怨自 1989 年以來有增無減。很多中國人擔心，沒有更加獨立的媒體和司法制度，很難在控制腐敗上取得進步。很多中國領導人顯然認為，鄧小平把經濟的快速增長與老百姓支持的增強聯繫在一起是正確的，但他們也擔心一個終極的「假如」：假如在增長的步伐放緩之前，他們無法在解決這些問題上取得進展，那將會發生什麼？

[21-1]Ziyang 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Zhao Ziyang*, trans. and ed. Bao Pu, Renee Chiang, and Adi Ignatiu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9), p. 27.

[21-2]Timothy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the Beijing Democracy Movemen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4.

[21-3]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27–28.

[21-4]《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5月17日，現藏 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1-5]James Lilley with Jeffrey Lilly,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4), p. 309.

[21-6]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28–29. 李鵬對這些會議的記述，則是從一個批評趙紫陽不願為恢復秩序採取必要措施的觀點來闡述的，見《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5月17日、18日、19日。

[21-7]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25–34; 2006年10月、2007年7月採訪趙紫陽的女兒王雁南。

[21-8]據 Beijing TV Service, reported in FBIS, May 19, pp. 13–14, reprinted in Michel Oksenberg, Lawrence R. Sullivan, and Mark Lambert, eds., *Beijing Spring, 1989,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 The Basic Document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 pp. 288–290; Mike Chinoy, *China Live: Two Decades in the Heart of the Dragon* (Atlanta: Turner Publishing, 1997), p. 217;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42–43.

[21-9]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27–34.

[21-10]TP, p. 277.

[21-11]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48–87.

[21-12]《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5月18日。

[21-13]《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5月19日、20日。

[21-14]TP, p. 222.

[21-15]《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5月20日。

[21-16]據 Sandra Burton 接受 Amy Zegert 採訪時所言。Amy Zegert 允許我查閱她為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修倫斯坦中心所做的 23 次採訪，採訪對象是 1989 年在北京做報道的記者。在此對她深表謝意。

[21-17]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48–78. 卜正民 (Timothy Brook) 6 月 4 日之前一直在北京，6 月 4 日之後對軍隊在天安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做了大量採訪。當時駐北京的一位美國武官對卜正民的書所作的評論見 Larry Wortzel, "Review: *Quelling the Peopl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1 (January, 1994), pp. 123–126.

[21-18]《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5月22日。

[21-19]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43–77.

[21-20]TP, p. 265.

[21-21]《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5月21日。

[21-22]《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5月19日，25日。

[21-23]TP, pp. 277–279, 291.

[21-24]TP, p. 305.

[21-25]《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5月31日。

[21-26]《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5月19日。

[21-27]TP, pp. 297, 308–314.

[21-28]《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5月31日。

[21-29]TP, pp. 323–328. 對鄧向李、姚解釋的另一個譯文見 Oksenberg, Sullivan, and Lambert, *Beijing Spring, 1989*, pp. 333–338.

[21-30]Robert Lawrence 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The Life and Legacy of Jiang Zemin* (New York: Crown, 2004). 雖然這不是一本學術著作，但它所報道的情况大多準確。

[21-31]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87–88.

[21-32]TP, p.319.

[21-33]TP, pp. 288–289.

[21-34]Melanie Manion, "Introduction: Reluctant Duelists," in Oksenberg, Sullivan, and Lambert, Beijing Spring, 1989, p. xl.

[21-35]作者在 2007 年 7 月對鄧小平女兒鄧林的採訪。

[21-36]當我在 5 月最後一周見到劉賓雁時，他預見到了流血事件，因為他相信鄧小平要嚇住群眾。

[21-37]2006 年 11 月採訪江澤民。

[21-38]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73–74, 80.

[21-39]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89–91.

[21-40]TP, pp. 359–362.

[21-41]TP, pp. 353–354.

[21-42]《李鵬六四日記》，1989 年 6 月 3 日。

[21-43]TP, pp. 368–369.

[21-44]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108–113.

[21-45]TP, p. 368–371; Andrew Scobell, *China's Use of Military Force: Beyond the Great Wall and the Long Mar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50–151.

[21-46]TP, p. 365;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114–120.

[21-47]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121–122.

[21-48]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114–130; TP, pp. 372–377.

[21-49]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118–120.

[21-50]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 94.

[21-51]Long Bow Group,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video recording, produced and directed by Richard Gordon and Carma Hinton (San Francisco: Distributed by NAATA/CrossCurrent Media, 1996);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 145; TP, pp. 377–382, 389–391. 雖然這些文獻的記述大體一致，但對事情發生的時間估計有所不同。

[21-52]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133–148.

[21-53]TP, pp. 383–385.

[21-54]George Bush and Brent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New York: Knopf, 1998), p. 109.

[21-55]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 130.

[21-56]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 161.

[21-57]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151–169.

[21-58]很多領袖人物都出現在 Long Bow Group 的電影《天安門》（*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中，這部電影多年來一直受到人們的認真研究。

[21-59]這一部分內容我使用了 Amy Zegert 對當時記者們的採訪，但是她不對我這裏任何解釋承擔責任。關於美國有線電視（CNN）的報道見 Chinoy, *China Live*.

[21-60]Richard Madsen,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A Moral Inqui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 1–27.

[21-61]例如《紐約時報》記者 Nicholas D. Kristof 和 Sheryl WuDunn 的報道：「[6 月 4 日的]這些屠殺行動可能標志著結束中共統治的起點。」見 Nicholas D. Kristof and Sheryl Wudunn, *China Wakes: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 Rising Power*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4).

## 第 22 章

### 站穩腳跟：1989—1992

「六四」之後北京的氣氛一片肅殺，鄧小平所面對的民眾比共產黨掌權以來任何時候對黨都更加疏遠。到 5 月 20 日，情況就已變得很清楚，政府失去了城市居民和年輕人的支持，領導人都擔心政權難保。6 月 4 日動用武力威脅致使群眾屈從，但此舉只不過加深了黨與人民之間的鴻溝。軍隊也士氣低落——軍人為了替黨保住權力而槍擊無辜平民，他們無論如何不會覺得這是英雄壯舉，徵兵也因此陷入低谷。在經歷了 1988 年的通貨膨脹，胡耀邦之死和調動軍隊清空天安門廣場這些事件之後，民眾對鄧小平和中共的擁護跌至最低點，這與 1984 年時高漲的民意支持有天壤之別。

鄧小平相信，為了重新贏得群眾的擁護，黨迫切需要立刻加快經濟發展。然而，在 1988 年的通貨膨脹之後，控制著經濟政策的謹慎的保守派卻在抑制增長速度。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受到的挑戰也使很多中國人懷疑，共產主義在中國是否還有未來。

同時，西方的人權團體和海外的中國留學生都支持中國的異見人士，西方政治家也對中國政府實行制裁。在西方人看來，在北京發生的殺害那些進行自由民主抗議的無辜學生的行為，是比他們自己國家那些導致越南、柬埔寨等地大量平民死亡的決定更加惡劣的罪行。西方人權團體開始向中國人宣講自由和對生命的尊重。西方高官停止了訪華，並對出口技術、尤其是軍事技術加以限制。中國的外貿和旅遊業都蒙受了損失。西方人沉溺於天安門悲劇的戲劇性場面，西方電視台不斷播放搗毀民主女神像、搬運鮮血淋淋的屍體、試圖孤身一人擋住坦克的青年人這樣的畫面——所有這一切只會加強外國政府的反華情緒。外國對異見人士的支持和對華制裁是難以輕易消除的。

鄧小平相信，外國對示威者的支持和對中國的制裁，使得在中國維持控制變得更加困難。他知道外國人的批評會在中國贏得一些追隨者。但是在這個關鍵的交匯點，就像他下手鎮壓和頂住外國制裁一樣，鄧小平重新肯定了堅持對外開放的重要性。在 6 月 4 日幾天之前他打算讓解放軍採取他認為必要的措施恢復秩序時就說過：「我們要開放，不能收，要比過去更開放。」<sup>[22-1]</sup>為了重新贏得人們的信任，他說，必須幹出點兒實事，要抓緊調查和懲治腐敗大案，不管涉及到誰。他重申了第三代領導人必須繼續改革開放的政策。<sup>[22-2]</sup>

### 對首都戒嚴部隊軍級以上幹部的講話：1989 年 6 月 9 日

「六四」過去之後的幾天裏，鄧小平和領導層仍忙於抓捕他們眼中的「動亂」分子、清理城市和恢復秩序。由於鄧小平未在公開場合露面，很快就傳出了領導層發生嚴重分裂、政府面臨解體危險的流言。鄧小平在 6 月 9 日打破沉默，向領導鎮壓行動的軍級以上幹部發表了講話。講話的部分內容在電視上播出，使民眾在鎮壓之後第一次看到一位高層領導人。鄧小平感謝軍隊幹部在恢復秩序中發揮的關鍵作用。他還利用這個機會對群眾說，他們也應當感謝解放軍的貢獻，政府是穩定的，政策不會改變。

鄧小平首先說，他要向在這場鬥爭中為英勇捍衛黨和人民利益而犧牲的指戰員和公安幹警表示哀悼。他說，從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來看，這場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鄧小平說，幸運的是發生衝突時很多有經驗的軍隊老同志還健在，他們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勇氣。他承認有些同志不理解這次行動的必要性，但是他表示相信，他們最終會支持這一行動。鄧小平說，麻煩在於一些壞人混在學生和圍觀的群眾中間，他們的最終目的是推翻共產黨，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成為西方的附庸。鄧小平問道：「以後我們怎麼辦？我說，我們原來制定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照樣幹下去，堅定不移地幹下去。」<sup>[22-3]</sup>他重申了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性。<sup>[22-4]</sup>

### 對黨的領導人的講話

一周以後，即 6 月 16 日，鄧又對中央委員會的領導成員說，由於他本人就要退出日常工作，新的第三代領導人要完成平息「暴亂」的任務。要利用這次暴亂，注意過去的錯誤並加以改正，但基本原則不能變。「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經濟不能滑坡。……我們要用行動證明，我們的改革開放政策不但不會變，而且會進一步得到貫徹執行。」<sup>[22-5]</sup>鄧小平再次肯定了黨的戰略目標是正確的，即從 1980 年到 2000 年使經濟翻兩番，到下一個世紀中葉使中國成為中等發達國家。

在北京看過鄧小平講話的外國人說，他的語氣沉著自信，對自己採取的行動沒有絲毫悔意，對可能發生的情況沒有驚慌。<sup>[22-6]</sup>鄧小平似乎相信，6 月 4 日的武力展示已經讓反對勢力安靜下來，使黨和解放軍能夠建立牢固的控制。他宣稱，軍事行動為中國贏得了十到二十年的穩定。鄧小平的頑強與堅定，讓很多擔心中國可能陷入內亂的人感到放心。

鄧小平顯示出自信：中國有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幾乎與外界完全隔絕的經歷，一定能夠挺過 1989 年之後外國的制裁。他說，民主國家的政治變化很快，嚴厲的制裁最多只能延續幾年。他認為外國商人會向他們的政府施壓改善對華關係，以便他們能夠進入中國市場；外國政府也會重新認識到需要中國的合作。中國要站穩立場，鼓勵外國友人終止制裁，為好好利用將來的每一個機會作好準備。

鄧小平的估計被證明是正確的。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在 1990 年 11 月為使要求伊拉克從科威特撤軍的決議在安理會獲得通過，便與中國談判達成協議，以布殊總統會見錢其琛為條件來換取中國的支持。<sup>[22-7]</sup>雖然在這個協議之後大多數制裁措施仍在繼續，但此事是向恢復中美工作關係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 6 月的兩次公開講話後，鄧小平很少再公開露面，有關他生病或去世的謠言不絕於耳，報紙不得不時常刊登聲明予以否認。其實，鄧小平在 6 月中旬出席了四中全會，7 月初，會見了布殊總統的特使斯克羅夫特，隨後便去了北戴河，那裏是高層官員夏季療養的地方。<sup>[22-8]</sup>

## 四中全會： 1989 年 6 月 23–24 日

天安門悲劇過去三周後，中央委員會召開了十三屆四中全會。會議肯定了過去兩個月為制止動亂採取的措施是必要的和恰當的。全會公報讚揚了鄧小平等老幹部面對動亂時發揮的作用，讚揚了軍隊和警員的貢獻。全會還正式批准了高層的人事變動。趙紫陽被免去一切職務，任命江澤民為黨的總書記，宋平和李瑞環得到提拔，與江澤民、李鵬和喬石共同組成了政治局常委會。新的領導班子表示，要繼續沿著鄧小平及其同事開闢的道路前進。江澤民在全會的講話中再次肯定了我堅持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目標：實行改革開放，推動經濟發展。<sup>[22-9]</sup>

然而大問題依然如故：很多中國人想得到更多自由，而黨內元老則毫不動搖，認為維持秩序必須收緊控制，如何彌合雙方的鴻溝？對於瞭解鄧小平的人來說，他採取的戰略一點也不令人意外：他要推動經濟發展，加強「思想教育」。也就是說，他對知識分子實行西方式民主改革的呼籲不予理睬，並且他要讓群眾相信現行的制度最適合當前的中國。

## 向江澤民交班

對於如何能使接班人維護團結，繼續實行改革開放，鄧小平有過很多思考。鑒於群眾對「六四」悲劇的反應，鄧很高興他們選擇了一個沒有參與鎮壓的接班人，這可以讓群眾感到有一個新的起點。雖然江澤民在 6 月 4 日之前就來到了北京，但鄧小平要確保江澤民的名譽不因天安門事件而受損。為此，他個人承擔了在北京恢復秩序的責任，並且直到 6 月 24 日江澤民在四中全會上正式當選為總書記，才宣佈了對他的任命。<sup>[22-10]</sup>鄧小平在這時宣佈自己的接班人，也是要向黨和群眾表明，他是按正常程序 果斷移交了權力，並不是在匆忙推出一個接班人。黨內元老似乎也同意要有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心人物——雖然他們在 1978 年不願授予鄧小平最高的頭銜，擔心這會使權力過於集中，但是他們在 1989 年願意給江澤民這種頭銜，以便他能夠得到作為有效的國家領導人所必需的權威。

在「六四」後的幾周裏，鄧小平有理由對江澤民的表現感到滿意。江澤民學得很快並與推選他的黨內元老——除鄧小平之外，還有陳雲和李先念——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他表現出良好的政治直覺，並利用曾慶紅為他出謀劃策。曾慶紅在黨內政治中人脈極廣，過去就在江澤民手下擔任上海市委副書記，隨他一起來到北京後，擔任了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曾慶紅的父親曾山在黨內多年從事組織和安全工作，曾慶紅通過他知道了很多黨內的人事內幕；他母親鄧六金是延安幼稚園的園長，許多現在的領導人都是當年從那裏出來的孩子。曾慶紅很好地運用他的個人關係網，協助江澤民在

北京政壇上周旋。江澤民難以與根基深厚的鄧小平相比——鄧在北京有幾十年的經驗，對同事有廣泛而深入的瞭解——所以江澤民要依靠曾慶紅等精明的部下來處理好這些關係。

1989 年 8 月 17 日上午，仍在北戴河休養的鄧小平把楊尚昆和王震叫來，他對他們說，他打算在 11 月的五中全會上把自己仍然擔任的軍委主席一職交給江澤民。<sup>[22-11]</sup>黨內領導人明白，這不僅意味著把軍隊的控制權交給江澤民，而且是交出了對中國的全部責任。

鄧小平等人從北戴河回來後，又在 1989 年 9 月 4 日把黨內的高層領導人——江澤民、李鵬、喬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環、楊尚昆和萬里——叫到自己家中商量他的退休計劃。剛開會，鄧小平就提醒他們，他過去多次說過，自己最後的責任之一就是建立硬性的退休制度，使老幹部能夠自動把權力交給更年輕的領導人。鄧小平向他的同事表示，退休年齡沒有硬性規定是制度上的一個重大缺陷，不但在毛澤東晚年是這樣，而且是帝制時代的通病。（批評鄧小平的人可能會補充說，他們讚賞鄧小平的退休決定，但是假如他再早幾年退休也許更好。）鄧小平說，假如他死在任上，有可能引起國際麻煩，最好還是在他仍然在世時交出職務。但是，儘管如此，他覺得自己仍可以通過會見他所熟悉的外國客人發揮一定作用。

鄧小平指示說，預定於 1992 年召開的下一屆中共代表大會要解散中央顧問委員會。這個由陳雲擔任主任的委員會，只是作為一個「利用老一代革命家智慧」的臨時機構成立的。鄧小平宣佈，他在 11 月的五中全會上退休時，就像政府其他部門的退休過程一樣，要越簡單越好。<sup>[22-12]</sup>然後鄧小平說出了他的離別寄語：一定要讓群眾和外國人明白，中國領導人將堅持對外開放，這一點十分重要；他的接班人要維護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權威，如果沒有這種權威，中國就無法在困難時刻解決問題。<sup>[22-13]</sup>

鄧小平還指示他的接班人如何應付西方仍在繼續的制裁和可能的指責。他說：「概括起來就是三句話：第一句話，冷靜觀察；第二句話，穩住陣腳；第三句話，沉著應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靜、冷靜、再冷靜，埋頭實幹，做好一件事，我們自己的事。」<sup>[22-14]</sup>

同日，鄧小平又與中央負責幹部談了話，然後給全體政治局成員寫了一封信。他說：

以江澤民同志為首的領導核心，現已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經過慎重考慮，我想趁自己身體還健康的時候辭去現任職務，實現夙願。這對黨、國家和軍隊的事業是有益的。——作為一個為共產主義事業和國家的獨立、統一、建設、改革事業奮鬥了幾十年的老黨員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屬於黨、屬於國家的。退下來以後，我將繼續忠於黨和國家的事業。——我們的改革開放事業剛剛起步，任重而道遠，前進中還會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堅信，我們一定能夠戰勝各種困難，把先輩開創的事業一代代發揚光大。<sup>[22-15]</sup>

鄧小平決心繼續進行科學技術的對外交流和新技術的引進。他知道華裔美國人有強烈的愛國心，儘管天安門悲劇之後有外國的制裁，他們依然願意與中國保持聯繫，因此他邀請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訪華。媒體在報道 9 月 16 日鄧小平與李政道的談話時，宣佈了鄧小平的退休決定。鄧小平知道，「六四」之後民眾惶恐不安，擔心國家的命運。他也記得毛澤東在大躍進帶來困難後曾一度隱退，有關他生病或死亡的謠言滿天飛，為此報紙上有意刊登了毛澤東游長江的照片。同樣，不管鄧小平對「六四」之後中國的困難多麼擔憂，他與李政道的合影向世人展示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樣子。在向公眾公佈的照片中，鄧小平站在北戴河的海水裏。在這場被充分宣傳的會見裏，鄧對李政道說：「最近在北戴河每天游泳一小時。我不喜歡室內游泳池，喜歡在大自然裏游泳。」他承認中國最近的事件使人警醒，但他接著說：「現在我可以肯定，經過動亂，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和改革開放事業可以搞得更好。」<sup>[22-16]</sup>鄧小平的基本意思明白無誤：他對中國的前途仍然很樂觀，儘管有外國政客的批評，外國科技進入中國的大門仍然敞開著。

在 11 月 7 日的五中全會上，鄧小平將中央軍委主席一職交給了江澤民。楊尚昆成為第一副主席，他的弟弟楊白冰取代他成為軍委秘書長。政治局表彰了鄧小平作為第二代領導人作出的偉大貢獻。<sup>[22-17]</sup>11 月 8 日全會結束後，鄧小平來到人民大會堂與他過去的同事合影留念，他們一個接一個地走上前來與他握手。然後他回到家中，與家人一起舉行他的退休宴會，飯菜是由為他做了 30 年飯的廚師準備的。兩天以後，《人民日報》發表了鄧小平致中央委員會的信：「我感謝同志們的理解和支持，我衷心感謝你們接受了我的辭職請求。我衷心感謝全體同志。」<sup>[22-18]</sup>鄧小平退休的這一天柏林牆被推倒，但他的退休並沒有引起任何麻煩。

鄧小平把權力交給江澤民一年後，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也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吳作棟。此後李光耀盡量約束自己不去干涉接班人的工作，但是他說，自己仍然是個守門員，如果出了問題，他認為自己仍然有責任為維護新加坡的成就做一些必要的事情。同樣，鄧小平也對李政道說：「我主要就是希望完全退下來，但是動亂我要管。」<sup>[22-19]</sup>

鄧小平把權柄交給江澤民後，不再為重大事情拍板。他已經 85 歲高齡，行動不便，聽力也進一步下降，他把更多的時間用於休息。兩三年前他還以做事專注著稱，但現在已經做不到了。<sup>[22-20]</sup>1989 年 11 月以後，鄧小平不再主導

政治舞台，他不再參與重大問題的確定、大政方針的制定、作出最後決定或控制媒體內容。不過，他確實繼續會見重要的外國客人，他仍能在全局性的重大問題上發揮影響——如果必要，他還會使用這種力量。

## 維持中美交流

天安門事件後不久，喬治·布殊做了一件過去的任何美國領導人都沒有對中共領導人做過的事情——他試圖與鄧小平通電話。「六四」事件發生後，布殊總統也立刻宣佈了暫停與中國的軍事訂單和高層交往，並為在天安門悲劇中受到傷害的中國人提供人道主義與醫療幫助。他在 6 月 5 日還接見了中國留美學生，為他們提供政治庇護，並對他們那些受到迫害的中國同學給予支持。但是，與美國的輿論、尤其是主張嚴厲制裁中國的報紙相反，布殊說，他不想為了中國政府的行動而懲罰中國人民。布殊瞭解中美關係的艱難歷程，他要避免將來有可能給恢復中美關係造成更大困難的任何對抗。他說，從長遠看，繼續接觸能夠加強中國內部爭取更大自由的壓力。幾年後他回憶 1989 年的事件時說：「假如我沒有同那個人（指鄧小平）見過面，我也許不會那樣自信地認為，我們在天安門廣場事件後還應當同他們保持聯繫。」<sup>[22-21]</sup>布殊擔任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的時機（1974 年 9 月 26 日至 1975 年 12 月 7 日）很有利：他是在鄧小平開始接過周恩來會見外國領導人的工作不久後上任的，而他離開北京時，恰好也是毛澤東再次讓鄧小平靠邊站的時候。布殊的中國問題專家、在他擔任總統後派往北京當大使的李潔明說，布殊和鄧小平「在 1970 年代建立了一種不同尋常的親密關係，部分原因是他們都預感到對方將是他們各自國家未來的領導人」。<sup>[22-22]</sup>李潔明認為，事實上，在毛澤東、周恩來、尼克遜和基辛格退出政壇後，鄧小平和布殊繼續維持著過去的領導人為兩國建立的工作關係。他們兩人的關係輕鬆而友好：在 1975 年 12 月 6 日為祝賀布殊離開北京轉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告別宴會上，鄧小平對他開玩笑說：「你是不是一直在這裏搞間諜活動呀？」<sup>[22-23]</sup>布殊篤信私人外交，他會偶爾給鄧小平遞送信件。鄧小平對這種私人交往方式並不作出回應，但他願意隨時與布殊見面。<sup>[22-24]</sup>

鄧小平成為頭號領導人後，兩人繼續保持著聯繫。鄧小平在 1979 年 1 月訪美時，要求在休斯頓與布殊進行私人會面，見面時鄧小平把他仍然保密的攻打越南的計劃告訴了布殊。鄧小平去德克薩斯時，布殊也邀請他到母親家裏作客。後來，列根總統打算跟臺灣建立正常關係時，鄧小平和布殊副總統努力不讓中美關係出軌。確實，當兩國關係變得十分緊張時，鄧小平和布殊的會談使兩國關係轉危為安，從而為穩定兩國關係的 1982 年聯合公報鋪平了道路。<sup>[22-25]</sup>後來當布殊準備競選總統時，他的妻子芭芭拉去亞洲訪問期間被遣往北京親自將丈夫的打算告訴了鄧小平。1989 年 2 月，鄧小平向布殊坦率說明了中蘇關係的改善和中國準備迎接戈巴卓夫訪華。<sup>[22-26]</sup>幾年後，當布殊在電視上被問及他遇到的最偉大的領導人是誰時，他先是說沒有哪個人特別傑出，然後又補充道，鄧小平是個不同凡響的領導人。

但是，當布殊在 1989 年 6 月想與鄧小平通電話時，鄧小平並未接回應。回應外國領導人的電話不合中國領導人的慣例。於是布殊在 1989 年 6 月 21 日給鄧小平寫了一封親筆信：

寫此信時我的心情沉重。我本想與您親自討論此事，但很遺憾沒有做到。首先，我是本著真誠的友誼寫這封信的，因為我相信您一定知道，寫這封信的人強烈地認為美中之間的良好關係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我寫此信是想請您幫助維護這種我們雙方都認為十分重要的關係。……我請您一記住我們這個年輕的國家的立國原則。這些原則就是民主和自由。——這些原則難免會影響美國人看待其他國家的事件和作出反應的方式。這不是傲慢自大的反應，也不是想強迫別人接受我們的信念，這僅僅是對那些原則的持久價值及其普遍適用性的信仰。<sup>[22-27]</sup>

布殊接著又解釋說，作為美國總統，他不得不實施制裁。「當朋友之間遇到麻煩時，例如現在的情況，我們必須想辦法把它說清楚。……在我們這樣一個開放的制度中，常常不可能做到事事保密；但這是一封沒有副本的特殊信件，在我的私人檔案之外沒有任何副本。」<sup>[22-28]</sup>布殊在信中提議向北京派出一名私人特使。

布殊發出此信的次日，就收到了鄧小平回覆。他說，他準備接待派來的特使。布殊很清楚，「六四」剛過就派出特使會激怒美國民眾，因此他對派特使一事進行保密，即使是美國駐北京的大使館也沒有接到通知。（中國方面對訪問保密並無困難。）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特和副國務卿勞倫斯·伊格爾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飛往北京，於 7 月 2 日會見了鄧小平。在會見斯考克羅夫特和伊格爾伯格之前，鄧小平對李鵬和錢其琛說，今天和美國人的會談只談原則，不講具體問題；中國要改善與美國的關係，但中國領導人既不怕美國人，也不怕制裁，外交人員要牢記這一點。<sup>[22-29]</sup>

據陪同斯考克羅夫特的美國人說，鄧小平親切問候了斯考克羅夫特和伊格爾伯格，他說：「我把布殊總統當作朋友，是因為自從我與他交往以來，我覺得他是個說話算數的人。……他很少說空話假話。」<sup>[22-30]</sup>但是鄧小平在評價中美關係時，態度仍很強硬，極其嚴肅。談及「六四」時，他說，那個事件「是一次地震，十分不幸的是美國人也涉足太深……

美國對外政策的各個方面實際上是把中國逼入牆角。……那場反革命暴亂的目的是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如果讓他們得逞，就會天下大亂。坦率地說，這有可能導致戰爭。」鄧小平接著譴責了美國幫助那些試圖推翻中國政府的人，並且說，美國的媒體誇大了暴力程度，干涉中國內政。

鄧小平把布殊決定向中國派出兩名特使看作一件好事。「看來仍有希望維持我們原來的良好關係。……我相信這是布殊總統的願望。我本人也有同樣的願望。但這種性質的問題是不能從兩個人做朋友的角度加以解決的。」鄧小平說，兩國之間的分歧是由美國引起的，美國「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中國的利益。……解鈴還須繫鈴人，這取決於美國不再火上澆油。」鄧小平又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是打了 22 年仗、死了 2,000 萬人才換來的，任何力量都無法取代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這是一個感到他的國家的命運處在危險之中的人發出的嚴厲信息，他認為美國對中國的抗議者持續的支持加劇了這種危險。

斯考克羅夫特在答覆時重申，布殊總統堅信應當與中國維持良好關係，這樣做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布殊也希望鄧小平理解美國總統當時受到的政治限制。<sup>[22-31]</sup>鄧小平回答說，請斯考克羅夫特轉達「我對我的朋友布殊總統的友情……無論我們兩國政府之間在這個問題上談的如何，只要他繼續把我當朋友，我也會同樣對待他。」<sup>[22-32]</sup>斯考克羅夫特試圖向鄧小平解釋美國為何對個人自由有如此深的感情，但他適可而止。鄧小平在會談結束時說，他不同意斯考克羅夫特的很多說法，「為了結束中美關係的這段不幸插曲……要看美國採取何種行動。」<sup>[22-33]</sup>然後，據斯考克羅夫特說，鄧小平就和他道別。

當時，美中關係受到的傷害之一是關於美國向中國提供軍事裝備的協議的連續性。從 1983 年到 1989 年期間，作為反蘇同盟，中美軍方作出安排由美國向中國出售航空電子設備、導彈和魚雷。其中最大一筆生意是 F-8 戰鬥機的雷達系統；中國還購買了西科斯基公司的黑鷹直升機。對於處在當時經濟發展水平的中國來說，這是一筆開支很大的訂單。1989 年以後，由於美國的制裁不允許向中國供應零配件，也包括西科斯基直升機的零件，這使中國無法使用已經購買的許多裝備。

從 1989 年到 1993 年，中美軍方實際上沒有任何高層接觸。軍方的交往在 1993 年恢復，但雙方的信任關係從未恢復到 1983 年至 1989 年的水平。事實上，1989 年以後，中國轉而向蘇聯購買蘇-27 戰機，從以色列購買軍事設備和物資。中國不再願意從美國購買任何重要的軍事設備。<sup>[22-34]</sup>

天安門悲劇發生的一個多月後，在 7 月 14 日法國召開的七國峰會上，主要的問題不是是否制裁中國，而是應當採取多麼嚴厲的制裁。與其他領導人相比，布殊總統和日本首相宇野宗佑主張較溫和的制裁。布殊總統確實支持取消世界銀行新的對華貸款，同意為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提供永久居留權，但他反對採取他認為可能導致美中關係徹底破裂的更強硬的制裁手段。<sup>[22-35]</sup>

布殊在 7 月 28 日再次致函鄧小平，重申了他要維持兩國工作關係的願望。針對鄧小平所說的「解鈴還須繫鈴人」，布殊寫道，他認為問題是由中國的行動造成的。鄧小平於 8 月 11 日對布殊作出了誠懇的答覆，他對布殊維護和發展兩國關係的願望表示感謝，但他再次表示，是美國在制裁中國，傷害中國的利益和尊嚴。他說，希望這種局面能夠很快得到改善。<sup>[22-36]</sup>布殊知道鄧小平對美蘇交往很敏感，他在答覆鄧小平時建議，12 月 1 日布殊和戈巴卓夫的瑪律塔峰會之後，斯考克羅夫特可以飛往北京向他和江澤民通報會談結果。

在這期間，由於美國和日本決定不派高級官員訪華，鄧小平接待了一些美國前官員。他會見了美國民主黨特使伍德科克，還會見了前總統尼克遜以及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後者其實擔任著布殊政府的牽線人。日本不存在強大的反對黨或能夠充當使者的前政治家，因此鄧小平會見了與日本政府有密切關係的日本商界領袖。這些客人來到北京時，鄧小平鼓勵他們與他的接班人江澤民合作，但他仍然主導著關鍵性的會談。

鄧小平在 1989 年 10 月會見了美國前總統理查德·尼克遜，陪同他的是卡特的中國問題助手米歇爾·奧克森伯格。尼克遜強調說明了美國為何要對「六四」鎮壓作出強烈反應，但雙方也探討了打破僵局的途徑。鄧小平說，中國處於弱者的地位，不能採取主動；他堅持認為，處於強勢地位的美國應當先邁出第一步。<sup>[22-37]</sup>

不到兩周之後，11 月 10 日，也是鄧小平正式退休和柏林牆倒塌的第二天，他會見了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鄧小平向他保證，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將會繼續。他請基辛格把他的一封信轉交布殊，其中提出了一攬子外交設想：（1）中國允許正在美國大使館避難的異見人士、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前往美國；（2）美國取消一部分對華制裁；（3）雙方設法簽訂一到兩項重要的經濟合作計劃；（4）江澤民訪問美國。<sup>[22-38]</sup>幾個月後的 1990 年 5 月，布殊宣佈批准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以及中國已經同意讓方勵之離開美國大使館出國的決定。<sup>[22-39]</sup>



斯考克羅夫特和伊格爾伯格在 12 月 10 日第二次會見鄧小平時，事情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展。斯考克羅夫特受命公佈這次訪問，美國有線電視則在 12 月 18 日爆出了前一次秘密訪問的新聞。<sup>[22-40]</sup>許多美國人仍然對「六四」事件深感悲痛，在他們看來，美國政府的代表秘密飛往這個在街頭槍擊手無寸鐵的民主擁護者的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是對道義的踐踏，尤其是這件事發生在布殊宣佈停止高層交往之後。<sup>[22-41]</sup>但是布殊和斯考克羅夫特著眼於兩國的未來和兩國領導人之間密切的個人關係，他們認為這次訪問有助於避免與中國關係的破裂，這顯然符合美國的戰略、文化和經濟利益。<sup>[22-42]</sup>

在第二次訪問中，鄧小平對斯考克羅夫特和伊格爾伯格說，他們來北京訪問是一件好事，因為如果沒有牢固的中美關係，也難以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他又說，並不是中國在威脅美國，而是美國的政策威脅著中國；此外，如果中國發生更多的動亂，對全世界都有很大危害。鄧小平用和緩輕鬆的語氣，請斯考克羅夫特轉告布殊，中國有一個退休老人相信中美關係很重要，雙方必須想辦法解決問題。<sup>[22-43]</sup>這次訪問剛過，美國就宣佈同意售賣三顆通信衛星給中國，美國將支持世界銀行向中國發放用於人道主義目的的貸款。不久之後，中國在 1 月初宣佈北京解除戒嚴並釋放 1989 年春天時被拘留的 573 人。<sup>[22-44]</sup>

在這些初步的變化之後，美中對話又陷入僵局大約一年。錢其琛外長抱怨說，美國已經失去了與中國會談的興趣。斯考克羅夫特則表示，中國領導人不再表現出靈活性。但雙方都認為產生僵局的原因是東歐和蘇聯的動亂。

## 東歐和蘇聯共產主義制度的崩潰

1989 年到 1991 年發生在蘇聯和東歐的政治劇變，再加上 1989 年春天北京的示威運動，不但使外國人、也使很多中國人懷疑中國共產黨能否繼續存在下去。柏林牆的倒塌、東歐國家共產黨統治的結束和蘇聯的解體，讓很多西方人興高采烈，他們希望中國的民主派也能讓共產黨的統治壽終正寢。同時，中國領導層竭力控制住國內的問題，但他們的媒體向民眾所作的報道被那些發生在東歐和蘇聯的出人預料的事件所壓倒，一次又一次讓他們陷入尷尬的境地。通過《參考資料》上每天從西方媒體翻譯過來的材料，中國的官員要比一般群眾更加瞭解真相。

讓中國人和鄧小平本人尤其感到震驚的，是發生在羅馬尼亞的、反抗中國的老朋友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及其妻子的日益高漲的群眾運動，它在 12 月 25 日以兩人被槍決而達到頂點。齊奧塞斯庫是東歐領導人中唯一下令軍隊向平民開槍的人，中國領導人不可能想不到七個月以前北京類似的軍事行動。確實，羅馬尼亞的事態急轉直下，導致了齊奧塞斯庫被處決，這讓中國領導人擔心自己能否免於和齊奧塞斯庫——他曾表示贊成北京 6 月 4 日的鎮壓——同樣的命運。

這種擔憂的程度，大概可以從政府對中國民眾掩蓋羅馬尼亞動亂的做法中看出。當齊奧塞斯庫在 12 月 17 日下令軍隊向平民開槍時，中國媒體未作報道，只是在四天以後簡單地報道說，齊奧塞斯庫為了保衛社會主義制度，對抗恐怖活動，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當無法避免報道羅馬尼亞的大規模衝突時，中國媒體僅僅承認了新華社駐布加勒斯特辦事處的一些窗戶被子彈擊碎。12 月 27 日齊奧塞斯庫被槍決兩天後，《人民日報》在第四版下方發佈了一則只有一句話的報道：「羅馬尼亞電視台 12 月 25 日宣佈，羅馬尼亞特別軍事法庭判處齊奧塞斯庫及其妻子死刑，這一判決已經得到執行。」<sup>[22-45]</sup>斯考克羅夫特當時正在北京，據他說，中國領導人過去經常讚揚齊奧塞斯庫，說他證明了共產黨能夠頂住自由派的猛攻，當他們聽說羅馬尼亞的事變後感到了驚恐。<sup>[22-46]</sup>

齊奧塞斯庫遭到處決尤其令鄧小平感到不安。齊奧塞斯庫在 1985 年 10 月訪問北京時，曾向鄧小平頒發羅馬尼亞的最高勳章「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之星一級勳章」。早在 1965 年 7 月，當中國和華沙條約組織仍有一些交往時，在如何爭取對蘇聯和華約組織保持更大獨立性的問題上，鄧小平與齊奧塞斯庫觀點一致。齊奧塞斯庫在 1982 年和 1985 年訪華時，曾獲准在群眾大會上講話。也正是在齊奧塞斯庫 1985 年訪華時，鄧小平請他向戈巴卓夫轉達改善中蘇關係的條件，這為戈巴卓夫 1989 年的訪華鋪平了道路。<sup>[22-47]</sup>《人民日報》在 1989 年 9 月引用過對齊奧塞斯庫的一次採訪，他當時宣佈「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應當比過去更加緊密地合作」。<sup>[22-48]</sup>同時，《參考資料》詳細翻譯了西方有關齊奧塞斯庫的反對派日益壯大的報道，但一般群眾是看不到這類報道的。<sup>[22-49]</sup>

12 月，羅馬尼亞反對派運動的嚴重程度大白於天下之後，鄧小平暫時停止了公開會見的活動。據官方的《鄧小平年譜》，他在 12 月的前半個月有六次會見活動，但從 12 月 17 日——齊奧塞斯庫下令向人群開槍的那天——到來年的 1 月 18 日（這一天他會見了香港商界領袖李嘉誠）之前，沒有任何會見的紀錄。<sup>[22-50]</sup>因此，在羅馬尼亞危機期間的 12 月 21 日是江澤民接見了香港記者，以便平息港人的擔憂，他們自「六四」以來對八年以後香港回歸大陸時會發生什

麼一直憂心忡忡。和鄧小平一樣，江澤民要在緊張的局勢中表現出鎮靜；他解釋了為何中國的情況與東歐有著根本的不同。他說，中國共產黨能夠在 1949 年建立政權，是依靠自己的軍隊而不是蘇聯軍隊取得勝利的結果；中國沒有受到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中國一直以來都在改善人民的生活。江澤民解釋說，在中國實行戒嚴不是為了對付不守規矩的學生，而是為了維護秩序。就像 1957 年時的鄧小平一樣，江澤民肯定了民主是一個可取的目標，但能做到多大程度的民主，取決於國家的政局穩定。<sup>[22-51]</sup>

從 1989 年到 1991 年底蘇聯解體，北京負責宣傳工作的幹部感到很難處理從東歐和蘇聯傳來的消息。儘管作了很大的努力去掩蓋、淡化、拖延甚至歪曲新聞，但事件本身畢竟還是時常讓他們感到頭痛，因為這些事件使他們不可能取信於民。1989 年 6 月 4 日，鄧的軍隊鎮壓天安門廣場示威者的同一天，波蘭公民以民主投票方式選出了議會，這也是二戰之後蘇聯佔領東歐以來，東歐國家第一次舉行這樣的選舉。但是《人民日報》直到 6 月 10 日，即鄧小平向戒嚴部隊幹部發表講話之後，才向民眾報道了這一選舉的消息，但仍然隻字不提反對黨候選人以壓倒性優勢擊敗了共產黨候選人。早在 1980 年代中期，當雅魯澤爾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取締深得民心的團結工會時，北京的媒體曾為之拍手稱快；而在 1989 年 11 月雅魯澤爾斯基被趕下台時，深感震驚的北京官員並沒有向中國民眾及時報道這一消息。

<sup>[22-52]</sup>

從 1989 年 9 月底到 10 月初，當成千上萬的東德人湧入西德避難時，中國的報紙卻在繼續讚揚東德。例如，10 月 7 日（東德共產黨統治 40 周年紀念日）東德爆發大規模抗議時，《人民日報》不但隻字不提，反而誤導人們說：「東德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現在已經加強了團結。」然而，這種向中國民眾掩蓋東歐事態真相的做法只會對北京的領導產生不良影響。當 11 月 11 日柏林牆被推倒時，《人民日報》再也無法掩蓋這一消息了。<sup>[22-53]</sup>

1990 年 2 月的蘇共全會討論了放棄黨對權力的壟斷的問題，《人民日報》沒有作任何報道。全會結束那天，《人民日報》根本沒有提到蘇聯，而是宣佈「在中國，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肯定會發生新的動亂和戰爭，國家將陷入分裂，人民將遭受苦難，更談不上國家建設」。第二天報紙才登出莫斯科的蘇共全會同意放棄壟斷權力的消息。<sup>[22-54]</sup>蘇聯解體後，中國一些知識分子像很多西方人一樣高興。有人甚至向可靠的朋友重新提起 1950 年代中國採用蘇聯式工業化時的一句著名口號：「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但涵義卻非常不同。

鄧小平在 1989 年底辭職後不再積極參與處理東歐和蘇聯問題，但是他不可能迴避這些事態發展的後果。從 1989 年到 1992 年，他試圖加強群眾的信心：中國共產黨不同於東歐或蘇聯共產黨，它能挺過去。他沒有預言蘇聯或東歐會發生什麼事情，但他從 1989 年底開始使用「不管東歐或蘇聯發生什麼」作為開頭語，以表明中國的情況不同。鄧小平堅信加快發展經濟是保持人民擁護的關鍵，因此他一再表示實行能使經濟不斷進步的政策的重要性。

在一個特別敏感的日子，即 1991 年 8 月 20 日，蘇聯保守派發動政變將戈巴卓夫軟禁在克里米亞的一幢鄉間別墅裏的第二天，鄧小平把高層領導人——不久前才從莫斯科回來的江澤民，還有楊尚昆和李鵬——叫到一起，讓他們增強決心，團結一致做好工作，避免發生分裂。鄧小平重申，儘管發生了動亂，由於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功，中國能夠頂住外部壓力。他承認中國有可能波浪式前進，快速進步時期之後會進入調整期。他還指出，世界形勢的巨變給中國提供了前進的機遇，但是如果不抓住機遇，其他國家就會迎頭趕上，又把中國拋在後面。最後，鄧小平向他的同事重申，強調經濟增長不意味著中國要忘記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sup>[22-55]</sup>

1991 年 10 月 5 日，在愛沙尼亞、立陶宛和拉脫維亞脫離蘇聯、開啟了蘇聯解體的過程幾個星期之後，鄧小平接待了碩果僅存的幾個共產黨國家之一北韓的領導人金日成。他對金日成說，中國仍將堅持經濟上改革開放，同時也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證明中國需要共產主義體制，他說，中國今年發生水災時沒有哪個國家能為中國解決問題。中國能夠有效應對水災，是因為有共產黨的領導。<sup>[22-56]</sup>1989 年 10 月 26 日，鄧小平就曾宣佈對黨的體系的信念，他對泰國首相差猜說：「中國搞社會主義，是誰也動搖不了的。我們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sup>[22-57]</sup>

儘管中國領導人在向民眾報道蘇東巨變時動作遲緩，但他們很快就根據新的現實調整了中國的外交政策。當巴爾幹幾個共和國宣佈獨立時，中國立刻給予承認；1991 年 12 月 25 日蘇聯總統戈巴卓夫宣佈辭職，俄國國旗取代了克里姆林宮上的蘇聯國旗時，中國很快就從外交上承認了俄國和其他獨立國家。<sup>[22-58]</sup>

鄧小平在試圖說明蘇聯犯下的錯誤時宣稱，蘇聯沒有及時進行經濟改革，高層領導人沒有堅定地維護共產黨。相反，蘇聯領導人與美國搞軍備競賽，錢花在了這種競賽上，而沒有用來改善普通民眾的生活。蘇聯的領導層享受著優越的生活，但蘇聯人民並不是這樣。在天安門悲劇之後的困難時期和蘇聯解體的時期，鄧小平不斷重複著一句口頭禪：「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有所作為。」<sup>[22-59]</sup>

無論鄧小平本人在「六四」後對中共的前途有何疑慮，沒有紀錄證明他對中共有能力克服東歐和蘇聯共產體制崩潰帶來的困難有過任何懷疑。他在公開場合總是表現得鎮定自若，他相信中共能夠挺過去，並最終取得勝利，經濟也將繼續增長。他記得自己三次受到批判，丟了官職，但每一次又都回來了；他見證過自己的部隊打了敗仗但取得了最後的勝利；他見證過中國在大躍進和「文革」之後的復元。鄧小平在 1989 年「六四」之後的三年中，向公眾展示著他的毅力、堅韌和十足的自信，在這種環境中能有如此表現的世界領導人並不很多。

## 對保守的經濟政策失去耐心：1989–1991

黨內的氣氛不允許鄧小平扭轉 1988 年放開物價後為消除通貨膨脹和民眾恐慌而實行的保守經濟政策。但是鄧小平由衷地認為，只有經濟的快速發展才能維持民眾的支持以避免東歐和蘇聯的命運。從 1988 年 9 月 26 日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正式開始實行的緊縮計劃是陳雲的得意之作。為了結束通貨膨脹，政府降低了增長目標和支出，減少了貨幣供應，收緊和強化了財政控制，努力消除財政赤字。此外，為安撫對腐敗的民怨，政府發言人袁木宣佈緊縮計劃也包括禁止政府興建樓堂館所。<sup>[22-60]</sup>

富有經驗的經濟顧問薛暮橋為緊縮計劃中的「整頓」政策提供了全面解釋。他說，1984 年之後，新的體制和宏觀調控手段還沒有到位，以價格、稅收和信貸來調控經濟的行政手段就被削弱了。隨著權力的下放，地方政府和企業，包括鄉鎮企業，過快地擴大投資，造成了原料和能源短缺以及基礎設施不足的瓶頸，從而導致了通貨膨脹，為避免後者的失控才採取了緊縮措施。<sup>[22-61]</sup>李鵬總理在 1989 年底的計劃工作會議上忠實地推進了緊縮計劃，他說，黨要集中力量提高質量標準，改善商品流通，加強黨對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他提出，儘管實行緊縮方案，黨仍然要繼續推動改革。工廠的管理者要作好有關技術和生產的關鍵決策，中國要堅持實行對外開放政策。<sup>[22-62]</sup>

「六四」之後西方國家對中國政府領導人的抨擊，導致一些人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擊以及對市場開放的抵制。<sup>[22-63]</sup>已經在 1987 年靠邊站的保守派意識形態宣傳家鄧力群，又開始批評資產階級自由化和精神污染。陳雲的部下則認為過分開放市場導致了紀律鬆弛和學生示威。江澤民讓正統思想的捍衛者胡喬木為他起草了 1991 年 7 月在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 70 周年紀念活動上的講話。<sup>[22-64]</sup>

1988 年實行的保守政策有助於緩解通脹壓力、加強投資控制和預算平衡。當時預計，1989 年到 1992 年這個時期結束時，一旦調整完成，便可以用較溫和的步調重新開始各項改革——包括物價改革、企業管理權和所有權的分離、稅制改革以及銀行業改革。<sup>[22-65]</sup>但是，1989 年「六四」之後西方國家的制裁進一步限制了中國的經濟增長，更何況經濟官員還在繼續實行謹慎的經濟政策。即使很想與鄧小平保持良好的個人關係的江澤民，在經濟政策上也感到只能接受主流氣氛，而這種氣氛現在更有利於陳雲的慎重立場。結果是，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從 1988 年的 11.2% 降至 1989 年的 3.9%。為防止在這種急速的下滑中出現政治騷亂，沒有讓大城市的國營企業職工丟掉工作，工資也沒有受到觸動；但是在小鄉鎮和行政村一級，從 1989 年到 1990 年有將近 2,000 萬人丟了飯碗。<sup>[22-66]</sup>這時鄧小平想不顧一切加快發展以維持民眾的支持，然而他在黨內缺少足夠的支持。

## 愛國主義教育

「六四」後幾周的危機時刻過後，鄧小平等領導人開始處理一個更大的問題，即年輕人對政府和共產黨的疏遠。在談及導致「六四」事件的問題時，鄧小平提到了沒有對青年進行「教育」，他這樣說的意思和毛澤東一樣，是指政治教育。但是鄧小平的這種教育觀並不集中在「意識形態」上，他認為那種教育過於僵化；他要提供的是公民和道德教育。在「六四」之後這意味著什麼？

東歐和蘇聯共產體制的崩潰表明，共產主義世界的年輕人已經失去對馬列主義、社會主義經濟和共產黨正統學說的信仰。鄧小平和他的黨內元老們認識到，不能再指望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政治教育去打動中國的年輕人了。儘管鄧小平本人支持過反對地主資本家的階級鬥爭，但它也無法像毛澤東時代那樣引起年輕人的共鳴了。

為了贏得中國年輕人的心，需要用什麼來取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呢？答案似乎不言自明：愛國主義。<sup>67</sup> 強調西方帝國主義造成的百年屈辱史的愛國主義教育在 1940 年代就是宣傳的主題，而且從未消失過。但是它在 1950 年代開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只起著次要作用。當鄧小平在 1980 年代試圖加強與西方的關係時，它已經趨於沒落。然而在

1989 年之後，面對西方國家的制裁，出現了針對外國制裁的普遍的愛國主義反應。在很多西方人看來，對中國的制裁是對在「六四」中使用武力的中國領導人進行抨擊的一種方式，但是對於中國人來說，制裁傷害的卻是全體中國人。就像抗戰時期共產黨人訴諸於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結合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一樣，此時的愛國主義「教育」把民族主義和共產黨聯繫在一起；反過來說，批評共產黨事實上就是不愛國。<sup>[22-68]</sup>

出現這種意識形態轉變的時機很有利。在鄧小平時代，正如學者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所指出的，有一種「對中國歷史的逐步的重新肯定」。被毛澤東視為剝削者的地主和資產階級曾是受批判的歷史人物，而在鄧小平時代逐漸被重新解釋為「那個時代的進步力量」。換言之，在鄧小平時代，更易於用較客觀的方式研究中國歷史了；過去被定性為階級敵人的歷史人物，又成了具有優秀或至少可以理解的品質的人。在 1980 年代末，甚至國共內戰時的頭號敵人蔣介石也開始得到更加同情的對待，雖然毛澤東使他的成就黯然失色。<sup>[22-69]</sup>1989 年之後，中宣部利用這種趨勢，鼓勵年輕人以中國歷史為榮。<sup>[22-70]</sup>

正如一位中國知識分子在談到中國思想狀況時所說，即便在 1980 年代中國人批判自己的傳統、崇拜西方時，「在叛逆的言辭背後……也跳動著新一代熱血青年躁動不安的心，他們懷著急迫的使命感，要重新找回作為中國人的自豪」。<sup>[22-71]</sup>即使沒有愛國主義教育，到 1980 年代末時很多中國人已經認識到，1978 年開始實行對外開放以後，中國人過於美化西方了（就像一些宣傳幹部所說，有些年輕人認為「西方的月亮都比中國的圓」）。但是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和現代化，中國人自然而然開始對自己的國家有了更多的自豪感。

「六四」之後外國人的制裁和批評，為鄧小平及其同事提供了強化這種愛國主義的有效手段。天安門悲劇後的幾周內，鄧小平開始強調他的愛國主義教導。中宣部巧妙地宣傳外國人的反華言論，使很多中國人、甚至包括主張民主的學生感到憤怒。西方國家阻止中國加入關貿總協定（1994 年後改為世界貿易組織）的做法被廣為宣傳，將民眾的怒火引向外國人對中國的偏見。外國拒絕向中國提供現代技術，被說成是不公正地阻止中國分享現代化成果。外國人批評中國對待藏人、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做法，被說成是外國列強企圖削弱中國的陰謀。西方對臺灣的支持和對中國主張南沙和東海島嶼主權的抵制，在政府向中國民眾作出的解釋中，被說成是遏制中國的例證。諸如此類的宣傳取得了預期的效果。1989 年後的幾年裏，當初高呼口號反對政府腐敗和爭取更多的民主自由的學生，也開始支持黨和政府。他們喊出了反對外國人的口號，因為他們認為外國人是在不公正地指責中國。

在喚起年青人的愛國主義方面，特別成功的一件事是，官方媒體巧妙地宣傳外國人因「六四」事件而反對北京主辦奧運會的言論。國家主席楊尚昆在 1990 年向國際奧委會宣佈中國將申辦奧運會後受到外國的抵制，這讓年輕人怒不可遏。1989 年時反政府的年輕人，現在又熱烈支持政府有關中國受到其他國家苛待的說法。

在這些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努力中，最有效者莫過於重拾抗戰時期的反日宣傳。當日本政客參拜供奉著日本在二戰中陣亡官兵的靖國神社時，或是當極右翼政客否認南京大屠殺時，即使這種事在日本並沒有多少人在意，他們的言論仍會被公佈在中國的媒體上，引起強烈的反日情緒和對中國領導人的支持。

1991 年底，中宣部還制訂出一套更加系統的愛國主義教育方式——利用教科書、講演和媒體。1991 年 11 月發佈了〈充分利用文化遺產進行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的文件。後來又下發了〈關於在全國中小學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的通知〉。這兩份文件的重點都是教育那些沒有經歷過抗日戰爭或內戰的青少年。

天安門悲劇之後鄧小平批評外國實行的制裁，沒有紀錄表明他在 1992 年退休前反對宣傳部門激發愛國主義的做法，即使其中包含排外傾向。中國存在著像東歐和蘇聯那樣陷入分裂的危險，因此需要作出認真的努力重新贏得年輕人的支持。愛國主義、經濟發展和經濟機會的增加，共同構成了解決問題的手段。但是，鼓動排外情緒的做法也遠遠超出了鄧小平所鼓勵的範圍，而且在他退出政壇後愈演愈烈。隨著外國在 1990 年代逐漸減少制裁，中國必須在這種排外的愛國主義與努力恢復鄧小平在 1977 年以後建立的對外友好關係之間取得平衡。

[22-1]SWDXP-3, May 31, 1989, p. 289.

[22-2]SWDXP-3, May 31, 1989, p. 291.

[22-3]SWDXP-3, May 31, 1989, June 9, 1989, p. 299.

[22-4]SWDXP-3, May 31, 1989, pp. 294–299.

[22-5]SWDXP-3, May 31, 1989, June 16, 1989, pp. 302–303.

[22-6]Timothy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the Beijing Democracy Movemen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96–197.

[22-7]Qichen 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foreword by Ezra Vogel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5), pp. 143–146; George Bush and Brent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New York: Knopf, 1998), p. 414.

[22-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89年7月16日，頁1285。

[22-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89年6月23日至24日。

[22-10]Robert Lawrence 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The Life and Legacy of Jiang Zemin* (New York: Crown, 2004), p. 173.

[22-1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9年8月17日，頁1286。

[22-12]《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9年9月4日，頁1286–1287；SWDXP-3, pp. 305–311. 他還說，他的喪事也要越簡單越好。

[22-1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9年9月4日，頁1287；SWDXP-3, pp. 305–311.

[22-14]SWDXP-3, p. 311.

[22-15]SWDXP-3, pp. 312–313.

[22-16]《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9年9月16日，頁1289–1290。

[22-1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9年11月6日至9日，頁1295–1296。

[22-18]Rong Deng, *Deng Xiaoping: My Fath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pp. 1–5.

[22-19]SWDXP-3, p. 315.

[22-20]據奧克森伯格所說，他陪同尼克遜總統在1989年10月會見了鄧小平。這是奧克森伯格第14次、也是最後一次與鄧小平會談。見 Michel Oksenberg, "I Remember Deng,"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March 6, 1997, 35.

[22-21]George Bush, *The China Diary of George H. W. Bush: The Making of a Global Presid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461.

[22-22]James Lilley with Jeffrey Lilly,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4), p. 378.

[22-23]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93.

[22-24]2010年11月與芮效儉大使的私人交談。

[22-25]John H. 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Normaliz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7), pp. 225–226; Lilley, *China Hands*, pp. 222–223, 378.

[22-26]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p. 91–99. See also Perry Link, *Evening Chats in Beijing: Probing China's Predicament* (New York: Norton, 1992), pp. 29–38; Robert L.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 pp. 24–28.

[22-27]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p. 98–102. See also Bush, *China Diary of George H. W. Bush*; Lilley, *China Hands*.

[22-28]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02.

[22-29]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pp. 131–146.

[22-30]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06.

[22-31]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p. 106–111; 《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9年7月2日，頁1284；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pp. 131–139. 關於天安門事件對美中關係的影響，見 Robert L.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22-32]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p. 106–107.

[22-33]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09; 另見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中的訪問報告, pp. 79–83.

[22-34]2008 年 12 月對 Eden Woon 的採訪, 他是國防部官員, 在這些談判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22-35]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28.

[22-36]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57.

[22-3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9 年 10 月 31 日, 頁 1294–1294;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in Putting an End to the Strains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WDXP-3, p. 321;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p. 81.

[22-3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9 年 11 月 10 日, 頁 1297。

[22-39]Lilley, *China Hands*, pp. 358–362.

[22-40]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p. 100.

[22-41]Richard Madsen,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A Moral Inqui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22-42]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57.

[22-4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9 年 12 月 10 日, 頁 1304; “Sino-U.S. Relations Must Be Improved,” SWDXP-3, pp. 338–339.

[22-44]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pp. 100–101.

[22-45]轉引自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p. 51.

[22-46]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79.

[22-47]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p. 179; 《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5 年 10 月 9 日, 頁 1085–1086; James A. R. Miles, *The Legacy of Tiananmen: China in Disarra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pp. 46–48.

[22-48]周榮子: 〈齊奧塞斯庫和蒙博托表示支持中國平息反革命暴亂〉, 《人民日報》, 1989 年 9 月 23 日, 第 3 版。

[22-49]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p. 47–48.

[22-50]《鄧小平年譜（1975–1997）》，頁 1303–1306。

[22-51]“Jiang Zemin and Li Ruihuan Interviewed by Hong Kong Journalists,” BBC 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 FE/0650/B2/1, December 30, 1989.

[22-52]Miles, *The Legacy of Tiananmen*, p. 41. 這裏的內容以及下面幾段主要依靠此書, 該作者當時在北京密切觀察過中國對蘇聯和東歐變化的反應。中國人對東歐和蘇聯變化的較為冷靜的記述, 見黃宏編: 《硬道理: 南方談話回眸》(濟南: 山東人民出版社, 2002), 頁 3–38。

[22-53]黃宏: 《硬道理: 南方談話回眸》, 頁 44–46。

[22-54]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p. 59–60.

[22-5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1 年 8 月 20 日, 頁 1330–1331; SWDXP-3, pp. 356–357; 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p. 206–207.

[22-56]《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1 年 10 月 5 日, 頁 1332。

[22-57]SWDXP-3, p. 318.

[22-58]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pp. 170–171, 174–177.

[22-59]陳國焱: 〈鄧小平對東歐的戰略方針及其意義〉, 載《鄧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論文集》(北京: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6), 頁 270–275; 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pp. 172–174.

[22-60]“Regulations on Construction of Expensive Buildings Issued,” Xinhua General Overseas Service, September 25, 1988. 對官方的措施及支持緊縮政策的分析的評論, 見武力主編: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9）》(上下冊)(北京: 中國經濟出版社, 1999), 下冊, 頁 983–1010。

[22-61]薛暮橋：〈牢記歷史經驗，堅決執行治理整頓的方針〉，見《人民日報》，1989年12月18日，第6版。

[22-62]《新華社內參》，1989年12月26日，見FBIS, January 3, 1990, pp. 12–18.

[22-63]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pp. 120–125.

[22-64]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37.

[22-65]例如參見《光明日報》，1989年12月9日，見FBIS, January 4, 1990, pp. 27–28.

[22-66]Simon Long in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May 1992, 轉引自 Miles, *The Legacy of Tiananmen*, pp. 62, 326.

[22-67]中國的「愛國主義」，字面上的意思是「愛國家」。因為中國是由很多個民族組成的，所以不使用「民族主義」這個詞，該詞在英語裏被譯作 *nationalism*，但字面的意思是「愛自己的民族」。

[22-68]Suisheng Zhao, "A State-Led Nationalism: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Post-Tiananme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 Communist Studies* 31, no. 3 (September 1998): 287–302; Paul A. Cohen, *China Unbound: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pp. 166–169 and n181, n182; Parks Coble, "China's 'New Remembering'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of Resistance, 1937–1945,"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0 (June 2007): 394–410; Suisheng Zhao,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13–247.

[22-69]Coble, "China's 'New Remembering,'" pp. 400–402.

[22-70]關於中國作家對上面的提示作出的反應的細微差別，見 Perry Link, *The Uses of Literature: Life in the Socialist Chinese Literary Syste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68–81.

[22-71]Shuqing Zhang, "Marxism, Confucianism,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Zhiling Lin and Thomas W. Robinson, eds., *The Chinese and Their Future: Beijing, Taipei, and Hong Kong* (Washington, D.C.: The AEI Press, 1994), pp. 82–109.

## 第 23 章

### 鄧小平時代的終曲——南巡：1992

一代人之前的 1965 年，毛澤東對自己不能全面控制北京的「資產階級」政策而感到不悅。他無法在中央黨報《人民日報》上傳播自己的觀點，便在上海的《文匯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次日該文又由上海市黨報《解放日報》轉載。然後，71 歲的毛澤東乘專列去了南方的杭州、韶山和武漢等幾個城市，為 1966 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點火。

這個故事在 1991 年又重演了一次。當時鄧小平對北京保守的經濟政策也感到不快，可是他對這些政策又不能完全說了算。他無法在《人民日報》上表達自己的觀點，便把它登在另一家報紙——上海的《解放日報》上。可是 1991 年這把火並沒有點著，決心已定的鄧小平在 1992 年又點了一把更大的火。他以 87 歲高齡，乘專列南下，先去武漢，然後是深圳、珠海和上海，他在這些地方成功點燃了擴大市場開放和加快發展的大火。

1988 年通貨膨脹引起的恐慌，北京當局在 1989 年 5 月軍事戒嚴失敗後的幾近崩潰，蘇聯和東歐政權相繼垮台的新聞——這一系列事件使北京變得近乎絕望，氣氛高度緊張。陳雲仍是謹慎的計劃官員的核心，鄧小平則吸引著大膽主張擴大開放、加快發展的人。在 1970 年代末和 1980 年代初，建設派大多是從事引進新工廠和新技術的中央幹部，到 1980 年代末時，沿海地方政府已積累起自己的財富，形成了更強大的勢力基礎，使鄧小平能夠用來對抗謹慎的計劃官員。

陳雲手下謹慎的計劃官員認為，1988 年的通貨膨脹失控要對 1989 年的悲劇負責，因此他們更堅定地要把國家控制在他們認為唯一安全的軌道上。鄧小平則認為，不加快國家的發展，共產黨的統治就會陷入危境，因此他同樣堅定地認為，只有加快發展和開放才能維持民眾的擁護，使國家得以生存下去。對政權可能突然崩潰的擔憂讓雙方關係更為緊張。<sup>[23-1]</sup>

### 鄧小平受挫：1990—1991

1990 年 1 月 21 日至 2 月 13 日鄧小平在上海度假期間，他已經在爭取能使他壓倒保守派經濟政策的政治力量。他在上海與當地負責人討論了開發浦東的大項目。<sup>[23-2]</sup>他知道上海的負責人急於開發浦東，但這必須得到北京的許可。浦東是上海境內一片大約 500 平方公里的區域，靠近地理位置優越的長江入海口。當時這個地區大體上仍是農村，易於進行開發，甚至早在上世紀初，孫中山就曾萌生出在浦東建一個大港口的念頭。上海當地官員希望將它建成金融中心。<sup>[23-3]</sup>儘管上海一直受到中央政府的制約，但是在長江三角洲一帶，不但上海，而且鄰近的江蘇和浙江，工業已經有了實質性的增長。

鄧小平對如何加快經濟發展有著戰略上的考慮。他知道，鑒於上海的巨大規模和人才儲備，它的任何進步都將對全國的發展產生直接的積極影響，不但能夠惠及鄰近的江浙兩省，而且還有長江流域的數億人口。<sup>[23-4]</sup>1920 年鄧小平赴法途中，曾在上海停留一周，第一次體驗了這個城市的活力；十年後他又在上海做了幾個月的地下工作；1949 年他曾短暫地參與中共對上海的接管；1980 年代末，當他為冬季「休假」來到這座城市時，能夠感受到生氣勃勃的上海人有待釋放的能量。即使不像鄧小平那樣頭腦敏銳的幹部也十分清楚，上海的領導人對 1930 年代上海作為商業大都會的優越地位懷有自豪感，而當時的香港不過是個無足輕重的小城市；1980 年代中央為廣東和福建率先進行試驗開了綠燈，卻沒有讓上海這樣做，這使他們十分不快。上海的負責人並不諱言：上海有著比廣東和福建的任何城市更高的教育、科技和工業水平。上海的領導人得到了群眾的全力支持，是鄧小平加快發展經濟的強大同盟。

1984 年，作為開放的 14 個沿海城市之一，上海也獲得了一定的發展空間，但是從 1984 年到 1990 年，上海沒有得到北京多少幫助，它的潛力幾乎沒有發揮出來。廣東較易於得到外企投資，在不發達的地區建新廠成本雖然高，但尚可做到。然而，對上海巨大的舊工業進行改造，需要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資本來支持。上海肩負的為國家財政作貢



獻的擔子如此之重，得到的支持卻很少，這讓上海的領導人感到不滿，他們一直在要求北京改變政策。北京一些部委的領導也願意向上海投資，因為他們已經開始擔心正在失去對廣東的控制，那裏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外邊而不是中央政府。假如北京為上海提供資本，國家的計劃官員對上海的控制能力要比對廣東大得多。

1988 年和 1989 年鄧小平在上海過冬時，曾經與江澤民和接替江擔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朱鎔基作過交談。朱鎔基在北京擔任國家經委副主任時鄧小平就認識他，把他視為一個難得的人才，他既有充滿自信的領導能力，又有發展經濟的戰略眼光和難得的改革魄力。1990 年 2 月，鄧小平會見了朱鎔基和上海其他黨政軍幹部，與他們討論如何為當地的發展點火。<sup>[23-5]</sup>

2 月回到北京後不久，鄧小平對李鵬總理說：「我已經退休了，但有一件事還是要給你講一講，你要更多地關心一下上海浦東的發展。」<sup>[23-6]</sup>兩周後的 3 月 3 日，鄧小平把江澤民、楊尚昆和李鵬叫來，向他們宣講國際形勢和國內經濟：「人民現在為什麼擁護我們？就是這十年有發展。……假設我們有五年不發展，或者是低速度發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會發生什麼影響？這不只是經濟問題，實際上是個政治問題。」他然後又說：「要用宏觀戰略的眼光分析問題，拿出具體措施。……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條件更好，可以更廣大地開源。比如抓上海，就是一個大措施。上海是我們的王牌。」<sup>[23-7]</sup>

遺憾的是，1990 年，北京的領導人對鄧導師上的課和上海的領導人加速經濟發展的願望無動於衷。他們當時更多地是跟著謹慎的計劃派大師陳雲走。陳雲在上海郊區的青浦長大，經常回上海視察當地情況；在黨內，他在跟上海有關的問題上享有特殊的權威。陳雲反對在上海建經濟特區，不僅因為這有可能給國家既有的重工業和稅收基礎造成風險，還因為作為一個在 1920 和 1930 年代在那裏工作過的人，他深知資本主義的罪惡和上海商人那種在他看來對洋人過分卑躬屈膝的「買辦習氣」。因此，陳雲擔心外國租界死灰復燃。可是鄧小平對陳雲的遲疑已經失去了耐心。雖然沒有點名批評陳雲，但他在 1990 年 2 月說，上海的發展落後於廣東。圈裏人都知道，他這是在表達對陳雲反對開放上海的不滿。<sup>[23-8]</sup>

定於 1990 年 12 月 25 日至 30 日召開的七中全會將要研究五年計劃和十年規劃的草案。在會議前夕的 12 月 24 日，鄧小平又把江澤民、楊尚昆和李鵬叫來，再次給他們上課，講明加快發展的道理。他強調在 2000 年以前讓經濟翻番的重要性，鼓勵他的接班人不要害怕擔風險。<sup>[23-9]</sup>鄧小平重申，如果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夠快，經濟停滯就會變成政治問題，而緊縮政策加上外國制裁的負作用，正在放慢經濟增長的速度。鄧小平認為，只有放棄保守的經濟政策才能避免重蹈蘇聯和東歐的覆轍。<sup>[23-10]</sup>但是鄧小平的課依然沒有起多大作用。儘管他多次請求，七中全會仍然受到謹慎的保守派主導，他們更加擔心的不是增長速度放慢，而是經濟過熱。

鄧小平於 1991 年 1 月 28 日乘專列去了上海，在那裏一直住到 2 月 20 日。他既是為了冬季休養，也是想再次為經濟增長點火。聽過朱鎔基的彙報後，他視察了航空和汽車工廠，還有將要成為世界第三大懸索橋的南浦大橋的建設工地。<sup>[23-11]</sup>鄧小平重申他在 1990 年說過的話：1979 年開放四個經濟特區時沒有開放上海，是他犯的一個錯誤，他原本應該利用上海的人才優勢。他強調開發浦東不但對上海市，而且對整個長江流域都很重要。他說，金融——他有意避免使用容易引發不滿情緒的「資本」一詞——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中國想在金融領域獲得國際地位，全國都得靠上海。

<sup>[23-12]</sup>

鄧小平在 1991 年並未能使他的星星之火變成燎原之勢。除夕時他和楊尚昆、李先念一起給上海負責人拜年的畫面上上了全國的電視，但並沒有提到他要加快上海發展的努力。鄧小平的意見甚至沒有出現在《人民日報》上。不過，他在 1991 年也取得了兩個小小的收穫：他爭取到足夠的支持，把朱鎔基調到北京擔任副總理；他還讓上海的報紙發表了幾篇文章，儘管用的是化名。1991 年 3 月和 4 月，上海的幹部讓《解放日報》根據鄧小平不久前在上海的講話，整理出了四篇系列文章。<sup>[23-13]</sup>這些文章沒有暴露與鄧小平的關係，而是署名「皇甫平」（意思是「黃浦評論」，又可指「輔助鄧小平」）。<sup>[23-14]</sup>第一篇皇甫平的文章發表於 3 月 3 日，批評了「一些同志」把市場說成資本主義。文章說，計劃和市場只是利用資源的兩種不同方式，不是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標籤。政治圈裏的人在猜測「皇甫平」的文章背後究竟為何人，但當時只有極少數人知道那是鄧小平。

中宣部動員《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對「皇甫平」的文章進行了反駁。1991 年 11 月，在雄偉的上海南浦大橋的通車儀式上，替北京的保守派領導人說話的李鵬總理公開批評了皇甫平的文章，他說，這些文章讓人錯誤地以為北京的政治氣氛發生了變化。<sup>[23-15]</sup>

1991 年，黨的幹部開始籌備將於次年年底召開的中共十四大。鄧小平明確表示，假如江澤民致力於加快發展和擴大開放，他會支持他，不然他就要支持黨的其他領導人。但是其他領導人都受制於當時的主流氣氛。例如，朱鎔基到北京擔任副總理後，仍在忠實執行元老們保守政策的李鵬總理感到了來自鄧小平的壓力——這是要用朱鎔基取代他領導經濟。但李鵬頂住了壓力，朱鎔基在 1991 年別無選擇，只能執行當時的謹慎政策。

陳雲和鄧小平都避免公開鬥爭，但他們各自的擁護者卻在公開替他們說話。1991 年 10 月，國家主席楊尚昆借紀念辛亥革命 80 周年之機，支持更加大膽地實行改革開放。<sup>[23-16]</sup>為另一方說話的鄧力群則在 1991 年 10 月 23 日的《人民日報》上撰文警告說，階級鬥爭很尖銳，存在著「和平演變」——即用資本主義逐漸取代社會主義——的危險，這正是自由派夢寐以求的事情。<sup>[23-17]</sup>1991 年底，當幹部們為即將召開的黨代會作準備時，戰線變得明朗起來。保守派在 11 月 25 日至 29 日的八中全會上仍佔上風，於是鄧小平拿出了他的慣用手段：不把時間浪費在爭論上，他要採取行動爭取支持。

## 鄧小平南巡：1992 年 1–2 月

當鄧小平的專列於 1992 年 1 月 17 日駛離北京站時，北京的其他中央領導並沒有收到通知，甚至連江澤民也不例外。這次出行完全由武警部隊一手操辦。北京的其他領導人和南方負責接待他的幹部只知道，鄧小平夫妻、他們的四個子女（只有小兒子鄧質方沒有隨行）及其配偶和孩子，一行 17 人，要出門散心觀光，進行「家庭度假」。誰能反對這個老領導的家庭去度假呢？

鄧小平南行的第一站是武漢，這裏是華中地區的鐵路樞紐，也是 1911 年辛亥革命爆發的地點。鄧小平於 1 月 18 日上午抵達武昌火車站。儘管只是家庭度假之旅，但對待鄧小平這樣顯赫的人物，湖北省委書記關廣富和省長郭樹言還是前往月台迎接鄧小平的到來。鄧小平只在月台上停留了 20 分鐘，時間雖短，卻足以讓他發一通脾氣。鄧小平說：「電視一打開，盡是會議，會議多，文章太長，講話也太長，而且內容重複……你們要多做少說。……周總理四屆人大（1974 年）的報告，毛主席指定我負責起草，要求不超過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務。……現在文件多如牛毛。」他提到這樣的情況：省委書記去農村考察一個星期回來，文件就堆成了山，讓他頭痛。<sup>[23-18]</sup>鄧小平一向反對空話、長篇報告和不作認真準備的會議，他曾說過：「沒有話把嘴巴一閉……會議和講話是為了解決問題的。」<sup>[23-19]</sup>發了一通脾氣後，鄧小平說出了他的要點：「誰反對改革，就讓誰下台。」儘管他是在向武漢當地的人說話，他的話也沒有登在公開的媒體上，但很快就引起了江澤民的注意。兩天以後江澤民對手下的幹部說，要加快開放步伐，恢復對外開放政策，減少會議的數量。<sup>[23-20]</sup>

列車於當天下午抵達長沙火車站，鄧小平花十分鐘時間接見了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熊清泉等省級幹部。鄧小平聽到 1991 年儘管有自然災害，湖南還是取得了大豐收後十分高興。但鄧導師還是給他們上了一課：他指示熊清泉說，湖南「搞改革開放的膽子要更大一些……要加快經濟發展」。<sup>[23-21]</sup>

1 月 19 日星期一上午，鄧小平在廣州短暫停留後，與陪同他的省級領導一起，開始了對最有活力的特區——深圳和珠海——為期 11 天的視察。當地幹部一周前才接到通知為鄧小平的到來作準備，他們跑到鄧小平要去的所有地方佈置保安，安排包括痰盂在內的必要設施。他們只接到通知要為接待鄧小平一家人前來度假作準備，但是當鄧小平到達深圳時，他們已經收到在武漢和長沙與鄧小平見過面的幹部的詳細報告，他們意識到，這並非一次尋常的家庭度假。<sup>[23-22]</sup>

廣東省委書記謝非、省委副秘書長陳開枝和其他幾位省裏的幹部與一些當地幹部一起在深圳為鄧小平做嚮導。在迎接鄧小平的幹部中，有些人在 1984 年就接待過鄧小平，他那次來時肯定了經濟特區的成就。鄧小平到達下榻的賓館後休息了十分鐘，然後與謝非等人在賓館的花園裏散步。鄧小平的女兒鄧楠提醒父親說，八年前他在這裏題過詞。鄧小平隨口便背誦出了他當年的題字：「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這引來高興的東道主一片喝彩，他們把鄧視為最強大的助推器，不同於那些試圖限制他們投資的北京官員。

鄧小平為了保持體力，只在每天上午遊覽三小時，然後與家人一起吃飯，午睡，下午休息。在當地一次外出遊覽時，家人在一塊標識上看到用鄧小平筆跡複製的「深圳」二字，女兒鄧楠說：「你應該收利息，你有知識產權啊。」<sup>[23-23]</sup>鄧小平笑了。後來他們在仙湖植物園看到從成都運來的竹子，鄧小平對當地導遊開玩笑說，你們也要給四川支付知識產權費啊。<sup>[23-24]</sup>鄧小平這個玩笑是深有寓意的：人們都知道鄧小平對西方要求中國支付大筆知識產權費的批評，鄧小平提醒西方人說，其他國家模仿中國的火藥和印刷術一類的發明，中國並沒有為此收過費。但是鄧小平也明白中國需要適應

新的國際秩序。在視察深圳一家生產 CD 光碟的工廠時，他問他們是否從外國買了版權，並提醒工廠經理說：「一定要遵守有關知識產權的國際規則。」<sup>[23-25]</sup>

在廣東，鄧小平到處都被喜歡和感激他的人團團包圍。在 1982 年和 1983 年，他雖然最初沒有為特區辯護，但是當 1984 年特區受到北京保守派的嚴厲批評時，他卻表揚了特區。廣東人有一個說法：遇到綠燈往前走，看到黃燈抓緊走，碰上紅燈繞著走。然而在 1992 年，廣東人仍然擔心來自北京的黃燈和紅燈，渴望看到綠燈。鄧小平正在支持他們的事業，支持擴大對外開放和加快經濟發展，反過來，他們成了鄧南巡計劃的啦啦隊。

按照北京為「家庭度假」制訂的官方原則，鄧小平只帶了一名記者和一名攝影記者，也沒有舉行記者招待會。但是當他開始視察深圳時，估計有 50 到 60 名攝影記者緊緊尾隨著他的「家庭度假」，很多人甚至買了盒式錄音機，以便能夠捕捉鄧小平的每一句話。<sup>[23-26]</sup>

鄧小平心情振奮地觀看當時在中國還不多見的高樓大廈，認真細緻地視察新技術，聽當地幹部彙報情況。當地幹部告訴鄧小平，1984 年時深圳的人均收入只有 600 元，1992 年時已經達到 2,000 元。鄧小平不可能不為自己加快發展的夢想可能變為現實的前景而歡欣鼓舞。在為鼓勵加快發展的南行途中，當鄧小平看著那些高樓大廈時，他也是在享受自己用改革開放政策所播下的種子結出的碩果。

鄧小平來訪的消息不脛而走，每當他從工廠和辦公樓走出來時，都有大批普通市民在等著他。他在 53 層的深圳世貿中心旋轉餐廳俯瞰了這座城市的新建築，當他走出大樓時，有大批群眾向他鼓掌歡呼。<sup>[23-27]</sup>雖然鄧小平有不善言談的名聲，但在女兒鄧楠的幫助下——她不斷湊到耳邊，把他因耳聾聽不清楚的話大聲告訴他——他完全融入了與當地幹部和充滿感激的群眾的交談之中。在北京的許多幹部眼中，鄧小平是個嚴厲的司令員，深圳的群眾卻親切地向他呼喊「叔叔好」、「爺爺好」，在他們看來，他熱情機智，平易近人，對所有新事物有著濃厚的興趣。

但是，在乘車時的私下場合，他憤怒批評了北京的保守派。他要求隨行的當地幹部——他們都支持他的想法——不要公開他的私下談話。不過即使在公開場合，他也表明了自己的擔心，他說，左的政策會造成可怕的後果，甚至會葬送社會主義。<sup>[23-28]</sup>他警告說：「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sup>[23-29]</sup>在與地方幹部的坦率交談中，針對那些把特區說成搞資本主義、受到外國人控制的批評者，他說，只有四分之一的投資來自外國人。他又說，中國在政治上控制著所有外國公司，可以確保它們對中國有益。他不僅不擔心現在的外資水平，還主張增加外資數量，建立更多的合資企業：外國企業不但交稅，還能夠為工人提供就業崗位和工資。<sup>[23-30]</sup>

與在北京參加黨內會議的鄧小平相比，已經退休的鄧伯伯和當地幹部的交談要隨意得多。鄧小平心情放鬆，不拘一格，風趣的言談常引起當地領導的共鳴。鄧小平上了他的最後一堂課：他敦促幹部們大膽工作，努力試驗。他重複了他在各地說過的話：堅持改革開放，保持一個精幹的政府，培養年輕人，少說多做。參觀了世貿中心大廈後，鄧小平在返回賓館的大巴上再次談到他的很多基本觀點：計劃不等於社會主義，市場也不等於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要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先富起來的地方要多繳稅，用來幫助落後地區。但各地的情況不可能很快拉平，不能搞「大鍋飯」，這會打擊人們的熱情。鄧小平鼓勵幹部進行試驗，敢於冒險，不要怕犯錯誤，有錯改了就好。<sup>[23-31]</sup>

鄧小平鼓勵深圳在 20 年內趕上香港、新加坡、南韓和臺灣這亞洲四小龍。他說：「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該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聽過有關深圳的貪污受賄和腐敗問題的彙報後，鄧小平說：「你們要堅持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兩手都要硬。」<sup>[23-32]</sup>

在深圳度過五天後，1 月 23 日深圳市委書記李灝向鄧小平介紹了他對司法體制加以改造、規範和擴充的計劃。鄧小平仿佛仍在擔任國家領導人一樣，表示完全同意這些想法，並鼓勵李灝大膽落實。北京的很多幹部批評深圳走得太快，但鄧小平送給李灝的離別語是：「你們要搞快一點。」李灝回答說：「我們一定會加快步伐。」<sup>[23-33]</sup>鄧小平的下一站是珠海，該市市委第一書記梁廣大來到深圳，陪同鄧小平一家人和省裏的官員，乘船一小時跨過寬闊的珠江三角洲，來到了珠海。當船經過清代海關舊址時，鄧小平再次提到他的離別叮囑的要點：中國過去受到外國帝國主義的欺負，但那時代已經過去了，「落後就要挨打啊。我們已經窮了上千年，不能再窮下去了，如果不重視科學技術和教育，還要挨打」。<sup>[23-34]</sup>

廣東省委書記謝非和梁廣大十分清楚，鄧小平也擔心日益加劇的經濟不平等現象；他們知道他一直在鼓勵先富幫後富。他們在船上告訴鄧小平，一派繁榮氣象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正在大力幫助廣東北部和西部的貧困山區。鄧小平回答

說，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進步，靠的是各地願意搞試驗的人的創造性，靠的是政府將行之有效的做法進行宣傳、把各種新思想推廣到全國其他地區的能力。<sup>[23-35]</sup>

澳門比香港小得多，也不像香港那樣喧鬧。與此相似，毗鄰澳門的珠海比深圳小，也不像深圳那樣繁忙。在珠海 29 層貿易中心的頂層旋轉餐廳，鄧小平和家人眺望了建設中的高樓大廈。就像在深圳一樣，鄧小平與群眾熱情相處。在珠海的一家工廠，有人估計他和上百人握了手；在大街上，保護他的警察不得不限制他走進人群和更多的人握手。

鄧小平在詢問當地居民時，想搞清楚沿海城市的經濟發展能以多快的速度向偏遠地區擴展，推測未來的發展對群眾意味著什麼。他已經能夠看到很多跡象，各種消費品——自行車、洗衣機、收音機、手錶等工業製品——正在走進農民家庭。<sup>[23-36]</sup>他高興地聽到窮困地區的農民工在沿海地區找到了就業機會。海外留學青年回來報效祖國的報告也讓他大受鼓舞。他得知富有創業精神的中國人所領導的工廠已經接近世界技術水平。他表揚了當地領導利用市場推動社會主義事業所取得的成就，而從中受益的社會主義制度又能使市場更加成功。他說，從集中人力抓緊辦事這方面說，資本主義趕不上社會主義。他還指出，如果沒有從 1984 年到 1988 年取得的進步，1989 年到 1992 年這個困難時期的事情就不會那麼順利。

從珠海驅車前往廣州的途中，鄧小平在珠海以北的兩個縣——中山和順德——停留了片刻，經濟特區的活力向鄰近地區的快速擴散也使這兩個地方蒸蒸日上。在廣州與省領導層交談了一個小時後，鄧小平登上列車前往上海，途中在江西東部的鷹潭作了短暫停留。<sup>[23-37]</sup>

到達鷹潭時，鄧小平也在車站會見了當地幹部，他們向鄧小平彙報了去年的大豐收和抗擊洪災取得的成績。鄧小平對他們的工作給予表揚，但也對他們說，要多種樹，這能防止造成洪災的水土流失。鄧小平還說，幹部要走得更快一點，放開膽子進一步放開。鄧楠這時插嘴說，父親一路上老是在重複這些話；她又說，父親很關心江西，六十年前他就在江西蘇區工作過，文革中又在江西生活了三年半。事實上，鄧小平一路上講了不少自己 1931 年在瑞金和會昌的往事。<sup>[23-38]</sup>鄧楠提醒父親說，1973 年 2 月 19 日，在經歷了文革期間「下放」農村的歲月後，他們一家人就是從鷹潭踏上了返京的列車。<sup>[23-39]</sup>如今他們從鷹潭乘坐列車前往上海，當他們抵滬時，鄧小平在廣東播下的擴大對外開放的種子已經開始結出果實了。

## 突破

鄧小平在 1990 年和 1991 年未能讓國家回到改革開放的快車道上，但是由於香港的媒體和珠海的一次會議，他在 1992 年取得了戲劇性的突破。

按照行程安排，鄧小平沒有舉行記者招待會，但他在深圳的消息一傳出，香港記者便蜂擁越過邊境前來報道他的南行。1 月 22 日，鄧小平到達深圳三天後，香港的《明報》就爆出了他南行的消息和加快開放的意見。該報還說楊尚昆也在深圳陪同鄧小平。敏感的香港讀者立刻意識到，鄧小平的南行並非尋常的家庭外出度假。

香港左派報紙的編輯仍記得很多同事因支持「六四」示威而被解僱，因此在報道鄧小平的行程和講話時忐忑不安，但他們仍然在 1 月 23 日同香港電視台一起報道了鄧小平來到深圳的消息。由於中國的宣傳部門無法在毗鄰香港的大陸地區遮罩掉香港的電視信號，廣東南部有數百萬人在香港電視台上看到了鄧小平在深圳的部分畫面。

北京那些站在謹慎的計劃官員一邊的宣傳幹部面臨著艱難的選擇：儘管鄧小平南行的消息已在華南各地傳開，但他們可以繼續裝聾作啞；或者承認這次南行，但盡量弱化鄧小平對那些在改革開放上立場更保守的人的抨擊。同時，鄧小平的支持者——那些希望允許他們加快發展的南方當地幹部，則願意冒險把鄧小平的意見傳播出去。

由於鄧小平在深圳和珠海引起的關注，保守的媒體負責人很難對他的南行佯裝不知，但他們還是努力這樣做了。2 月 3 日，北京的電視台播出了鄧小平和楊尚昆與上海領導人參加春節團拜會的消息，但隻字未提他的深圳和珠海之旅或推動改革的努力。同一天，英文版《中國日報》登出一幅楊尚昆和鄧小平在深圳拍攝的照片，但並未註明照片日期。2 月 4 日，上海市委下屬的《解放日報》的編輯很聰明，他們沒有提鄧小平南行，但在頭版登出一篇文章讚揚鄧小平解放思想的努力，這是得到三中全會批准的，也可以視為給上海要上馬的大項目助力。<sup>[23-40]</sup>不過，當時廣東和上海的地區媒體都極想傳播鄧小平南行的消息，加之鄧小平南行在華南已是家喻戶曉，北京的宣傳部門也無法阻擋外界知曉鄧小平南行的目的。

在珠海，鄧小平召開了一個表面上與軍事規劃——在江澤民領導下，這項工作又熱了起來——有關的會議。鄧小平把他在武漢說過的話又重複了一次：「誰不改革，誰就下台……我們的領導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們沒做任何有用的事。」<sup>[23-41]</sup>鄧小平在珠海出席的這次有關「軍事規劃」的會議是由六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喬石主持的。由於喬石分管國內治安，開這樣的會也順理成章，但喬石也被很多人認為具備擔任最高領導人的素質，是江澤民的潛在競爭者，所以這次會議也可能和中國的領導層的人事安排有關。對江澤民來說更加意味深長的是，出席會議的還有國家主席兼軍委副主席楊尚昆和另一名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將軍。到會還有楊尚昆的弟弟、解放總政治部主任兼中央軍委秘書長楊白冰。這些幹部都與安全問題有關，但他們對加快改革的必要性的認識也與鄧小平意見一致。<sup>[23-42]</sup>

中國出版的有關鄧小平南巡的書中沒有提到珠海會議，官方的《鄧小平年譜》中也沒有相關紀錄。這種省略不難理解，中共領導人不想向群眾透露黨內矛盾。但是，會議的與會者和珠海的觀察者所透露出的消息，從江澤民在會後幾周內的反應中得到了證實。出席會議的軍隊領導人的強大陣容表明，如有必要，軍隊高層願意擁護一個新的領導人。

## 江澤民的反應

亟欲得知珠海會議確切內容的江澤民，說服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賈慶林給了他一份會議錄音；此後不久官方就宣佈賈慶林入選政治局。江澤民並沒有在春節給鄧小平打電話的習慣，但是在 2 月 3 日，即鄧小平離開珠海五天後，江澤民打電話給鄧小平拜年。他後來承認，這次通話並非隨意而為。<sup>[23-43]</sup>此後江澤民便成了更大膽的改革派。

鄧小平於 1 月 31 日到達上海，在那裏休息了三周。與在特區時相比，他邁著更加從容的步伐視察了浦東的開發，審閱了他在深圳和珠海講話的文稿。<sup>[23-44]</sup>他還遊覽了剛完工的浦東大橋以及楊浦大橋的建設工地。<sup>[23-45]</sup>他再次作了「自我批評」，說過去沒有把上海建成特區是一個錯誤，但是他提出，上海現在起步可以利用它作為後來者的優勢，從廣東的經驗中學習，能夠把事情辦得更好。

同時，由曾做過華國鋒和胡耀邦秘書的鄭必堅牽頭的一個寫作班子，寫出一個對鄧小平在深圳和珠海的講話作了系統總結的稿子。他們先是拿到了廣東幹部準備的一份兩到三萬字的鄧小平南行講話紀要，和鄧小平一起作了數次修改後，把它濃縮為一個七千字的報告。與鄧小平在行程中的生動講話相比，這個報告看上去官方色彩更濃一些，它在鄧小平離開上海前完成。<sup>[23-46]</sup>

鄧小平在上海停留期間，陳雲也住在上海，但鄧小平沒有安排與他見面。不過楊尚昆主席和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親自去給陳雲拜了年。<sup>[23-47]</sup>像陳雲這樣老練的領導人自不難理解鄧小平這些精心謀劃的動作在政治上的微妙之處，也不難瞭解鄧小平加快改革的努力所得到的軍界的強力支持，以及浦東開發計劃所得到的上海市委的熱烈擁護。

鄧小平十年來一直忙於工作，從未逛過商店，但是他有一天上午去了當時中國最大的零售商店——上海第一百貨公司。他在這裏可以看到琳琅滿目的消費品，這與 14 年前改革剛開始時消費者在貨架上看到的可憐的供應狀況形成了鮮明對比，這只會使他對中國的進步感到更加自豪。<sup>[23-48]</sup>在女兒鄧榕的幫助下，他給孫子們買了幾枝筆，作為送給他們的禮物。

當鄧小平踏上回京的列車時，他有理由期待自己的南行達到了目的，現在江澤民要加快發展與改革了。<sup>[23-49]</sup>確實，從 2 月 20 日鄧小平離滬回京到 3 月 6 日，《深圳特區報》的人對鄧小平會取得最後的勝利相當樂觀，大膽發表了八篇詳細報道鄧小平南行的系列文章。<sup>[23-50]</sup>雖然北京宣傳部門的領導試圖阻止這些文章進入北京，但最終仍無法避免它們被全國的讀者看到，當然也包括首都北京的人。

2 月中旬，鄧小平回京前幾天，江澤民已經在公開說，他擁護鄧小平進一步改革的呼籲。<sup>[23-51]</sup>江澤民通過從珠海得到的報告認識到，鄧小平已經下定決心，假如他不大膽推進改革開放，鄧小平就會讓他靠邊站。江澤民從鄧小平的南行中，能夠看到他爭取到了北京和地方重要領導人的很多支持。後來江澤民也承認，當時他斷定鄧小平的觀點會佔上風，他的明智之舉就是支持這些觀點。<sup>[23-52]</sup>

鄭必堅整理出的鄧小平特區講話概要完成後，江澤民經政治局批准，把稿子發給了人數有限的最高層幹部。與鄧小平的即興講話相比，整理後的講話稿已不那麼咄咄逼人，但依然有力，直截了當。當黨內領導層開始意識到鄧小平南行所受到的關注並讀過報告後，他們認識到鄧小平儘管已經年邁，但他在發動一場決定性的戰役，他的擁護者正在迅速增加。<sup>[23-53]</sup>上海、廣東等地的領導人希望加快市場開放，對其結果更加樂觀，所以都站在了鄧小平一邊。即使沒有鄧小

平的南行，外國制裁的逐漸取消和保守派在降低通脹壓力上取得的成功，也會使中國的領導層提高發展目標。但是鄧小平的南行及其成功地讓江澤民轉變立場，使變化來得更早，並以更快的步伐持續下去。

儘管江澤民開始轉向鄧小平的觀點，全國性的媒體仍遲遲沒有宣傳鄧小平的南行和講話內容。2 月 20 日，鄧小平回京的前一天，保守派的雙月刊《當代思潮》為維護計劃官員的謹慎觀點作出了最後抵抗，發表了鄧力群的一篇無疑是反映陳雲觀點的文章。該文稱，主要危險不是來自左，而是來自右。「信奉自由主義執迷不悟的人，正是打著反『左』的幌子，反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如不加以反擊，結果必然是各種反共思想的大氾濫。」<sup>[23-54]</sup>

然而潮流已變。文章登出來之後，保守派的聲音日漸衰落，因為江澤民及其同事開始讓民眾作好準備，他們要回應鄧小平加快發展的呼籲。2 月 21 日，即鄧小平回京當天，《人民日報》刊發了根據鄭必堅整理的講話稿撰寫的社論，題為〈更大膽地進行改革〉。<sup>[23-55]</sup>社論仍然未提及已被香港媒體大肆報道了一個月的鄧小平南行。但是一周後的 2 月 28 日，北京領導人下發了根據鄧小平一周前的講話寫成的中央 2 號文件，在更多的高層幹部中傳閱。就像大多數黨的文件一樣，它措辭慎重，四平八穩，失去了鄧小平最初講話的力量與活力。文件的標題是〈關於傳達和學習鄧小平同志重要講話的通知〉。它只印發給了全體中央委員和個別團體，例如中央黨校的 2,000 名學員和教師。<sup>[23-56]</sup>

在 3 月 9 日至 10 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全部 15 名政治局委員討論 2 號文件時，形成了一致支持文件的意見。鄧小平以地方幹部的支持作為後盾奮力前行，他利用了香港媒體並動員軍隊的支持。但是他也利用了經濟領域傳來的喜訊。不但通脹在陳雲的努力下得到控制，工業也開始增長，出口強勁，外國開始放鬆制裁。經濟擴張的氣氛已經大為改善。

在政治局會議上，楊尚昆主席首先發言大力支持文件，江澤民隨後也表示完全擁護鄧小平的意見，承認自己在推動改革上行動不力。<sup>[23-57]</sup>政治局一致肯定了鄧小平南行講話中加快改革開放步伐的觀點，同意把它作為將在年底召開的中共十四大的核心內容。鄧小平後來也同意將 2 號文件作為三卷本的《鄧小平文選》的最後一篇文章。熟悉鄧小平言行的人，不會對他的意見的基本思想感到意外：更大膽地實行改革和對外開放。

3 月的政治局會議之後，鄧小平南行講話的要點就成了官方政策的指導方針。3 月 11 日，政治局會議後的第二天，也是鄧小平開始南行兩個月以後，新華社終於正式報道了鄧小平南行的新聞，並在相關社論中提出要更大膽地實行改革開放。但是直到 3 月 31 日，《人民日報》才終於「歸隊」，刊登了鄧小平視察深圳的詳細報道。

## 氣氛的變化

隨著鄧小平南行的消息得到全面報道以及政策開始發生變化，鄧小平的講話也成了著名的「南巡談話」。「南巡」是帝制時代皇帝巡視南方（指長江流域，不像鄧小平南下那麼遠）時使用的說法。為了消除鄧小平像個皇帝的印象，官方的說法換成了更為中性的「南方談話」。

保守派幹部意識到了鄧小平講話得到的普遍擁護，勉強同意了反映鄧小平講話精神的文件。在 3 月 20 日全國人大的年度會議上，人大代表中間的政治氣氛反映著鄧小平南行帶來的幹勁。<sup>[23-58]</sup>知識分子和軍隊幹部利用已經變化的氣氛，在各自單位向左傾思想發起了進攻。楊白冰在 3 月 23 日宣佈，軍隊要「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這是在明確警告那些拖後腿的人。

5 月底，黨中央印發了旨在貫徹鄧小平政策的 4 號文件。文件宣佈開放長江沿岸的 5 個內陸城市和 9 個邊境城市，並宣佈 30 個省會城市一律享有和經濟特區同樣的特殊政策。<sup>[23-59]</sup>

南行後的幾個月裏，鄧小平並沒有同江澤民見面，告訴他如何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也沒有明確表示支持江澤民。實際上，據江澤民說，他覺得鄧小平仍在考驗他，潛在威脅猶在：假如江澤民不全力支持改革，得到軍隊擁護的鄧小平有可能用喬石把他換掉。

江澤民決心在鄧小平的最後考試中過關。春季，在公開場合，他變成了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大力鼓吹者。他仔細擬定了 6 月 9 日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學員畢業班上的講話。<sup>[23-60]</sup>在這篇題為〈深刻領會和全面落實鄧小平同志講話的重要精神，把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講話中，他全面說明了貫徹鄧小平南巡講話精神需要做些什麼，總結了鄧小平自 1978 年三中全會以來的貢獻。江澤民說，要加快改革步伐，把增長目標提高到每年 9% 至 10%（當時五年計劃的官方目標仍是李鵬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所說的 6%）。江澤民說，要大膽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經驗，沒有必要討論改革姓「資」還是姓「社」。江澤民進而把這些想法概括為一個他估計能得到鄧小平贊成的說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sup>[23-61]</sup>

6月12日，在作了這次重要講話三天以後，江澤民這位後輩抱著希望去問師傅，是否同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說法，顯然它是被打算用來取代陳雲的「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鄧小平說他喜歡江澤民的講話，這讓江澤民如釋重負；鄧又說：「其實深圳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江澤民的考試過了關。隨後，鄧小平仿佛仍然是最後的決策者那樣，他讓江澤民把中央黨校的講話在內部傳閱，如果反響好的話，可以作為十四大的主題。不出意外，反響果然不錯。

陳雲是謹慎保守的政壇元老，但也是一向擁護中央決策的嚴守紀律的黨員，他接受了政治局關於加快改革開放的一致決定。1992年初他為過冬去上海住了數月，他看到浦東的進步，與負責開發浦東的上海幹部進行了交談。4月26日，陳雲回京的前一天，聽了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和市長黃菊的彙報，他不但贊成他們搞活上海的努力，而且讓他們膽子更大一些。

大約三個月後的7月21日，陳雲在紀念他的長期同事、一個月前去世的李先念的文章中寫道：他和李先念從未去過特區，但是他們都認為這種試驗是必要的，「我們要從特區的經驗中學習，把它們辦成功」。他說，他對深圳的現代建築、它所取得的出口增長率遠高於進口增長率的巨大成就印象深刻。他還說：「中國的經濟發展變得規模更大，比過去更複雜，很多過去有效的做法已經不能適應當前改革開放的形勢。新的形勢要求我們不斷學習探索，解決新問題。」<sup>[23-62]</sup>陳雲一直在努力將通貨膨脹降下來，使計劃體制平穩運行。1992年，多虧他在1988年開始實行的緊縮政策，通脹得到了控制，出口克服了外國制裁的影響開始增長。陳雲在他的畢生事業即將結束時，承認中國正在進入一個更加複雜的新時期。實際上他是給下一代領導人投了信任票，他們將帶領中國走上另一條道路，這與他過去為之奮鬥的道路大不相同。

到夏天時，鄧小平已鞏固了自己的勝利。地方幹部獲准提高投資比例，擴大對外貿易，沿海地區的試驗也被推廣到內地。鄧小平可以把精力用於國家在今後幾十年將面對的另一些問題了。7月24日，在看了為即將召開的十四大準備的文件草稿後，鄧小平提出了幾個有待思考的問題：農村體制、他本人在中國的發展中的作用、統治制度、國家安全。

關於農村政策，鄧小平承認，包產到戶和取消公社對於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是必要的。但是由於新的農業技術的出現和發展，耕作小塊土地的農戶單靠自身財力無法提升技術，到一定時候仍然需要大的集體組織。鄧小平建議領導人在這件事上不要操之過急，要等待農戶主動要求改變體制。

在考慮自己的思想遺產時，鄧小平說，領導人不能誇大本人的作用，要實事求是。推動改革開放是一個宏大而複雜的過程，沒有哪一個或幾個領導人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到。例如，誰也沒有事先深入思考過依靠鄉鎮企業，它們卻成了中國發展的重要因素。1978年以來中國取得的成功，是來自廣大人民群眾的經驗。他本人的作用只是把這些發展作了總結，向更多的人推廣。

關於統治和自由的問題，鄧小平說，「民主集中制」仍是「最合理的制度」，要作為治國的基本原則加以堅持。領導人要想辦法鼓勵人們表達自己的觀點，但是決定一旦作出，就應當服從集體決定。

鄧小平還談到中國的安全問題。他說，各國之間的勢力制衡正在發生重大變化，仔細研究這些變化十分重要。在當前形勢下，他認為中國可以繼續縮小軍隊規模，但同樣重要的是提高軍隊人員的素質，增強戰鬥力，準備好在必要時能夠保衛國家。<sup>[23-63]</sup>

鄧小平審閱並批准了江澤民將在十四大上做的報告。報告的核心內容是他南行時表明的觀點：加快改革開放。

## 中共十四大：1992年10月12–18日

中共十四大像以往一樣，對有關當前和未來政策的文件作了認真討論，但它首先是對鄧小平及其成功政策的公開頌揚——實際上，是為他的退休召開的歡送會。大會的主要發言，即江澤民所做的政治報告，充滿了對鄧小平及其政策的讚揚，這一政策將成為中國未來五年的指導路線——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然，江澤民的講話也反映著與保守派的某種妥協。鄧小平原來提出的年增長率是10%，江澤民的報告則建議把目標定為8%或9%，但這仍比李鵬早先提出的6%高出許多。<sup>[23-64]</sup>

江澤民不但讚揚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而且把他的觀點上升到「鄧小平理論」的高度。知情人都清楚，鄧小平是個實幹家，不是意識形態宣傳家；與共產黨國家的很多領導人不同，他並不認為擔任最高領導人必須成為

理論家。但是對於江澤民來說，把鄧小平的觀點上升到理論高度，能夠加強它的重要地位，使之可以與「毛澤東思想」平起平坐，讓人們能夠像幹革命一樣集中精力搞四化。

鄧小平的功績是，他提出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採用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說法。鄧小平「理論」正是按他所希望的樣子完成的：它們為支持繼續擴大市場的實用主義政策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合法性。江澤民還重申了鄧小平關於有些事情不要管它姓「社」姓「資」的觀點。公有制仍然是主要的所有制形式，但要繼續使國有企業變成更加獨立的經濟單位。要在試驗的基礎上引入股份制，不但要擴大商品市場，還要發展資本、技術、勞動力、信息和住房市場。科學技術不但是生產力，而且是第一生產力。<sup>[23-65]</sup>總之，這次大會是對鄧小平基本觀點的明確肯定。毛澤東的基本信念——階級鬥爭和不斷革命——在他去世之前就已經式微，並且隨著他的去世而消失。相反，鄧小平的基本政策和人民的經濟需求與願望產生了共鳴，在後來的十幾二十年裏繼續指導著政府的決策。

在天安門悲劇剛過去三年的這次大會上，江澤民像鄧小平一樣，更加強調穩定而不是政治改革。在十四大上，他沒有再提趙紫陽在上次大會上提出的黨政分開和黨企分開。像鄧小平一樣，江澤民用嚴厲的措詞譴責了 1989 年的「反革命暴亂」，但他仍然堅持主要威脅不是來自右，而是來自左。<sup>[23-66]</sup>

雖然鄧小平的精神主導著中共十四大，但直到大會結束時他才到場。鄧小平進入會場時，走到江澤民身邊站了大約 20 分鐘，讓電視攝錄機拍下他們兩人在一起的鏡頭。鄧小平把衣鉢傳給江澤民，這條新聞傳遍了全國，傳向世界。<sup>[23-67]</sup>江澤民已經表明要堅定地繼續實行改革開放，鄧小平現在表明他完全支持江澤民。從那一刻起，江澤民不再需要回頭看鄧小平是否同意；權杖已傳到他的手裏，鄧小平等人現在把他稱為黨的第三代「領導核心」。<sup>[23-68]</sup>

在中共十四大之前不久，鄧小平迫使他的長期盟友、與他一起南行的楊尚昆和楊白冰兄弟退休。<sup>[23-69]</sup>鄧小平指定 77 歲的劉華清——他能聽從江澤民的領導——和江澤民的親信曾慶紅取代了他們。<sup>[23-70]</sup>江澤民長久以來一直覺得，比他資格老的楊氏兄弟是礙手礙腳的對手。鄧小平早先曾對江澤民說：「毛主席當家時是他說了算，我當家時是我說了算，如果你當家後也能說了算，我就放心了。」<sup>[23-71]</sup>鄧小平與楊尚昆和楊白冰關係密切，但是對於他來說，一個強大團結的國家領導班子要比私人友情更重要。他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讓江澤民獲得能指揮一班人為國家提供有效領導所必需的全部權威。

毛澤東去世後，他選出的接班人不是被捕就是被排擠到一邊，而鄧小平退休前選出的接班人繼續領導了國家二十多年。在 1997 年的中共十五大上，江澤民再次當選為新一屆領導人，他幹完了十年任期，外加趙紫陽留給他的兩年。儘管鄧小平在 1992 年春天之前有一些擔憂，但江澤民在天安門悲劇後的艱難時期，面對世人的懷疑和外國制裁，成功維護了國家的團結並領導著國家。他堅定地執行著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表現出傑出的政治才幹。鑒於天安門悲劇和蘇聯東歐共產主義政權全面崩潰後的各種不確定因素，江澤民能成功地掌舵穩定前行，堪稱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1992 年 6 月，被鄧小平在 1991 年調到北京的可靠的經濟領導人朱鎔基副總理，兼擔任了新組建的經貿辦公室主任，這個部門成了在監管經濟工作方面權力最大的機構。<sup>[23-72]</sup>後來，1993 年 3 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宣佈了新的政府人事任命，李鵬再次當選總理，朱鎔基成為第一副總理。李鵬在鎮壓「六四」示威中發揮過重要作用，所以只要有他擔任總理，鄧小平便不必擔心為「六四」平反的問題。朱鎔基在管理經濟上成績卓著，尤其是他既克服了通脹壓力，又沒有使經濟像 1988 年至 1989 年那樣硬著陸。朱鎔基在 1997 年中共十五大上成為國務院總理。

鄧小平在十四大選定的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輕的成員是胡錦濤，他成為繼江澤民之後的接班人。那次大會時他只有 50 歲，比其他成員的平均年齡小 8 歲。胡錦濤努力爭取其他老領導對他的繼續支持，後來經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通過，他作為第四代領導人核心擔任了兩屆總書記。這樣，鄧小平選定的接班人在 1992 年之後就得到了三屆黨代表大會的認可。

正如鄧小平計劃的那樣，中共十四大也標誌著任期終身制的結束。為老一代革命家表達意見提供正式渠道——因此也緩解了他們從一線退下來後的心情——的中央顧問委員會被正式解散。不但鄧小平，而且包括鄧小平的對手陳雲在內的老一代領導人，全都退出了政壇。此後，包括最高領導人在內的所有任命都有任期限制。1992 年當選的另一些擔任重要職務的幹部，都是根據鄧小平的人事政策——把在原来的崗位表現突出的人一步步提拔到更高的崗位——選出來的。

1992 年當選的政治局委員，都是與鄧小平的政策完全步調一致的人。進入政治局的兩名政府部長——外交部長錢其琛和外交部部長李嵐清——以外交事務和擴大對外開放作為本職工作。在 1992 年以前的政治局委員中，有一名代表內陸省份的成員，但他在 1992 年落選，新增的五名擔任省級職務的政治局成員，都來自在鄧小平開放政策下蓬勃發展



的沿海省市：廣東的謝非、北京的陳希同、上海的吳邦國、天津的譚紹文和山東的姜春雲。仍然留在政治局的北京幹部也都是來自沿海地區：喬石、楊白冰和劉華清，他們曾於鄧小平南巡期間在珠海與他一起策劃戰略。這些資深領導人的年齡使他們不會忘記大躍進的失敗。他們多數在 1960 年代早期就擔任重要職務，在文革中受過衝擊。1978 年之後他們成了堅定的改革派，決心貢獻他們的餘生糾正錯誤的政策，推動中國的現代化。

與這些人相比，江澤民手下後來成為第四代領導人的都不是老革命，而是在鄧小平那一代領導人建立的體制下成長起來的好學生。他們出生在戰爭年代，卻是在 1949 年後共產黨的領導下接受的教育。他們年齡太小，沒有趕上去蘇聯或東歐學習的機會；又因年齡太大，錯過了去西方留學的年代。他們上學時，西方的法學、經濟學和商業管理這些學科還沒有被引入中國，但他們在任職期間通過文件、會議和短訓班的形式學習了這方面的知識。他們是既能幹又眼界開闊的技術官僚，大多數人是學工程技術出身，接受現有體制並希望維持它的有效運轉。作為一個群體，他們的優點是做事負責，與同事和下級都能搞好關係，不會挑戰上級。他們沒有經歷過嚴重危機的考驗，也不準備挑戰現行體制。他們只是在鄧小平那一代人建立的框架內，務實而勤奮地工作著。

## 南巡的成果

按照中共十四大和 1993 年 3 月全國人大會議把增長率定為 8% 或 9% 的政策，更多的地方投資和建設項目得到了批准。在鄧小平 1992 年南巡後的幾年裏，中國取得了世界上史無前例的增長率，其規模也是前無古人的。實際上，從 1992 年到 1999 年，每年的經濟增長率都超過了 10%。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轉引自 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 p. 373.

天安門悲劇後的 1989 年至 1991 年，外國直接對華投資陷入停滯，平均每年只有 40 億美元；但是從 1992 年到 1999 年，由於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和外國制裁的逐漸減弱，每年吸引的外資平均為 350 億美元。快速增長引發了又一輪經濟過熱和通脹壓力，但朱鎔基在 1995 年以軟著陸方式控制住了這些壓力。

允許一些指定的企業直接與外國公司做生意的決定，使對外貿易突飛猛進。在此之前，從事進出口的企業都要通過國營外貿公司進行交易，這使它們難以及時把握國外市場的機會。此外國營外貿企業也應付不了外貿的迅速擴張。不過，漸漸地，先是某些指定的企業被允許直接與外企做生意，然後這類企業的數量不斷增加。在改革派實行新政策後，住房建設也開始騰飛。1995 年以前，住房都是由工作單位或城市的幹部分配，這一年之後政府放開了住房市場，國家僱員得以按補貼價買下自己的房子。由於私人房地產市場的建立和從建房中獲利的機會的到來，新住宅的建設速度令人瞠目結舌。<sup>[23-73]</sup>

鄧小平的南巡並沒有使謹慎的計劃派和保守的意識形態宣傳家閉口不言，但卻使可以接受哪些目標和手段的爭論再次轉移了方向；不論有多麼勉強，即使最警惕的計劃派也開始逐漸接受讓市場和外貿發揮更大作用。隨著無數中國人從國內外市場中受益，改革開放成了不可逆轉的政策，重新關上 1978 年後打開的大門已經不可能了。

## 記住鄧小平

在 20 世紀後幾十年的時間裏，中國的不斷革命斷送了它的許多英雄。鄧小平本人就經歷過三起三落，但他在晚年要比任何一位同儕更幸運，他們中間的很多人結局淒慘甚至是悲劇。1976 年「四五」示威之後，毛澤東在生前最後幾個月所面對的現實是，北京的老百姓拋棄了他的文化大革命和階級鬥爭，他們更喜歡周恩來的四個現代化。周恩來在去世前知道自己仍然受到毛澤東和他為之奉獻了一生的黨的批評。劉少奇在「文革」中受到批判，因得不到適當治療在軟禁中死去。胡耀邦被無情罷免後，最後兩年受到與他共過事的領導人的冷落。趙紫陽在監禁中去世，生前官方對他閉口不談，只允許他接待寥寥幾個經過選擇的客人。華國鋒靠邊站後受到羞辱。葉帥愉快地退了休，在他所熟悉的家鄉安享晚年，但他對北京的變化已不再感到很舒服。

鄧小平知道，他對 1989 年天安門示威運動的處理方式，會被很多人認為是他一生中的巨大污點。無論國內國外，很多人認為他在 1989 年 6 月過分關心維護社會秩序、同意向街頭的無辜百姓開槍是不可饒恕的行為。他們認為他有機會推動民主事業，卻沒有作出足夠的努力。他沒有解決腐敗和不平等的這類根本問題。相反，為鄧小平辯護的人則讚揚他敢於承擔責任的勇氣，他為維持國家的統一做了不得不做的事。

然而，不管對天安門悲劇的看法如何，很多人欽佩他以 87 歲高齡毅然踏上南行之路以確保中國在加快改革開放的道路上繼續前行的步伐的舉動。確實，在生前的最後幾年裏，鄧小平看到了自己選定的接班人仍遵循著他所制訂的政策，而這些政策推動著中國的進步。最後幾年他與家人一起度過，並受到黨和人民的愛戴。他引導中國完成了從落後、封閉、僵化的社會主義制度走向一個有國際影響的現代化經濟強國的艱難過渡。假如中國人要感謝某一個領導人改善了他們的日常生活，這個人就是鄧小平。在為改善如此之多的人民的生活作出的貢獻方面，20 世紀是否還有其他領袖能夠與他相比？20 世紀是否還有其他領袖對世界史產生了如此巨大而持久的影響？

鄧小平曾說，他要讓人們記住一個真實的他。他希望人們好好地記住他，但不想讓人們像吹捧毛澤東那樣為他大唱讚歌。毛主席自視為功高蓋世的皇帝，鄧小平則從不自視為「天子」。他只想讓人們記住他是一個凡人，是「中國人民的兒子」。

鄧小平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 1994 年春節。此後他的健康狀況惡化，再也沒有力氣參加會議了。他於 1997 年 2 月 19 日午夜後去世，享年 92 歲，死因是帕金森綜合症和肺部感染。<sup>[23-74]</sup>他要求自己的葬禮簡單樸素。毛澤東的遺體經過處理後被安放在專門建立的毛主席紀念堂供人瞻仰。但不會有鄧小平紀念堂。2 月 25 日，大約一萬名經過挑選的黨員在人民大會堂參加了鄧小平的追悼會。江澤民強忍著淚水唸完悼詞。<sup>[23-75]</sup>追悼會通過電視做了轉播，有關鄧小平生平的報道在此後數天一直佔據了媒體的主要位置。按照鄧小平的遺願，他的眼角膜被捐出供眼科研究，內臟被捐出供醫學研究，遺體被火化，骨灰盒上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1997 年 3 月 2 日，他的骨灰被撒入大海。

[23-1] Joseph 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From Deng Xiaoping to Hu Jintao*,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3-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90 年 1 月 20、26 日，2 月 13 日，頁 1307–1308。

[23-3] Victoria Wu, “The Pudong Development Zone and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Planning Perspectives* 13, no. 2 (April 1998): 133–165; 中央文獻研究室科研部圖書館編：《鄧小平人生紀實》（三卷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三卷，頁 2019–2052。

[23-4] 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頁 214–216、220。另一紀錄見中央文獻研究室科研部圖書館編：《鄧小平人生紀實》。

[23-5] 《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0 年 1 月 26 日，頁 1307。

[23-6] 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 216。

[23-7] SWDXP-3, pp. 342–343; 《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0 年 3 月 3 日，頁 1309–1311。

[23-8] 《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0 年 2 月 13 日，頁 1308。

[23-9] SWDXP-3, December 24, 1990, pp. 350–352.

[23-10] Robert Lawrence 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The Life and Legacy of Jiang Zemin* (New York: Crown, 2004), p. 205.

[23-11] 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 204–222；黃宏主編：《硬道理：南方談話回眸》（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頁 127–149。

[23-12] SWDXP-3, pp. 353–355.

[23-13] 《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1 年 2 月 10、12、14 日，頁 1327–1328。

[23-14] 《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1 年 2 月 15 日，3 月 2 日，3 月 22 日，4 月 12 日（年譜中 1991 年並無這四天的條目。——中文版編者註）；黃宏編：《硬道理：南方談話回眸》，頁 130–136。

[23-15]James A. R. Miles, *The Legacy of Tiananmen: China in Disarra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pp. 78–83; Suisheng Zhao, “Deng Xiaoping’s Southern Tour: Elite Politics in Post-Tiananmen China,” *Asian Survey* 33, no. 8 (August 1993): 748–749.

[23-16]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p. 54.

[23-17]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p. 232.

[23-18]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 226。

[23-19]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 226。這話說於 1980 年 2 月 29 日。

[23-20]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 227–228。

[23-21]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 228–229。

[23-22]2003 年 10 月對陳開枝和另一些當地幹部的採訪，陳開枝曾陪同鄧小平視察。

[23-23]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 231–232。

[23-24]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 243。

[23-25]Miles, *The Legacy of Tiananmen*, pp. 96–97.

[23-26]2003 年 10 月對陳開枝的採訪，鄧小平南巡時他任廣東省委副秘書長，負責安排鄧小平在深圳和珠海的行程。另參見岑隆業編：《閱愛無價》（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頁 182–190；關於攝影記者和錄音機的記述見 Zhao, “Deng Xiaoping’s Southern Tour,” p. 750。記錄這次視察的另一份文獻見黃宏編：《硬道理：南方談話回眸》，頁 150–190。

[23-27]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 234–235。

[23-28]2003 年 11 月在廣州對一位與鄧小平隨行幹部的採訪。

[23-29]SWDXP-3, pp. 362–363.

[23-30]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 232; 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 212.

[23-31]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 240、245–246。

[23-32]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 232–233。

[23-33]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 246–248。

[23-34]岑隆業編：《閱愛無價》，頁 186。

[23-35]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 248–249。

[23-36]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 251–253。

[23-3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2 年 1 月 29 日，頁 1338。

[23-38]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 279–282。

[23-39]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 95.

[23-40]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 95; Zhao, “Deng Xiaoping’s Southern Tour,” p. 749; 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 286。

[23-41]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p. 212–213.

[23-42]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p. 95–96; Zhao, “Deng Xiaoping’s Southern Tour,” p. 749; *ibid.*, p. 213.

[23-43]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 214.

[23-44]鄧小平在 1985 年去上海時，有機會看到他在 1984 年前一次去上海的訪問和決定開放 14 個沿海城市所取得的初步成果，但是 1986 年冬天他去了桂林和重慶。1987 年他因為將胡耀邦撤職而帶來的麻煩沒有離開北京。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5 年 1 月 31 日，1986 年 1 月 24 日，1986 年 1 月 31 日，1988 年 2 月 10 日，1988 年 2 月 23 日，1989 年 1 月 21 日，1989 年 2 月 16 日，1990 年 1 月 20 日，1990 年 2 月 13 日。

[23-45]鄧小平在 1985 年去上海時，有機會看到他在 1984 年前一次去上海的訪問和決定開放 14 個沿海城市所取得的初步成果，但是 1986 年冬天他去了桂林和重慶。1987 年他因為將胡耀邦撤職而帶來的麻煩沒有離開北京。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2 年 2 月 7 日，頁 1339。

[23-46]2003 年 10 月對陳開枝的採訪。

[23-4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上中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1992 年 2 月 3 日，頁 441。

[23-48]我本人曾在 1973 年去這家商店，當時裏邊只陳列著樸素的棉布和熱水瓶。

[23-49]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 285–29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2 年 2 月 21 日，頁 1341。

[23-50]香港、深圳和外國報道的目錄見黃宏主編：《硬道理：南方談話回眸》，頁 192–200；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p. 242, n65.

[23-51]陳毛弟：〈江澤民考察上海時強調全黨要始終不移全面貫徹黨的基本路線進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開放步伐〉，《人民日報》，1992 年 1 月 20 日，第 1 版；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p. 214–215.

[23-52]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 214.

[23-53]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p. 213–214.

[23-54]1992 年 2 月 20 日，轉引自 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 101.

[23-55]Zhao, "Deng Xiaoping's Southern Tour," p. 750; 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p. 100–101; 另參見黃宏：《硬道理：南方談話回眸》，頁 195。

[23-56]對這份文件的權威性概述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2 年 2 月 28 日，頁 1341。鄧小平在深圳和珠海講話稿的定稿見 SWDXP-3, pp. 358–370.

[23-57]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p. 99–100, n50.

[23-58]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102.

[23-59]黃宏編：《硬道理：南方談話回眸》，頁 237；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p. 62.

[23-60]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p. 219–220.

[23-6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993），下冊，頁 2055–2089。

[23-62]SWCY, 3:370.

[23-6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2 年 7 月 23–24 日，頁 1349–1351。

[23-64]Tony Saich, "The Fourteenth Party Congress: A Programme for Authoritarian Rul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2 (December 1992): 1141–1142; 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64–368.

[23-65]Saich, "The Fourteenth Party Congress," pp. 1142–1146.

[23-66]Saich, "The Fourteenth Party Congress," pp. 1146–1148.

[23-67]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 222.

[23-68]例如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3 年 1 月 22 日，頁 1359。

[23-69]吳國光：《逐鹿十五大：中國權力棋局》（香港：太平洋世紀研究所，1997）。

[23-70]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 223; 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pp. 67–68.

[23-71]朱健國：〈李銳談「焦國標討伐」：痛感始皇難絕緣〉，<http://www.newcenturynews.com/Article/gd/200710/20071005150035.html>，2010 年 8 月 16 日訪問。

[23-72]Saich, "The Fourteenth Party Congress," p. 1154.

[23-73]Ding Lu, "China's Institution Development for a Market Economy since Deng Xiaoping's 1992 Nanxun," in John Wong and Yongnian Zheng, eds., *The Nanxun Legacy and China's Development in the Post-Deng Era*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01), pp. 51–73.

[23-7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7年2月19日，頁1375。

[23-7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7年2月25日；Jim Lehrer, host, "Transcript on Deng's Legacy, February 25, 1997," *On Line Focus*, at [http://www.pbs.org/newshour/bb/asia/february97/deng\\_2-25.html](http://www.pbs.org/newshour/bb/asia/february97/deng_2-25.html), 2010年3月5日訪問。

## 第 24 章

### 轉型的中國

鄧小平於 1992 年退出政治舞台時，完成了一項過去 150 年裏中國所有領導人都沒有完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事找到了一條富民強國的道路。在達成這個目標的過程中，鄧小平也引領了中國的根本轉型，不論在它與世界的關係方面，還是它本身的治理結構和社會方面。在鄧小平領導下出現的這種結構性轉變，確實可以稱為自兩千多年前漢帝國形成以來，中國最根本的變化。

鄧小平時代發生的轉型是由多種因素共同塑造的：高度發達的中國傳統，中國社會的規模和多樣性，當時世界格局的性質，共享技術和管理方式的全球體系的開放性，中國共產黨的性質，無數具有創造力和勤奮工作的人們的貢獻等等。但這種轉型發生在一個過渡時期，當時這位最高領導人被賦予相當大的自由去引導政治過程，並擁有最終決定權，所以這一轉型也是由鄧小平這位領導者個人塑造的。當然，這一巨變的思想基礎來自很多人，而且沒有人完全預見到了事情將如何展開。改革開放並非由鄧小平啟動，它是鄧小平上台之前在華國鋒的領導下起步的。鄧小平也不是手持偉大藍圖、主宰著變革的設計師；事實上，這個變革的時代並沒有清晰、完整、現成的設計。

不如說，鄧小平是為轉型過程提供全面領導的總經理。他把各種想法進行梳理和總結，用他的團隊和群眾所能接受的步調和方式展示給他們。他在最高層提供穩定的領導，使人們能夠在經歷巨變時保持信心。他的工作是選拔和指導一個團隊，讓他們齊心協力開創並落實各項改革。他是解決難題的人，努力找出有利於國內外相關各方的解決方案。他幫助培育起強而有力的統治結構，使之得以在中國人努力適應迅速變化的新環境時保持控制。他在確定問題的輕重緩急、制定實現最重要目標的戰略過程中發揮著領導作用。他向民眾解釋政策，以直白的方式講明他們面對的整體形勢和需要採取的具體措施。如果出現爭議，他是作出最終決定的人，並盡量將可能導致國家分裂的分歧最小化。他支持對人們進行激勵，也支持給人們提供建立在切實可行的基礎上的希望，以免讓人們以後失望。他贊成給各種專家——科學家、經濟學家、管理者和知識分子——足夠的自由，使他們能做好自己的工作；但是當他擔心脆弱的社會秩序可能受到破壞時，也會限制他們的自由。在改善同其他大國的交往、與它們的領導人建立切實可行的關係時，鄧小平扮演著核心角色。鄧小平的全部工作都受一種深刻信念的指導：採用世界最先進的科學技術與最有效的管理方式，將給中國帶來最大的進步；而這一嫁接外國科技與管理的過程對中國既有體制所帶來的震盪不僅是可控的，而且為了全體國民的福祉也是值得大力推行的。

無論中外，在鄧小平謝幕之後長大的人，都很難體會鄧小平踏上這個旅程時面對的是多麼嚴重的問題：一個把全然不同的新思維拒之門外的國家，文革中受迫害者和迫害者之間的深刻裂痕，驕狂的軍隊幹部對裁軍和減少軍費的抵制，民眾對帝國主義和外國資本家的敵視，城鄉社會保守的社會主義結構，城市居民對接受兩億農民工的抗拒，以及因一些人依然窮困而另一些人先富起來所引發的紛爭。

但是，當鄧小平全面接手中國轉型的工作時，也有一些極為有利的條件：他接過了由毛澤東統一起來的能夠有效運轉的全國性的政黨和政府；他有很多經驗豐富、像他一樣贊同深刻變革的老幹部共事；他上台時有一個開放的世界貿易體系，其他國家願意與中國分享資本、技術和管理，並歡迎中國加入國際體系。

鄧小平還有一些令人難忘的個人品質，使他得以引領中國的轉型。很難說除他之外還有哪個人能如此成功地把一系列特質組合在一起：權威、豐富的經驗、戰略意識、自信心、人脈關係和領導中國轉型所需的政治判斷力。那麼，鄧小平領導的這一轉型的性質到底是什麼呢？

### 從亞洲文明的中心走向世界大國

帝制時代的中國從來不是一個全球大國，甚至不是全球事務的積極參與者，它只是亞洲的一個地區性大國。鴉片戰爭以前，在主導中國對外關係的「天下秩序」中，周邊小的政治實體要向這個「中央帝國」的皇帝進貢。它們以這種方式承認中國文明相對於周邊地區的優越地位。作為交換，中國允許這些政治實體享有自治與太平。<sup>[24-1]</sup>

中國皇帝極少有興趣向亞洲大陸以外的地區擴張。在 15 世紀的一段短暫時期裏，中國的皇帝一度允許建造遠洋船舶，七次派太監鄭和遠航，遠抵中東和非洲東海岸。但後來的皇帝不但禁止這種遠洋活動，而且禁止建造遠洋大船。對他們來說，能夠管好中國漫長的邊境就夠麻煩的，更不要說和遠在海外的國家建立聯繫了。1793 年當英國特使馬戛爾尼來到中國提議通商時，乾隆皇帝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sup>[24-2]</sup>

在 1839 年到 1842 年和 1856 年到 1860 年的兩次鴉片戰爭之後，歐洲列強迫使中國開放了部分沿海口岸，但中國政府幾乎從來不想主動走出它在亞洲的疆域。當工業革命使西方國家崛起時，作為一個國家，中國未能有效地應對挑戰。由於中國回應軟弱，西方帝國主義列強主宰了對華關係，甚至主宰了中國沿海的產業和貿易。

毛澤東在南北韓戰爭時關閉了中西交往的大門，結束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影響。此後中國開始在共產主義國家中發揮一定作用，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一度在第三世界也有一定影響。1960 年代與蘇聯關係惡化後，中國在共產主義世界的作用陡降。1978 年以前，中國政府對境外事務的參與十分有限。例如，在文革期間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只派出一個大使，駐於埃及。

雖然毛澤東在 1969 年中蘇邊境衝突後開始向西方開放，中國在 1971 年也重新取得了聯合國的席位，但是毛澤東在世時中國的大門僅僅打開了一條縫。毛去世後，華國鋒也接受對外開放的做法，但只有鄧小平才真正打開了國家的大門，領導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直到鄧小平時代，中國政府的領導人才具備了足夠的政治眼光與魄力去超越帝國主義時代的痛苦記憶，開始跟其他國家發展持久而積極的新型合作關係，從而使中國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世界新秩序中的一員。

在鄧小平領導下，中國真正加入到了國際社會之中，成為各種國際組織以及由貿易、金融和各種公民交往活動所構成的全球體系中活躍的一員。中國成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成員國。中國開始在世界衛生組織以及其他領域所有重要國際組織的活動中扮演積極的角色。雖然鄧小平退休近十年後，中國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但是申請加入的準備工作是從鄧小平掌權時開始的。

中國在參與國際組織最初幾年的工作是熟悉這些組織的實際運作。當時中國仍然是個窮國，首要任務是維護自身利益。到了鄧小平接班人的時代，領導人才認識到國際體系對中國的好處，開始考慮中國作為國際體系和全球組織的參與者能夠為加強這些組織做些什麼。在中國加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一類機構之前，一些成員國擔心中國的加入可能具有破壞性，會給這些組織的運行帶來麻煩。但事實上中國的加入加強了這些組織，儘管它提出了自身的利益訴求；它遵守了這些組織的規則。

鄧小平在 1978 年成為頭號領導人時，中國的外貿額總共不到 100 億美元；30 年後這個數字增長了 100 倍。1978 年，中國促請美國接受幾百名中國留學生；鄧小平去世十年後，估計有 140 萬中國學生在海外留學，大約 39 萬人學成歸國。<sup>[24-3]</sup>1992 年時，中國已經在全球學術對話與全球貿易體系中長期扮演積極角色，而最初的突破都是在鄧小平擔任頭號領導人時取得的。

在鄧小平時代，為適應新的全球角色，中國也經歷了內部的變化，中國領導人將它稱為「接軌」，這個說法來自 1930 年代中國軌制不同的鐵路之間的對接。在 1980 年代，中國用這個說法描述為參與各種國際組織和全球體系而作出的調整。

1978 年後的最初幾年，中國開始與國際組織建立聯繫時，大力發展各種專門的機構，它們實際上成了對外交往的緩衝器。來華的外國企業被安排在特區之類的特定區域，政府還設置了與外企打交道的整套制度，這樣就人為設置了一道圍牆，阻止外國人與整個中國的接觸。在華外國人只能與各地的政府、大學和大公司中的外事辦公室打交道。例如，外事服務局負責管理在外企工作的國內員工。為了獲得更多中國極為短缺的外匯，外國人被鼓勵用他們的貨幣兌換「外匯券」，在指定的「友誼商店」購物，他們在這裏可以買到普通中國人買不到的外國商品。國營外貿公司控制著與外國人的大量生意，大部分外國人在半年一屆的廣交會上購買中國商品。中國的外貿部在監督這些專門的「外事」機構與外國人交往的政府活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些機構配備有懂外語並熟悉外國習俗的官員。

在 1980 年代末，中國的對外交往開始迅速擴大，超出了這些專門機構的範圍。外國人的旅行不再局限於某些區域，更多的中國企業能夠與外企直接做生意。以經濟特區作為起點，後來擴大到 1984 年開放的 14 個沿海城市的很多

做法，開始向全國傳播。外國人蜂擁而至，使專門的「外事辦」難以處理與之有關的全部事務。外事部門大多仍然存在，但其工作更多限於從事官方數據的收集。

在鄧小平退休之前，中國的各類機構都開始為適應外國的常規而進行「接軌」。外貿企業要學習外國的法律、財會和組織方法。<sup>[24-4]</sup>向外國教育機構輸送留學生的大學和高中開始為學生設立入學考試和申請程序的培訓計劃。體育教練開始大力培養最優秀的運動員參加各種國際體育賽事。中國興建了能夠接待國內外遊客的、符合國際標準的旅遊設施。國內消費者也可以越來越多地買到為出口而生產的商品。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擴大大學和研究機構以加強其全球大國的角色一樣，在鄧小平時代，中國的學術和研究機構也有了極大發展，從而加深了中國對世界的瞭解。

鄧小平在推動中國的全球化過程中，比印度、俄國和巴西這些大國的領導人更有魄力。這個過程在鄧小平時代之後仍在繼續，但是基本的突破在鄧小平退休時已經完成。

## 黨的集體領導

中國共產黨在 1956 年就開始了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可是毛澤東很快又再次將它領入革命。然而在 1978 年之後，經過老幹部復出、不善治理國家的革命家的退出和新領導人的進入這個過程，在鄧小平領導下，中共向將治理國家作為中心工作的政黨轉變。

美國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的制度，是由擔心權力過度集中的領袖們設計的。而由毛澤東設計、鄧小平及其同事作了重大修正的體制，則是為了解決相反的問題：為動亂不已、舉步維艱、地區差異巨大的中國提供統一的領導。與美國人不同，鄧小平及其同事相信，最終決策應以最高領導層對全局的政治判斷力為基礎，這要比以法律規範政府行為的獨立司法制度作為基礎更有益於國家。他們認為，立法機構制定法律但不負責執行法律的體制，不如集立法與執行於一身的體制更有效率。

美國是由保留著獨立權力的各州所組成，而中國千百年來一直有一個控制著地方的中央政府。毛澤東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制，將其深入擴展至全國。鄧小平則要將這種試圖到處滲透的統治結構拉回來。他沒有制定地方必須遵守的嚴密規章制度，而是建立了另一種體制：由上級選拔領導班子，授予他們相當大的獨立性，只要他們的工作能使經濟快速增長即可。

就像毛澤東時代一樣，鄧小平在北京建立的核心領導結構以政治局和書記處為中心。它通過領導班子網絡與地方聯繫在一起，這些領導班子存在於政府各個層級和各個地區的所有主要機構。每個領導班子不但負責本級黨的工作，還要監督它下面的政府機關（或經濟和文化單位）。這個班子要就全局性問題作出判斷，並使其轄區內的工作為四化建設作出全面的貢獻。

黨的上級部門下達有關領導班子如何開展工作的規定，不斷向每一級發佈指示。它們也與下級召開會議，有時讓下級領導參加上級的會議，或是派上級幹部到下面視察。如果上級幹部認為某個問題很重要，他們可以、也確實會進行干預。但是對下面的監督很難面面俱到，因此領導班子在領導本級工作時，一般享有相當大的自由。

北京控制各省的關鍵手段，是任免領導班子成員的權力。領導班子的成員通常有若干年的任職期限，但隨時有可能被上一級領導撤換。黨的領導班子裏各個成員負責不同部門的工作，對他們作出評價的依據，不僅是他們管理相關部門的工作表現，而且還有整個班子及其下級單位的表現。在鄧小平時代和此後的 20 年裏，這種評價主要基於領導班子對全國的經濟增長作出了多大貢獻。近年來一些次要標準也變得日益重要，如培養下一代幹部、環境保護、處置社會騷亂和對突發事態的反應。<sup>[24-5]</sup>

就像鄧小平一樣，他的接班人也認為正確選拔、培養和監督幹部能夠使幹部形成服務於國家整體目標的覺悟。由於下級幹部對如何開展自己的工作享有很大自主權，因此在選拔和培養領導班子成員上相當認真。每一級年輕幹部，假如他在整體思想能力、遇到壓力時的可靠程度、判斷力、與同事共事的能力以及服務於黨和國家的獻身精神等方面有不俗的表現，就有可能被選出來進行特別的培養、指導和考驗。

培養各級幹部確實花費了大量時間。指導者的任務是向年輕的下級幹部提供如何提高工作表現和技能的建議。最有前途的年輕幹部可以陪同上級參加各種上面的會議和黨內的非正式聚會。他們還會參加黨校的培訓班。他們中被組織上認為最有前途擔任國家級領導人的幹部，可以進京學習中央黨校的課程；被認為能夠擔任省市級領導職務的人，則去各自地區的黨校學習。並不是所有黨員——鄧小平上台時共有 3,700 萬黨員——都能分享通過與上級幹部的聚會或是



成為黨校學員而培養出來的同志情誼。進入黨校學習的人不但能瞭解同屆與上下屆的同學，而且能結識來到黨校的上級幹部，後者會借助於黨校幹部的評價，對學員未來的任職進行推薦。雖然組織部的幹部保存著人事檔案，能夠進行推薦，但各級領導班子的成員最終決定著在他們的轄區內哪些人能得到提拔。

然而，讓地方幹部享受較多自由也存在著風險。鄧小平建立的這種延續至今的體制，更重視結果而不是遵循規則，它所培養的幹部要具有評估問題的全局觀和創業精神，能夠支持快速發展。但由於缺少上面的嚴密監督，很多幹部不但能夠想辦法造福國家，而且也能關照自己與朋黨並排擠其他勢力。

這種黨的領導班子體制並不是由鄧小平所創，但他穩定了這種體制，使其工作更加專業化，把評價幹部的基本標準從對政治運動的貢獻變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這一基本體制被他的接班人沿用至今。

## 現代的精英治國

到鄧小平退休時，年輕的中共幹部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首先必須考上較好的高中和大學。鄧小平重視精英治國的做法在中國有著悠久的傳統。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按考試成績選拔官員的國家。早在公元 605 年，隋朝便把科舉作為決定哪些有抱負的競爭者有資格成為朝廷官員的首要標準。但是在鄧小平出生的第二年，科舉制便被廢除了。自那時起，直到他重新登上權力舞台，中國一直不具備足夠的穩定性，領導人也沒有政治決心為選拔官員重新建立一個全國性的精英主義基礎。毛澤東還在世時，不可能把教育成績作為選拔幹部的主要標準。很多為中共事業作出貢獻、登上高位的人，在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戰火紛飛的革命時期根本沒有機會上大學。此外，毛澤東認為「紅」比「專」更重要，他喜歡工人農民甚於受過較好教育但「出身不好」的人（地主和資本家的子女）。因此，考試並未成為選拔和提拔幹部的主要標準。實際上，1949 年後，很多幹部都是來自共產黨軍隊或游擊隊的老兵，他們中間有文化的人很少。假如舉行考試，他們和他們的子女不可能勝過「階級出身不好」但受過更多正式教育的人。毛澤東去世後，鄧小平大膽取消了「階級出身好」這條選拔幹部的標準，嚴格依照用入學考試來衡量的辦法。根據鄧小平在 1977 年採取的新路線，很多「階級出身不好」的家庭的子女得以通過考試進入好大學並當上了幹部。

事實上，鄧小平在各級建立了一套高度競爭性的精英考試制度，從小學到大學直到官場。他的目標不是促進社會平等，而是挑選最有才華的人，為其提供最好的教育機會。小學、初中、高中和大學都舉行入學考試，考入競爭最激烈的學校的學生能夠得到最好的教師和設施。

鄧小平於 1977 年恢復的統一高考制度，並不是專門為選拔幹部而設，而是一種為各行各業的大機構選拔最有才華的年輕人的制度。但是，所有被選為幹部的人，都要首先在各級教育考試中證明自己。甚至在當上幹部的人中間，出身名牌大學的最優秀的畢業生可以在中央機關就業，入讀較差大學的人則要從較低級別的機關做起。隨著大學畢業生的數量在 1980 年代末以後的迅速增加，從大學畢業生中選拔政府公務員時又增加了新的重要考試。不過，一個人一旦成為幹部，他的升遷便不再需要通過進一步的考試，而是根據他的工作表現。這種制度在鄧小平的接班人那裏也得到了沿用。

在 1980 年代中期，很多有抱負有才華的年輕人想通過「下海」經商取得成功，但是儘管存在這種有吸引力的職業選擇，「幹部」身分仍被人們所看重。這不僅因為它所提供的權力和經濟保障，還因為那些被認為既能幹又有志於服務社會的人深受中國人的敬重。由此可見，鄧小平留給他的接班人的，是一種精英主義的幹部選拔制度，它遵循著與帝制時代同樣的通過考試選拔幹部的原則。但是，這種制度在內容和結構上又完全不同於科舉制度。此外，這種體制也把精英治理的原則擴展到幹部選拔系統之外，貫穿了各行各業的人才選拔與培訓體系。

## 開放的全國性城市社會

中國自有歷史紀錄以來直到 1990 年代，基本上是一個在方言和文化上有著巨大地區差異的農業社會。1949 年以前，落後的運輸系統使大多數商品只能在從當地鄉鎮市場步行可及的區域內生產和消費，很多人幾乎一輩子都生活這個範圍之內。<sup>[24-6]</sup>毛澤東對人口流動的嚴格管制，使 1949 年以前就很有限的人口流動變得更加緩慢。在毛 1976 年去世時，農村人口仍然佔到總體人口的 80% 以上，農村生活也受到村莊、家庭和集體的 control，很少與外界交往。在毛澤東時代，即使城市中的單位——如政府機關、學校、工廠和軍隊駐地——都是相對自足的大院，很多單位設有傳達室，

來客進去之前要向門衛報告。這些封閉的社區為職工及其家屬提供基本必需品，如住房、食品、托兒所、學校、醫療和福利。居民很難在自己的工作單位之外得到這些服務。就像農村居民一樣，大多數城市居民缺少更換工作的機會，幾乎別無選擇地只能服從各自單位的領導。流動受到限制、在農村和城市單位中對上級的依賴、與外界缺少溝通，這一切使生活變得死氣沉沉。毛澤東鼓吹革命的意識形態，可是他對人口流動的控制，卻進一步鞏固了封閉的「封建」社會。

鄧小平退休時，經濟增長帶來的新經濟機會和他所允許的人口流動，已經使中國走上了從農業社會轉變為城市社會的道路。在鄧小平時代估計有兩億人遷入城鎮，而且這一過程此後仍在快速進行著。預計到 2015 年，即鄧小平退休 20 年後，將有 7 億人，即 51% 的人口成為城市居民。鄧小平退休時，90% 的家庭擁有電視，使城市文化迅速進入農村。沿海地區年輕的農民工返鄉探親時，也從城市帶回來最新的時裝、家居用品、電子產品和他們在城裏新見到的食物。<sup>[24-7]</sup>總之，農村地區在文化上也城市化了。

在 1978 年改革開始之後，城市的領導人擔心大批流入的農民將使城市設施和食品供應不堪重負，因而保留了城市戶籍制度，這種制度長期限制著人們是否能得到城市住房、就業和子女教育等各種服務。在 1980 年代初期，糧食和食用油的配給量幾乎只能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食品供應不足以養活進城投親靠友的農民。但是在 1983 年以後，隨著食品供應的增加，政府開始允許沒有城市戶口的農民進城。當時，沿海地區的出口產業能夠吸收大量進城務工、希望過上好日子的農村青年。中國歷史上有過戰亂和饑荒導致數百萬人遷徙的現象，但它們從未達到 1978 年以後那樣的遷徙規模。

在毛澤東時代，儘管缺少社會流動，仍然逐漸形成了一種深層的國家文化——中國人民的共同文化。到 1960 年代末時，很多城市家庭都有收音機，沒有收音機的城市和農村家庭也能從廣播喇叭裏收聽有關國家大事的新聞和一些音樂。更多的人能看到電影，分享共同的國家文化，人人都在政治運動中學習同樣的口號和歌曲。小學的數量迅速增加，因此在毛澤東去世時，大約有八成年輕人識字。

鄧小平時代教育體系不斷擴張。在 1980 年代多數年輕人不但可以讀小學，而且能唸完初中。1980 年代後期電視的快速普及，用普通話播送官方新聞的全國性電視頻道的建立，大大擴展了民眾共同的信息基礎。到鄧小平退休時，不但學校和政府機關，連國營企業和商店都已普遍使用普通話，大多數人都可以用標準的普通話相互交流。鄧小平時代交通運輸體系的擴展，使工業製品能在更廣的地理範圍內流通，從而擴大了外貿和內需的生產規模。1980 年代以前中國只有很少商業品牌，但是到鄧小平退休時，具有國內外認可的品牌的工業產品已出現在全國各地。

隨著城市裏封閉大院的開放和各地人口的交融，地方差異逐漸被共享的國家文化取而代之。在 1978 年以前，當地人只吃當地飯菜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但是就像在 20 世紀後期，西方世界一些原本是只在某些國家流行的食品，比如意大利薄餅、甜甜圈、硬面包圈和壽司成了國際食品一樣，在 1980 和 1990 年代的中國，很多地方食品開始在全國流行。南方人學會了吃北方的標準主食饅頭，北方人也開始吃南方人的標準主食米飯。同樣，一些過去只有當地人觀賞的地方劇種在全國都有了觀眾。鄧小平退休後，更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手機、計算機和互聯網的普及，使國家文化繼續擴張。就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樣，中國人保留著對自己所屬的村莊、縣、方言群體或省份的認同感；少數民族成員總是認同他們自己的族群。但是在鄧小平時代，一種真正的國家文化的成長，以及對異域文化的更多瞭解，大大加強了人們對整個國家的認同。

當鄧小平退出政壇時，大批在沿海地區打工數年的年輕人返回家鄉，他們不但帶回了沿海地區的商品，而且帶來了使他們能夠自己辦企業、為內地建立新標準的觀念和生活方式。這個過程加快了全國性城市文化的傳播速度。雖然內地居民錢不多，但他們仍能緊隨沿海地區居民之後買到一些產品，那往往是以更便宜的方式生產的仿製品。可想而知，昂貴的商品，比如汽車，向內地擴散的速度要比小件消費品慢得多。但是在鄧小平時代結束時，甚至這類商品也開始慢慢進入中國內地。可是在鄧小平退休的 1992 年，符合國際一般舒適標準的農村住宅的建設才剛剛起步，農村地區的小學條件仍然大大落後於城市中較好的學校。

從農業社會向城市社會的轉型，以及一種更強大的國家文化的發展，並非來自鄧小平或他的同事的計劃。鄧小平確實想打破軍隊中的地域觀念，使士兵能夠服從來自其他地域的司令員。他也確實鼓勵推廣普通話教學，使各地居民能夠與外地人交流。但是城市化和國家文化的成長並不是由計劃所致，更多地來自城市中的新機會和城市生活對眾多農村青年的吸引力。不過，這些變化一旦發生，官員便相應作出調整以適應正在變化的現實。他們開始改進地區管理，將城市周邊的農村地區納入管理範圍，允許鄉鎮和縣城在升格為城市時作出調整。

有意思的是，鄧小平時代開始的開放性的流動，與毛澤東那種為社會設置重重障礙的所謂革命相比，對社會結構產生了更加深遠的革命性影響。從以農村為主的社會向以城市為主的社會的過渡以及共同的國家文化的傳播，是中國自公元前 221 年統一以來發生的最根本的社會變化之一。

## 無章法的社會

中國在 1980 年代實行開放時，食品、醫藥、產品及工廠安全、勞動環境、最低工資、建築規程等領域幾乎沒有任何規則。<sup>[24-8]</sup>在 1980 年代初，如果創業者得到一些可口可樂空瓶，再灌進顏色相似的液體，並不存在相關法律來禁止他把這種東西當作可口可樂或類似飲料銷售。在 19 世紀的美國和歐洲，旨在保護民眾、對公司的逐利行為加以限制的法律法規也是緩慢形成的。鄧小平統治時期的中國，經歷著類似於 19 世紀美國和歐洲的掠奪式資本主義，當時既沒有反壟斷法，也沒有保護工人的法律。在 1980 年代的中國，當市場爆炸式地增長時，不可能立刻制定出適合中國國情的完備的法律法規，也不可能馬上訓練出執行這些法律法規的官員。從某些方面看，鄧小平時代的中國類似於 19 世紀的美國西部，當時那裏的地方法律和法院都尚未建立。就像美國塵土飛揚的偏遠小鎮裏帶槍的地方治安官一樣，中國地方官員管理著地方市場：由於不存在健全的司法系統，法律由他們自己說了算。

從地方幹部和商人的角度來看，這種無章法的狀態有一個好處，就是和那些擁有合乎「法定訴訟程序」要求的精密法律體系的國家中的領導人相比，它可以使少數幾個掌權的領導人更快地作出決定。當鄧小平退休時，在西方受過訓練的年輕法學家幾乎為每一個重要的經濟領域制定了法律法規，但地方官員的執行卻遠遠落在後面，因為很多人認為這些規則過於複雜，也不符合他們的個人利益。在某些領域，例如必須與外方密切合作的對外貿易領域，中國很快就採用了國際規則和法律。隨著經濟交往從相互認識和瞭解的小群體擴展到更大的群體，開始涉及到地區、國家乃至全球的合作者，這時便需要某些法律法規以便使協議能夠得到執行，並培養起相關各方的相互信任。

文革之後，很多人仍然害怕受到搞資本主義的指責，鄧小平在中國建立更靈活、更具活力的經濟並非易事。鄧小平很清楚，如果幹部過於嚴格地執行法規，中國經濟將難以起飛。他一向更加關心取得成果，而不是照章辦事。他認為一定的腐敗難以避免，正如他所言：「窗子打開了，難免會有蒼蠅和蚊子飛進來。」他需要的是敢闖敢幹的幹部，他願意承擔讓一些蒼蠅飛進來的代價。鄧小平的某些子女受到過利用個人關係為自己牟利的指控，但沒有證據表明鄧小平為自己或自己的家人斂財。

鄧小平也知道，為了讓地方幹部積極支持改革和創業，必須使他們得到一定的機會去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蘇聯和東歐的官員阻撓改革，甚至使其半途而廢，就是因為他們看不到改革能給自己帶來什麼好處。鄧小平要讓幹部致力於改革，為群眾謀福利，因此他允許一些地方幹部先富起來，只要他們能為當地帶來經濟成功即可。鄧小平很重視維護黨的地方幹部在群眾中的威信。在鄧小平看來，公開揭露為現代化作出切實貢獻的幹部所犯的錯誤，會讓他們更難以開展工作。但是鄧小平並不想保護激起民憤的幹部，他會隨時對因為無視公共利益而受到當地群眾反對的幹部進行嚴肅查處。死刑在中國的使用遠比其他國家頻繁，以便警告可能犯下類似罪行的人。

在這種無章法的社會中，謀取私利的機會幾乎無窮無盡。掌握土地的幹部在批准土地使用權時經常收禮。國企「私有化」時，本單位職工往往能得到大大低於市場價格的企業股份。國企負責人在完成國家指標後，被允許在市場上出售產品，於是他們常常把大量精力用在這一類生意上。公家的卡車在完成本單位的主要工作後，可以跑運輸做生意，以便改善單位職工的生活。就像俗話所說，毛澤東時代是一切「向前看」，鄧小平時代則是一切「向錢看」。

鄧小平給他的接班人留下的這種體制，沒有對公私利益作出嚴格區分。地方幹部對於能從他們管轄的企業拿多少好處，在看法上千差萬別：收受春節禮物？給親戚朋友找工作？拿紅包？如果能拿，拿多少現金為宜？子女上好學校或出國留學的機會？公車私用？由於司法不獨立，民眾往往不願意冒險向個人撈好處的當權者發起挑戰。對於因建新項目而被迫搬遷的居民，中國所提供的保護極差，開發商能夠和政府官員聯合起來迅速把土地搞到手，而對搬遷戶或原土地使用者的補償充其量也就是中等水平。從中國領導人的角度看，地方政府和建築商的這種勾結未必不當，它可以使企業迅速開工，從而能夠更快地為當地居民提供就業。

一些靠關係或特權發財的官員及其家屬公開炫耀財富，例如美酒佳餚、汽車、高檔服裝或豪宅，這讓反對腐敗的人憤憤不平。經過勤奮學習通過考試並完成工作，真正有資格升遷的人，看到無能之輩因為跟當權者有特殊關係而得到了提拔或更多特權，他們也會怒火中燒。

中國的城市和公共場所的建設步伐要遠遠快於其他大多數國家。例如，在廣州或蘭州這樣的城市，沿江十幾公里的區域，政府在幾年內就能拆掉全部老建築，將其改造為公園。在地鐵建設的高峰期，像廣州和北京這類大城市能夠在幾年內以平均一年一條線路的速度建設地鐵。有一些大學，例如擁有上萬名學生的南昌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能夠在五年內就建起全新的校園，其中行政樓、教學樓、大講堂、學生宿舍、教職工公寓、體育場館和類似公園的校園空間一應俱全。有了這些令人矚目的成功故事，在鄧小平及其接班人看來，這些土地原使用者的合法權利不應妨礙他們所認為的最大多數人的利益。

對外國專利和版權疏於保護並非中國獨有的現象。類似的問題也曾出現在日本、南韓、臺灣和其他尋求使用國外最新技術的國家和地區。一些中國公司願意尊重西方的專利和版權，支付費用，以不侵犯合作者利益的方式使用外國技術。然而很多中國企業並不這麼認真。有些中國人在受僱於外企後會開辦自己的公司，往往非法使用他們從外企學到的技術。甚至在執行法律比大陸嚴格得多的香港，也難以杜絕盜版歌曲和電影；複製的 CD、DVD 和唱片的售價僅相當於專利產品價格的零頭，為從事此類非法行為的人提供了極大的利潤空間。當外國公司和政府指責中國侵犯版權法，對其施加壓力時，中國官員會趕緊查封生產和銷售這類產品的企業，搗毀複製機器。可是沒過多久，另一些無所畏懼的中國企業又會在別的地方幹起同樣的生意。

中國工人的勞動條件，包括工作時限、車間環境和安全標準，往往比西方 19 世紀早期工業革命時可怕的勞動條件好不到哪裏去。有些企業利用相關勞動法規的缺失，讓工人住在擁擠的宿舍裏，為他們提供的勞動環境也幾乎沒有安全或質量標準可言。<sup>[24-9]</sup>對於數千萬青年農民工來說，能在沿海地區的工廠生活和打工，即使工作很辛苦，報酬也很低，但仍然比農村的毫無希望的貧困生活強不少。他們願意超時勞動，甚至因為害怕被解僱而忍氣吞聲。

利用西方和日本的資本建立並由外國人管理的工廠，儘管也在使用廉價勞動力，但普遍提供了比當地企業更好的工作條件。很多外資工廠空間寬敞，通風良好，在炎熱的夏季，室溫會維持在室外酷熱的溫度以下。這類工廠普遍採用了有關工作日工時、勞動條件以及工人安全的標準，在克服最嚴重的超時工作的問題上也取得了可觀的進展。在這些工廠裏，一些來自貧困地區的年輕人也養成了現代生活的基本習慣，如守時、清潔衛生和遵守紀律等。<sup>[24-10]</sup>

有大批外國企業在中國建廠。截至 2000 年，美國商會在海外的最大分會是在上海，日本在海外的最大商會也在上海，其規模是美國商會的兩倍。但上海的美國人、日本人和歐洲人的數量與臺灣商人相比仍然微不足道。為何會有這麼多境外商人湧向一個法規仍不健全、專利保護也很差的國家？吸引他們的是這裏的勃勃生機：決策速度快，落實決策不必受複雜法律程序拖累，規模巨大的市場迅速成長。有些外國企業家抱怨自己被中方合作夥伴和當地政府所利用，但也有一些人發現，一定的法律保護，與精明的、善於解決問題的地方官員的可靠關係，向上級部門投訴的可能，這一切加在一起，足以提供誘人的機會，所以他們願意為此承擔任何可能的風險。

## 鄧小平接班人面臨的挑戰

鄧小平所帶來的轉型的一個結果是，在他退出權力舞台後他的接班人將在未來很多年面臨一系列嚴重挑戰。這些挑戰包括：

**為全民提供社會保障和公共醫療。**在鄧小平時代，政府僱員，包括大型國企的職工，都享受單位提供的公費醫療和福利，但這些職工只佔全部人口的一小部分。<sup>[24-11]</sup>政府預算的規模過小，根本不足以為每個人提供退休保障、醫療和其他福利。在 1980 年代末，隨著市場作用的擴大，高收入人群能夠購買良好的醫療服務並自己解決福利問題。但是廣大群眾仍得不到醫療和其他福利。

鄧小平的接班人所面對的問題是，享受不到這些福利的人怨聲越來越大。人口流動的增加所需要的保障措施，是單個的工作單位無法提供的，政府預算和合格醫務人員的數量仍不足以滿足日益增長的需要。隨著農村公社的取消，農村不再存在能夠及時提供急救和基本公共醫療服務的單位。隨著住房的私有化和國企在開放的市場競爭中所面對的壓力，連大的工作單位也不再能提供足夠的福利。因此中國領導人面對的挑戰是，增加合格的專業醫療人員的數量，更新設備，建立能夠為包括邊遠地區的窮人在內的全體國民提供醫療和社會保障的體系——所有這一切都受到國家預算的約

束。<sup>[24-12]</sup>達到這個目標可能需要幾十年時間，因此隨之而來的挑戰是，如何以使人覺得公平合理的方式分配現有的資源和設施。<sup>[24-13]</sup>

**重新劃定和堅守自由的界線。**鄧小平曾面對的最麻煩的問題，大概就是為自由劃定界線，使其既能滿足知識分子和一般民眾的要求，又能讓領導人維持社會秩序。天安門悲劇之後，民眾普遍害怕要求更多自由，但這種膽怯不會永遠存在。出版物數量的增多，互聯網和移動電話的驚人擴張，使中共更加難以控制官方認定的危險思想的傳播。

和鄧小平一樣，鄧的接班人擔心，如果容忍各種不同觀點的自由表達，就會釋放出公眾反對聲音的狂潮，像 1989 年那樣再次導致破壞社會秩序的示威活動。中國領導人所面對的挑戰是，如何找到能讓民眾感到合理而願意接受的邊界，然後想辦法守住這條得到認可的界線。如今現代通訊技術日臻複雜先進，力圖逃避控制的人又極具創造力，政治領導人能夠做到控制民眾的思想，避免發生變亂嗎？

**遏制腐敗。**鄧小平在台上時一直贊成懲辦腐敗大案，但是當地方幹部為了促進四化、加快經濟發展而悄悄違法時，他寧願視而不見。鄧小平接班人所面對的問題是，各級幹部都在想方設法地撈外快。政府官員、醫生和國企領導人都經常收紅包。掌握著土地和建設項目審批權的幹部不但直接拿好處費，還以低於市場的價格購買股份和資產，接受宴請，享用豪車。無論地方還是部隊的幹部，都會向有權提拔幹部的人送好處。年輕人要給徵兵的人送錢才能入伍。高層幹部面對的挑戰是，這些做法現在已到處氾濫，眾多幹部或其家屬牽涉其中，使克服這類問題變得極為困難。

**保護環境。**在鄧小平時代，雖然他本人確實關心植樹造林和擴大綠地，但普遍的貧困使發展經濟的要求極為強烈，因而對經濟增長的渴望完全壓倒了對污染的防治。自鄧小平時代以來，隨著工業的巨大擴展，煙塵、水資源短缺、河流污染、酸雨、環境污染對健康的損害和食品污染等等問題有增無減，公眾這方面的覺悟也在同步增加。官員面對的問題是，如何改變造成嚴重環境破壞的做法。一些貧困地區出現了極為麻煩的問題，那裏的礦業和煤炭等其他資源的開採與使用造成了嚴重的環境破壞，但是要求這些做法延續下去的經濟壓力同樣巨大。中國現在已經是溫室氣體的最大排放國，全國的道路上每年新增數百萬輛汽車，重工業的發展很可能還會增加對煤炭的使用，中國將如何應對來自其他國家的批評？

**維持統治的合法性。**毛澤東靠打贏內戰，趕走外國帝國主義和統一全中國取得了統治的合法性。鄧小平獲得合法性，靠的是在文革的混亂之後恢復秩序，以務實的方式處理國家面臨的嚴重問題，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在這個新的時代，鄧小平的接班人該如何建立自身的合法性呢？

鄧小平的接班人受到壓力的原因是，他們沒有更加成功地阻止腐敗的氾濫，也沒有為解決不平等問題採取更多的措施。克服這些問題將來有可能變得更為困難：在全球經濟危機中，中國面對的風險是，很大部分人還沒有機會享受早先經濟增長時期帶來的好處，經濟就陷入滑坡。為了應對這種可能性，中國領導人必須從經濟增長以外尋找合法性來源，抓緊在解決某些公眾最關心的問題上取得進展：減少腐敗和不平等，提供合理水平的普遍醫療和福利，想辦法證明在選拔官員時是尊重民意的。

## 作為超級大國的中國：鄧小平的遺產

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出現了不同尋常的高速發展，他的最後一次努力——南巡——使經濟發展進一步加快。這種增長帶來一個問題：當中國的經濟規模開始與美國匹敵時，中國將如何作為？鄧小平如果還活著的話，他會做什麼？

鄧小平認為，領土糾紛應當先放到一邊，讓更聰明的後人以和平方式加以解決。他所理解的大局是，不要對邊界糾紛過於激動，重要的是和其他國家搞好關係。

鄧小平相信，與鄰國保持和睦關係，集中精力搞和平發展，符合中國的利益。他於 1974 年在法國的短暫停留和次年的國事訪問中，加強了與歐洲的關係。他不但在 1978 年改善了中日關係，成為第一個訪問日本的中國領導，而且支持推動文化交流以全面加強兩國關係。他實現了中美關係正常化，通過成功訪美加強了中美關係。他開放了與南韓的貿易，為他南巡後不久兩國建交鋪平了道路。他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在經過 30 年的緊張關係之後，於 1989 年同蘇聯恢復了正常交往。總之，他改善了中國與每一個重要國家的關係。

1974 年，作為第一位在聯合國大會發言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說，中國絕不稱霸，如果中國壓迫和剝削其他國家，全世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可以把中國視為「社會帝國主義」，與中國人民一道推翻它的政府。1991 年 8 月，聽到蘇聯領導人亞納耶夫（Gennady Yanayev）對戈巴卓夫發動政變的消息後，王震給黨中央發電報，提出中國應當表示支持亞納耶夫的政變，鄧小平回答說：「韜光養晦，絕不當頭，有所作為。」<sup>[24-14]</sup>在鄧小平看來，中國不應插手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

在鄧小平之後的年代，由於中國變得更加強大，中國的一些安全專家就像他們的美國一些同行一樣，開始爭論中國在強大之後應當繼續韜光養晦，還是採取更強硬的立場。從 2010 到 2011 年，經過幾個月的爭論——其中一些中國領導人主張更多採取攻勢，這場討論以贊成中國繼續與各國保持和諧友好的關係而收場。人們無法預見中國未來的領導人將如何回答這個問題，但是假如鄧小平還活著，他一定會說：中國絕不當稱霸，絕不干涉別國內部事務，應當與各國保持和睦關係，集中精力搞好國內的和平發展。

[24-1]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Thomas J. Barfield,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Cambridge, Eng.: Basil Blackwell, 1989); Paul Cohen, *China Unbound: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24-2]轉引自 E. Backhouse and J. O. P. Bland, *Annals &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4).

[24-3]Linda Jacobson and Dean Knox, "New Foreign Policy Actors in China," SIPRI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Policy Paper no. 26 (September 2010), p. 22.

[24-4]關於國際貿易體系，請參見 Edward S. Steinfeld, *Playing Our Game: Why 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4-5]有關中共的一般著作，見 Richard McGregor, *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0); Yongnian Zhe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Organizational Empero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24-6]參見 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s 1, 2, and 3,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no. 1 (November 1964): 3–44; 24, no. 2 (February 1965): 195–228; 24, no. 3 (May 1965): 363–399.

[24-7]關於將城市的先進物質帶到鄉村，可以參考 Rachel Murphy, *How Migrant Labor Is Changing Rur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and Leslie T. Chang, *Factory Girls: 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 (New York: Spiegel and Grau, 2008).

[24-8]有關的法律著作見 Stanley B. Lubman, *Bird in a Cage: Legal Reform in China after Mao*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Randall Peerenboom, *China's Long March toward Rule of La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Jianfu Chen, *Chinese Law: Context and Transformation*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2008).

[24-9]Anita Chan, *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 The Exploitation of Labor in a Globalizing Economy*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1); Chang, *Factory Girls*.

[24-10]Ezra F. Vogel,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有關在中國外企工廠曝光的超時用工現象，見 Chan, *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

[24-11]Martin King Whyte, *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Gail E. Henderson and Myron S. Cohen, *The Chinese Hospital: A Socialist Work Uni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24-12]Deborah S. Davis,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Scott Rozelle and Jikun Huang, "The Marketization of Rural China: Gain or Pain for China's Two Hundred Million Farm Families?" in Jean C. Oi, Scott Rozelle, and Xueguang Zhou, eds., *Growing Pains: Tensions and Opportunity in China's Transformation* (Stanford, Calif.: Walter H. Shorenstein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Stanford University, 2010), pp. 57–85.

[24-13]Martin King Whyte, *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4-14]作者 2010 年 12 月與中共黨史專家沈志華的交談。